

—
伪满中央殖民政权

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图书馆

我第三次做皇帝^①

爱新觉罗·溥仪

“重登大宝”和初次访日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允许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在一次同武藤的例行会见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

^① 本文是作者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第六章的几节。

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投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3月2

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地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地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刘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空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份，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象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象有

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1934年3月1日）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我的皇后）一个宝冠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乎所以。如果这是我的那种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机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并派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舰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海平如镜， 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 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4天，看了一次70条舰艇的演习，又在晕船呕吐之中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万里雄航破天涛， 碧苍一色天地变，

此行岂仅览山水， 两国中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真心尊敬，真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误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为我设宴，然后又到住所回拜。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们的祝贺，同裕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给他父亲“大正”天皇上坟。我到日本陆军医院慰问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离东京的那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说：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

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感想，次日（即4月29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在5月2日我还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那是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郑孝胥起草的。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诏书的出现，也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从东京游览了京都、奈良以后，到了须摩的“武库离宫”，准备回东北前，当时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对我说，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诏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谢，并要把这种精神传

告于“全国人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伪诏书的颁布，已早经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军部内定）。当我回长春以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诏书”的草稿给我看；同时专门操纵我的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也替我出主意，说道“在这‘诏书’里面，应当添上‘依赖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字样。”于是我亲笔加上那几句话。吉冈说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说这话不通，结果将“存”改为“赖”。从此以后，伪满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赖不渝”或“违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我从这次对各伪大臣、参议讲话以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随便讲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至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对我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后来只有每年规定的“政务”上奏（这时还有伪总理张景惠的侍立）和在伪宫举行的形式上的参议府审核年终预算会议以及逢年过节举行庆祝时见见面，再不能如以前的随便来见我。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的就更严，连我见亲属也受到限制。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其他凡是从华北来的不论是亲属或非亲属都只能在年节与我生日时向我庆祝时行礼，不许个别谈话。这是由吉冈安直写在条子上交伪宫内府大臣熙洽照办的。另外“帝宫”里还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

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吉冈安直的高压电线

关东军好象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象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是关东军高参，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名称，据说意思好象是“内廷行走”，又象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名称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阅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认为他最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以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作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这样时间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了，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

想干，因为中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谏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作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个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经常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自然，“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作点心的师傅，彼此送

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象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在中国话里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 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与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1934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

虽说不能以手足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1936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在纸条上写好。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的宴会上，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辈，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连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有什么非谈不可的

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呢。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我的恐惧

经过14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导。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关东军不但还想再瞞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

凌升是蒙古（达斡尔）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14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同我结成亲家

(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象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得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后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兴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

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象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对我说：“咱们的护军，好象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300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升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子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今长春市儿童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还

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本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 and 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作了。

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日本贵族子弟肄业的高级中学）毕业的溥杰和润麒。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溥杰和润麒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化”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军”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还有，1936年，日本人在内蒙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见过，他曾送过我钱，还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作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真的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里打打网球。我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迎门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见了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了打了，赶紧叫人快擦去了，然后急忙回到我的卧室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

这行粉笔字，引起的恐惧更大了。我怕日本人发现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一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这行字是谁写的呢？显然在我这“内廷”之中，是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1936年在接连的恐惧、忧虑中过去了。到了1937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已没有了1932年长城战争时等着日军进占平津以便重返故宫的心情，而是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一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到1935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天潢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之配，已是破例；如果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如若是更要提防呢。我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

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

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

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1937年4月3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伪满“立法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到，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象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等，越来越不值钱了。

四大“诏书”及其他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说来，吉冈安直必定是个好人材，因为他确实确实把我弄得服服贴贴，百依百顺。到了后期，也就是他把天皇与我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以后，我不但早已不敢再生产什么专制独裁的妄想，而且逐渐学会了逢迎谄媚。

“七·七”事变后，日寇每攻占一个大城市，吉冈必定来向我宣传一番“大日本皇军赫赫战果”。每次说完，必定绷起了那张由颧骨撑起来的脸皮，面向南方站起来，念念有词：

“为圣战而死的忠勇武士，嗯，应该致歉哀！”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闭眼低头。我也忙不迭地照他的样儿作了。

到了武汉沦陷的时候，我已被他训练得不等他下命令，就会主动站起来，向着南方深深一躬，低头闭眼。

从这次起他又给我添了功课。他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亲笔写祝词，赞颂他屠杀的功绩，祝他“武运长久”。以后几乎每当日寇占领一个城市，每当又有数以万计的同胞遭到屠杀和奴役的时候，我都要给日本天皇去一封祝贺的电报。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还充斥于每一次的“皇帝诏书”中。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东北人民任何一种即使是消极的反抗，都可以借口违犯了“诏书”的某一句，而加以治罪。

起这样作用的“诏书”，主要的有四个，第一个是我第一次访日回来的“回銮训民诏书”，前面已经说了。第二个是“国本奠定诏书”，颁布时间是1940年，事情却要从1939年说起。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正在狐疑着，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那间屋子的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这尊佛原是紫禁城里的，我供奉了已经几十年了，从我一到长春就把它供在那里，吉冈从前也看见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表示注意。他这回站在那里把这尊佛像注视了很久，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然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嗯，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作，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罕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的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

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作自己的祖宗，这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1940年5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8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是陛下愿意

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觉得真象爱丽斯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我回到了长春之后，在“帝宫”旁修了一所称之为“建国神庙”的房子，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规定的，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全东北各地也都建立了一个这种“神庙”，都要照章祭祀，任何人走过这种地方，都要行90度鞠躬礼，并且立以法律，违者严惩。因为人们都厌烦它，不肯向它行礼，所以凡有神庙的地方，也都是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象《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终于悄悄丢下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在全东北的人民耻笑、暗骂中，我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回诏书不再是郑孝胥（这时郑已死了两年）的手笔，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写的日本味的中国文言。其中有这样两

句：“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这两句成了以后每次“诏书”都少不了的谀词。

为了让我们这些拔尖的汉奸首先接受这种神道思想，让我们真正奉信这邪门歪道，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请来一位著名神道专家叫笈克彦的，据说是位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给我和大臣们讲课。这个神道专家讲课时带来了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一张纸上，画着一棵树。他讲道：“这棵树的树根，是日本的神道，也是日本天皇的祖先。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紘一宇，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了一碗清水，旁边又画了若干酱油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醋瓶子等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说明全世界尽管有各种宗教信仰，但都不纯粹，只有日本神道才纯正如同洁净的水。别的宗教的发源本是来自日本的神道（净水），可是已经夹杂了各自的派别，所以不是净水，而是酱油、醋。……”还有不少奇谈，详细已记不清了。后来我听到关于一贯道的说法，想起那棵大树来，觉得好象有点相象。这个笈克彦给日本皇太后讲课时，她听着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伪大臣们，有的虽道貌岸然，也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着了。伪军政部大臣于琛激，绰号叫于大头的，听道的时候竟歪着大头打起呼噜来（后来不久不知为什么竟被撤了职）。

这位笈克彦临走，还给我留了一大套画着大树和酱油瓶的书，总有一尺多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也同时宣战，由我颁布的“时局诏书”。这第三个诏书也是佐藤知恭的手笔。这时吉冈安直又来见我说日本天皇已发出诏书，

对美英宣战，跟着就把伪满支援日寇的侵略的“时局诏书”草稿给我看，并说当日晚间就必须在“宫内府”召集全体大臣、参议等开御前会议，并希望我在开会时亲自宣读这个“诏书”，另外还要说几句话表示伪满洲国应尽全力支援日本“圣战”的决心。

这个伪时局诏书的原文如下（原无标点，是我后加的）：

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昭诏尔众庶曰：——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一用起来，顺理成章。

我见了每次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死生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奋斗到底。”

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了他，便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去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的屈辱，是写在第四个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1942年）的前夕，吉冈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那就没有区别。所以，应称作亲邦，同别的国家就有区别了。”

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真正统治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把“国务总理”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祚，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之民。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尔有司众庶，亦咸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终始一贯，奉公不懈，深堪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根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按规定成了“日本”的代词。

这样自认是他的儿子还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伪总理张景惠代表伪满，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份，就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是写在“亲书”里的。

1944年，日本的败相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在倒楣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说，“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

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来，“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记得好象这回没有听到他的嗯、哈，可见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混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钢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后来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又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也都捐献了等等的話，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我后来在关东军司令部看见，他们的地毯还是好好地铺着，究竟吉冈卷了我的地毯是为什么，金银首饰拿去了多少，我自然是不敢问了。

我又自动地拿了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掠一切可搜掠的东西。交不上来的，还要受体罚。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愈临不利，掠夺东北人民的物资财富也就越多。有一次伪满各省伪省长正在长春照例开会，吉冈抓着这个机会，便建议让我召见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当面鼓励他们：“要节约，多生产粮食，尽全力支援日本皇军圣战。”我一一照办了。以后，伪总理张景惠在日本人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授意下也演了“双簧戏”，发表称赞我的“敕语”的所谓“总理谨话”。到了1945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陷入衣不蔽体，食无粒米的境地，多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更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3000担，

大米30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打算让我亲自带去，到“亲邦”进行慰问，我听到关东军有这个意思，心中怕得要死，因为日本已开始遭受空袭，我很怕在日本遇见炸弹。我不敢流露出一愿去的意思，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我可以不去，派一个慰问大使就可以了。于是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杰

《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刊有溥仪所写《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其中有两项我认为应加以订正和补充。

（一）第6至第7页所载伪“回銮训民诏书”中，有三点与当时伪“诏书”的原文有出入：（1）“……以达今兹”应是“以逮今兹”；（2）“兹幸致诚悃……”应是“兹幸亲致诚悃……”；（3）“与友邦一心一德”应是“与友邦一德一心”。因我当时在伪军中任伪军官时，不但每年5月2日必须有一次纪念这一可耻勾当的仪式，即在我任伪连队军官及任伪军校连长、队长时，也须在例行对兵士和军官学生的“精神讲话”、上学课的时候，经常要背诵这篇东西或引用其中的“重要之处”，所以根据当时深入脑中的回忆予以订正。

（二）第14页从第5行到第10行，记吴沆（原误为沅）业

被日寇惨杀事，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出入。

1943年至1944年，当我在长春伪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任科员时，有一天一个人忽来我家见我，见面后即仓皇地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长方形纸条，上有潦草的铅笔字迹，上面写着：“我被押在日本宪兵队，受尽惨酷非刑，实在生不如死。你认识日本军人很多，望念在驻日本大使馆同事一年之谊，设法救我出来，如办不到，即请设法让我快些死掉。……”等等，末署有吴沆业三字。我看完大吃一惊，但为了自己保全自己，就顾不得什么朋友之谊，遂严厉斥责来说：“你怎么这样大的胆子，这是什么事，你胆敢向外通风报信！”我说完便在他面前将纸条烧却，催他快走，并劝他要设法辞去看守之职远走高飞，他当然是惊慌失措地走去。后来听阮振铎（曾任伪驻日大使）对我说，吴沆业终于死在日寇的宪兵之手。吴遭祸的主要原因，据说是“他曾将伪满的秘密情报卖给美国驻日大使馆的人员”。这件事的经过就是这样，并没有求我转求溥仪营救他的事。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溥杰忆往

溥杰

敢怒而不敢言的伪执政

我在学习院第二年的暑假时曾回到伪“首都”长春。这次回国与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备受招待，有的呼我为“御弟”，有的则以“殿下”相称。到了沈阳，先赴日本的关东军司令部去

见本庄繁。他是一个身材不高、满脸假笑而官气甚足的人。

我在沈阳滞留两天之后，便到伪首都“新京”（即长春）。到站之后，见有中国兵沿途布岗，从车站直到伪执政府。伪组织的“新贵”和“遗老”们也都到站欢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郑重待遇，致使我两眼一酸几乎滴下泪来。到了“执政府”，见了溥仪，出我意外，他并不怎么高兴。他阴沉地对我说：“他们曾有推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乐意。现在虽当上‘执政’，已和他们约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说……”我说：“我认为与其当大总统不如当执政。”我的意思是，以皇帝而当大总统，未免有失身分。溥仪当然也是和我同有此感。不久，上角利一（直接操纵溥仪的关东军代理人）来见溥仪，只见他笑嘻嘻地对溥仪说：“刚才关东军对阁下提出抗议，说派武装士兵到车站，是违反武装人员不得入附属地的协定，请阁下今后严加注意，不要再这样做……”

虽然上角是把关东军的严命以谈笑出之，但溥仪也黯然变色，对他表示了歉意。因为这是溥仪为给我装饰场面，才把临时拼凑而成的“翊卫军”（即伪禁卫队的前身）派到车站一带，不料却碰了大钉子。我觉得溥仪有些可怜，同时也对关东军的骄横态度感到愤慨。

有一次我们站在“政府”的楼门口，看到满载全副武装日本兵的两辆卡车，一前一后护卫着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如入无人之地地闯进来。有一个亲戚悄悄对我说：“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听了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有一次，日本的一个校级军官带着他的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来时既未知会溥仪，也不经过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用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未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在当时对日本

“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他们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到吴的身上。我当时深深感到，这同溥仪在北京的紫禁城，甚至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的处境相比，都有一种“不可说”的味道。还有一天，一个大个子的日本宪兵军官，光头穿着西服来找溥仪“闲谈”，由我担任翻译。溥仪又讲了一遍“先作一年看看，然后打算避位让贤”的照例的“政见”。那个宪兵军官听了满脸堆笑地说：“阁下出任执政，乃三千万民众所推戴。这不是一年、二年就要息肩的问题，而是有关‘新国家’的前途的问题。”我和溥仪听了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这次在长春住了约20天之后，仍回日本，准备在学习院毕业后，投考陆军士官学校。

毕业归来所见

溥仪为了扶植自己的羽翼，就以个人名义将我和润麒以及从“侍卫官”、“侍从武官”中选出的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张挺（清末湖北提督张彪之子）、马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远房本家）、赵国圻（贵福之子）、孙文思（孙其昌的侄子）、祁继忠（溥仪的心腹用人）等10人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5年我毕业回来之后，立即以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到长春去见溥仪。这时我感到他自从当上傀儡“皇帝”之后，开辟自己前途的信心和对于当前生活的兴趣，以及在政治上的权力，都在一道溜向下坡路。例如我第一次到伪“执政”府见到溥仪时，虽然他因未达到当“中兴皇帝”而有些不如意，但还经常“召见”伪满的大官等闲谈，有时还留他们同吃便饭，而且每日走出内院到前面办公室去“办公”。这次当了傀儡皇帝，反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除了固定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

参谋长、伪国务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以及经常见自己的家属之外，就几乎谁也不见。为办公而特意兴修的“勤民楼”，成了“门虽设而长关”的“冷官”。早起逐渐改为晏起，应签名画可的公文，也不看内容就盲目签可，甚至经常坐在恭桶上，由“当差的”将成叠公文、毛笔、墨盒一并拿来，逐个在公事后尾签个“可”字拿走了事……这一切一切都使我深深觉得溥仪是爬得越高，自己的活动范围越窄，而且是意志越发萎靡不振。

见过溥仪之后，当然要到伪军政部报到。在这里，我初次见到了“军政部大臣”张景惠和“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佐佐木，印象极深。张景惠是马马虎虎、结结巴巴地对我作了一场“训示”了事。佐佐木则用温和的态度对我说出一套尖锐的“训辞”。他说：“在满洲国没有贵族，你虽是皇帝陛下的令弟，也应以一个‘满洲国’的普通军官的身份来为‘国军’尽力……”并着重说，“应以万嘉熙为戒”^①。最后又说了一套软的：“你是多年受到日本教育的人，现在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望你能为日满亲善作出活的模范……”然后将伪“建国功劳章”和“访日纪念章”特别“颁赐”给一无“建国勋劳”二非“访日扈从”的我。

我们这批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又赴沈阳，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当了一个月的见习军官。这里，上有日本军事顾问的严密控制，内有“红帽箍”^②把生杀予夺的人事调动权和教育、生活

^① 在我参加伪军之前，万嘉熙在伪警卫步兵团任中尉团附，因为与日本人青木等发生口角，深招日本人之忌。恰巧该团出一中校团附缺，溥仪因不知军队中的阶级关系，便对伪军首领言，可以万继任。日本顾问闻而大哗，认为这是万蛊惑溥仪想往上爬，并说“此风断不可长”，就在“虽不反满，其实抗日”的“罪名”下将万由“警卫步兵团”的中尉团附远调为热河“讨伐队”的军官。这是日本关东军在溥仪当上伪陆海军（当时伪江防舰队在日本海军的控制之下名为“海军”）大元帅之后，限制他对伪军开口的一个下马威。

^② 即“应聘官”，为聘来的日本退役的校级军官，因有日军制服，帽上有红箍，故云。

等各方面的权力都紧紧抓住，其下更有“日系军官”——即加入伪军的基层干部的势力，渗透到每一个兵的身上。伪军中的中国人，不论阶级大小，都得奴颜婢膝地应付层层“上司”。稍一不周，轻则丢掉“饭碗”，重则被烙上“反满抗日”的“罪名”，立刻便有杀身之祸。而我们这批从日本新毕业的伪军官，在日本方面看来，是可供利用的工具。在一般伪军官看来，则是纯粹的“二鬼子”。特别是因为我同溥仪的关系，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平常的存在”。当时伪军官们个个花天酒地，我当然也不例外。有一次，一个同我相识的妓女曾对我说：“我曾认为‘满洲皇帝’是日本皇帝昭和的弟弟‘太和’，现在我才知道你们并不是日本人。”可知当时一般人对于我们的看法。

一个月的见习期满，我被派到长春伪禁卫步兵团当排长。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保卫傀儡皇帝溥仪。

乌烟瘴气的“禁卫步兵团”

伪禁卫步兵团初名“翊卫军”，虽号称军，实际上只有三个步兵连，是在伪“执政府”成立前夕，由熙洽从吉林省的公署卫队和公安部队中拼凑而成，送到长春的。当时官不识兵、兵亦不识官。开到长春才临时逐个点名着手编制。有的本是二等兵，因在输送途中私自在肩章上添上一颗星，便算是正式的上等兵，胆大的添上一条金线便成为军士。夜间站岗时，狡猾的兵藏在床下便可以躲过去，而傻些的便须连站几个钟头无人替换，以至有人以“请客”使别人替代站岗，有时则发生穷凶恶骂、甚至拔刀动武，有的兵肩扛轻机枪宿娼，入房即将武器支于门外。有的因争风吃醋用步枪打死人，携械而逃……兵既如此，官自可知：最初任“翊卫军”司令官的，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当时改名金璧东），是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

包办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伪政权成立后，便一跃而爬上伪铁路警备司令官、伪长春市长、伪翊卫军司令官等等要职，而且是身兼数差，骄横招摇不可一世。有一次他检阅军队，见一班长不顺眼，便喝令卸下背囊离队前跪，拔出军刀就要亲手砍头，经大家苦苦哀求，才免一死。

后当宪奎之弟宪原继任时，虽较乃兄稍识相些，但在官兵眼中，仍是一个“相当的人物”。有一次同他的团附玉祺因为争权夺宠大闹摩擦，双方几至火并。因玉祺为熙洽派去的人，玉祺便找靠山作“秦庭之哭”，宪原遂受到熙洽的奚落，当时即改变态度，同玉祺拍肩携手偕赴酒楼。兵士都说宪原会作戏。

在我到该部队时，不但已由“翊卫军”降为“禁卫步兵团”，而且日本顾问，应聘官和“日系军官”的势力亦逐渐渗透进去，旧军阀的遗风虽尽除去，但殖民奴才的空气，却涨满全团。有一次伪军官饮宴，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佐佐木的军需官，竟抱住伪团长郭文林大亲其嘴，在当时却赢得日本方面的称赞，说该团长“深得上心”，堪为“日满亲善”的榜样。

我就是在这种空气中，在该团尽了一年“拱卫禁阙”之职。

我同日本女性结婚的前因后果

我在伪“禁卫步兵团”当了一年的排长之后，日本关东军当局为进一步“深造”我，便使伪军政部派我赴日本陆军专门学校去留学深造。所谓“深造”含有两种目的：一是为造成我在伪军中的“资格”，二是为了促成我同日本女性结婚。

我同日本女性的结婚，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早就定好的圈套。因为我素抱“师重耳假秦援入主晋国”的痴心妄想，所以虽知这是一个陷人坑，自己也甘心情愿往下跳。

我在伪“禁卫步兵团”时，溥仪曾同我谈过此事，并对我

说：“看样子，日本军部很想让你同日本女性结婚。这样一来，内外受制就越发不好办了。不如趁他们还未下手之前，你赶快同中国的女性定了婚……”他并找出几张他选剩下的照片给我看，我也看中了其中的一张，便由溥仪向北平方面联系，因为该人早已同别人有了婚约，便只得作罢。

后来又想到溥仪的妻子郭布罗·婉容的表妹，看过照片后我很满意，溥仪遂特请她母女到长春，经过几度磋商已有眉目，乃为吉冈所闻，立即把我找去，对我说：“关东军方面都希望你同日本的女性结婚，因为这同‘日满亲善’前途大有关系。最好你不要同中国人订婚，日本女性我负责给你找……”我在当时思想斗争得很厉害，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次日见到我的哥哥溥仪，向他汇报此事，他也只能长叹一声完事。

吉冈为了先搞断我同唐怡莹间悬而未决的关系，以便给我与日本女性结婚开辟道路，便自告奋勇，带了一名日本宪兵，跑到北平唐的家中，想以日本兵的势力迫她屈从。因唐不在，便立时暴露出法西斯军人的凶相，喝令宪兵将唐家的大门关上，抓住唐的两个兄弟，勒令他们签名盖章，写一份承认唐同我断绝关系的证明。并抓来当地的警察署长，逼他在声明中列名。

我一到日本，给我作媒的便出现了。一个是在“九·一八”时期曾任陆相的南次郎大将，一个是在“九·一八”时期曾任侵略我东北的日本法西斯军头子的本庄繁大将。此外，日本的皇族方面，如北白川宫大妃、和朝香宫陆军中将，也对我作出了种种暗示。如请我到家吃饭，暗使服部少将调查我的私生活并特使女儿出来见面……南次郎和本庄繁还为争取对我结婚的“包办权”，演了一出“争媒”的丑剧。他们都愿意自己推荐的人，能中“雀屏之选”，都各自把自己“藩阀”（即日本德川时代的各地诸侯，明治以后，虽有“废藩”之举，但当地人

仍有地域之见)中的女性相片大批送来,我只看中了本庄所荐的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孙女浩。吉冈闻讯,便借正式出差之名赶到东京,推本庄为大媒,开始向嵯峨家交涉。其实嵯峨家并不知此事。这张照片是由他们的一个亲戚,为俛她的儿子免服兵役而向本庄讨好独断送去的。当时,浩母女正在戏院观剧,忽闻此事,大惊。浩和其母曾有“即便是关东军,也无权强迫人家的婚事”之语。后在本庄等软硬兼施的说服下,才答应“先见一面再说”。吉冈曾对此大发牢骚,对我说:“什么华族不华族,日本的女性有的是,成不成没关系,我替你找好的!”

及我和浩在她外祖母滨口家相见双方表示同意后,吉冈特对我说:“在‘皇帝陛下’没有正式许可之前,对外绝对不要发表。”我对吉冈说:“我现在已和嵯峨浩定了婚,不使北白川大妃知道,将来一旦发表,似乎说不过去。”他说:“没有关系,将来大妃如果知道,你就说:‘关东军命令我不得事先向任何人发表!’”

为了加重宣传的色彩,选定在1937年4月3日——日本“神武天皇纪念日”的那天,在东京军人会馆举行结婚典礼。浩在从他的祖父家赴军人会馆时,从东京的杉并区大宫町到九段为止,中野、杉并两区的小学生都被动员出来摇日、伪国旗夹道欢呼以为点缀。举行仪式时,溥仪还特派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带着诏书前来参加。演完恭迎“敕使”的一幕,便在“靖国神社”由贺茂官司用日本结婚仪式举行结婚典礼。这一幕过去便是大开喜宴。日本的皇族竹田宫夫妻,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銑十郎、陆军大将及各阁僚夫妻,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直武侍从长,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还有三个大将,伪驻日大使谢介石以及前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远藤柳作、驹井德三和前内阁总理广田弘毅夫妻等共400余人皆来参

加。大媒本庄致词，大谈“日满亲善”等等之后，林銑十郎和谢介石等致祝词，最后日本外务大臣佐藤带头三呼万岁，这幕用以大事宣传的婚礼才告结束。过了几天日本天皇裕仁的母亲，还特意把浩召入宫中，“勉励”有加。

这次结婚的费用，全由伪满“宫内府”所出，“宫内府”次长入江贯一和“宫内官”加藤某亲来主持一切。并由“皇室财产”中拨出50万元存于银行，以年息两万元作为赡养这一对宣传工具的“生活费”。

在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伪国务院立即发表了“皇室继承法”。大意是：“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以孙继之，无孙以弟继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打算使“日满混血儿”去当伪满的傀儡头子。同时再以“天照大神”作为“皇室”的祖先，以便借宗教侵略来达到武力所不能办到的阴谋并吞目的。妄想以这种自欺欺人的如意算盘，麻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更企图给同化灭种开辟道路。

我在伪军中的特殊地位

1937年我从日本陆军专门学校结业后，被调到沈阳“训练学校”（其前身即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任上尉教官。我借同溥仪的关系，利用同日本“华族”是亲戚的关系，以“日满亲善标本”为幌子，打着自己向上爬的如意算盘。我成了多方拉拢的对象。

在中国人的伪军官中，有的称我为“士官老前辈”，有的叫我“小老弟”，特别是在留学过日本陆军的人，更对我表示“亲热”。中级以上的老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得过且过”，志在保存饭碗，有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特别是在敌伪末期，贪污行贿、走私贩毒几乎成为常事。在下级

的伪军官中，特别是在刚毕业的少尉中间，绝大多数对日军表示愤慨。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也有极少数接近人民革命方面，还有的消极抵抗，甚至同“日系伪军官”公然对立，至于甘心跟敌人走的究竟还是极少数。我在当时既和日本顾问、“日系军官”圆融无间，又同伪军官串通一气，自鸣得意地以“日满桥梁”自居，觉得自己是个“超然”的存在，更加强了以“日满亲善”为已任的“信心”。

1942年秋至1943年冬，我在伪治安部参谋司第三科当了约一年的参谋科员。“治安部”的伪大臣为于琛激。

当时，我是在第三科第二班任班长，专门担负伪军的教育训练和伪军事学校的工作。那时，被认为在军事、政治方面比较重要的科，如第一科（作战）、第四科（宗教）、第五科（航空）和第六科、第七科（铁路警，归关东军指挥调动，由伪军事部供经费）等，上层则是日本人，甚至全是日本人。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五册）

伪满时代的溥仪

爱新觉罗·毓塘*

周克让 李澍田 吴大虹 整理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而

* 爱新觉罗·毓塘溥仪的远房侄辈。其父溥伟与溥仪系同曾祖兄弟。1932年，溥仪爬上了伪满执政的宝座，毓塘则来到长春，在“宫内府”学习，陪伴溥仪，直至伪满覆灭。嗣后，在苏联战俘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都和溥仪在一起，是溥仪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毓塘是吉林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

溥仪却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儿，被偷运东北，充当傀儡戏的主演，紧锣密鼓，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场丑戏共演了14年之久。

1932年3月，溥仪身穿大礼服在“新京”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执政府开始时，是在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后迁到原吉黑樵运局和盐仓旧址（即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及其西院长春市第70中学和回族小学）。发表了《建国宣言》，据说这个《宣言》，是张勋复辟时“辫子兵”的参谋长万绳斌起草的。

当时北平的旧王公子弟们，听到消息，纷纷蠢蠢欲动，认为又有了“盼头”。溥仪开始拼凑班底，招揽“旗罗伞报”，俨然还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这时，以充当“护卫”的名义，被召到长春来的。

初见溥仪

1932年8月初，溥修从天津静园派溥仪的原侍从福隆阿（当时40多岁）到北平找我们，并规定日期到前门车站集合。我们乘火车到塘沽，改乘轮船经大连，再换火车抵长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这一行人有：马元通（旗人，后充警卫处警卫）、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长）、晏光（旗人，后充伪满飞行队中尉）、庄王府溥绍之子毓懋、怡亲王后代恒枢载澜之子溥俭（即我俭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车后，住在站前一个小旅馆，等候第二天入“宫”叩见“天颜”。阴历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领这一帮八旗子弟到伪宫内，按着皇宫的规矩，由奏事官派随侍吴天培（溥仪由天津静园带来的贴身侍从之一）引入，就在这天上午，在缉熙楼正式“引见”。溥仪站在楼上的晒台，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瓜皮缎帽，还戴着他那个特制的近视墨镜接见我们。这时，跪在下面的这些八旗子弟，囿于传统的宗法观念，确实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召见”。我

们在楼下院内先行“三拜九叩礼”（拜三次，每次叩三个头，故称三拜九叩礼），然后跪着聆听“圣训”。但是并没有听到说啥，只听说：“你们都来啦！以后好好学习。”又告诉吴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俭、毓嵒留下。”溥仪就退回楼上西南角他的书斋。吴又把我们叔侄引上楼。我们一进楼看见趴在楼门旁的两只大狮子狗，吓了一跳。吴说“不要怕，这是从天津带来的，可‘仁义’啦！”上楼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书斋里，再行那繁琐的“三拜九叩礼”。礼毕，溥仪叫“起来”。这回不象方才跪着听了，而是站着低头听。为什么单叫我们爷俩？原因是他人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对我们尊邸的重视，用这个来笼络人心。溥仪问我们都多大岁数啦？念过书吗？在京时常见二位主子（指荣惠、敬懿皇贵妃）吗？而且问得还比较亲切。当我们一一“上奏”后，便说：“下去吧！”我们这些被召见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门”东边那两间房。虽然这里与溥仪近在咫尺，但象远隔重洋一般。不久这些人全部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以备给溥仪当“护军”，作他的守卫亲兵。

军事训练班

溥仪办军事训练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亲信武装。他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也作过恢复“大清江山”的美梦，所以还要象前清那样，宫廷门外设御林军。而这些人又必须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扩大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亲兵骨干。

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是溥仪自己决定成立的，由警卫处长佟济煦负责。佟是郑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时，带入宫内充当“堂郎中”的亲信，后来跟溥仪在天津，侍候他，并专给他照相，又跟随来东北，是宫内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

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侍从武官叫金纯善，专管军事训练和学习；又派严桐江来管理班内总务。严与李国雄（大李）、赵荫茂、曹宝元、吴天培等都是1921年前后收进来的。当年黎元洪任大总统，对宫内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监，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童仆。这些人入宫侍候溥仪，后跟到天津静园，现在又随来东北，是溥仪的亲信随从，一直跟到伪满垮台为止。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一）军事学，由伪军政部派来两位助教担任：一位是李学明中尉，一位是魏树桐少尉。（二）“四书”、“孝经”、“掌故”，由近侍处长陈曾寿教。陈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静园时，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等同为溥仪的“股肱”。他这次跟溥仪来东北，原想当个大官，结果没弄到手，溥仪只好安置他到身边，以示优隆。他讲“掌故”都是依据《东华录》，虽然他的湖北口音难懂，但讲的材料丰富、娓娓动听。当陈老师不在时，掌故部分，由商衍瀛讲。商老师也是清朝的遗老，广东驻防旗人，清末翰林，当过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还和张学良有过联系，是东北卅字会的名流。这时也来到溥仪身边，所以也给我们学生讲课。（三）“数学”，由宫内府警卫处职员谭老师讲授。（四）日语，由掌礼官岸名幸基（日本人）教，学习时间是一年。成员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还有从天津带来的随侍霍福泰。他是沧州人，会武术，后来也成了溥仪的亲信随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沟，最后还为“善后工作”而奔走。

训练班的那个院，后来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当时的房子是原盐仓的青砖瓦房仓库。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也是溥仪为当“皇帝”做准备的时期。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皇帝登基”。

“护军事件”

1934年3月，“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为“皇帝”。这时，他的亲兵——护军也成立了。

护军总队队长由佟济熙兼任，下分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是吴天培，第二队队长是李国雄，还有第三队。佟戴少将肩章，吴、李戴中校肩章，与伪满军不一样，肩章是顺着肩的。护军共300人，其中有三部分人：（一）由天津带来的原在静园的护卫，多是沧州人，都会武术；（二）从东北招的蒙古族，胳膊粗，力气大；（三）由军事学习班训练出来的八旗子弟，除毓懋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末年，当伪军少校，我们从长春出逃前，他来宫中串门，也跟去大栗子，后来听说他投奔他姻亲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从事建筑工作，现已退休）外，全部当了护军。我被分到二队当上等兵，俭六叔当少士班长。我们这些宗室多在这个队。

伪皇帝登基，去长春西郊祭天，那些场面，我虽未亲临其境，但他们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记得3月1日那天，在其伪宫内府勤民楼举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时，溥仪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赞引官宝熙引导，后扈官胡嗣瑗随后，回宫后又换上大元帅军服。因为那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中和门西侧站岗，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地站大岗，而是近在咫尺，为“皇帝陛下”护驾，如同过去在宫内的“乾清门七品带刀侍卫”一样。

寒来暑往，为溥仪站了3年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仪调离护军，一同到宫内，与新从北平来的我们惇邸的子弟共同读书。这时，这支护军，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蓄谋搞垮这支溥仪

的私人武装。1937年6月28日，趁星期日护军放假，去逛大同公园（今长春市儿童公园）时，日人制造摩擦。据护军们回来讲：当时，他们欲买船票准备划船，旁边并没有日本军人，只有几个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来这些人也去争购船票，因而与护军发生争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这些会武术的沧州人和胳膊粗、力气大的蒙古人给打败，并踢死了狼犬。旋即关东军宪兵队出动，逮捕了护军多人，并用电话通知宫内府。最后还是溥仪告饶，派佟济煦赔礼道歉。这就是“护军事件”。善后的处理是佟济煦当了替罪羊，罢职丢官，警卫处改组为皇官近卫处，换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为处长；人员减少，变为警察性质；原来的长枪一律收缴，改佩短枪。溥仪这一点可怜的私人武装，也不准存在了。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识地给他的高级奴才一点颜色看看。

伪宫廷院内的布局

伪皇宫虽然面向南有两个大门，但同德殿前面的那个大门，从来关闭，只走西边的大门（即今长春市第70中学的西南角大门），然后再从面向西的兴运门入院。入门左侧有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办公），通常以中和门为界，以北为办公事的地方，叫“外边”，以南就是溥仪居住的地方，叫“内廷”。缉熙楼就在内廷，而勤民楼则属于外廷，溥仪就在这里接见和“办公”。后盖的同德殿，则是溥仪“便见”的场所。对比起来，同德殿还现代化一些，接见外宾，有时就在这里。但在此处被召见的人，又均须从中和门那幢房东头的小角门穿过去东院。象日本裕仁天皇的弟弟除了秩父宫亲王是1938年5月来访时，同德殿尚未竣工外，其余的如1940年6月来访的高松宫亲王，1942年8月来访的三笠宫亲王，还有1939年5月来访的昌德宫李王垠

和1942年6月来访的日本皇族闲院宫春仁，以及后期的几任关东军司令官，都是从这个小角门到东院去觐见的。

1943年春，汉奸汪精卫来东北，溥仪是在勤民楼接见的。当时未等溥仪下座，汪抢先向溥仪行三鞠躬礼，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两个主角的合演。溥仪因与汪有杀父之仇，在汪未来之前，曾很伤脑筋，不接见吧！又怕日本人见怪，最后，还是看在日本主子的面上，真个化敌为友了。随同来的还有汪的秘书溥德（恭亲王溥伟之弟），也同汪一齐行了鞠躬礼，因而受到了宗室人们的普遍谴责，说他怎么能同汪精卫一样呢（意思是应该行三拜九叩礼）？汪来东北时，到处声嘶力竭地高喊：“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永远是同胞。”颇又迷惑了一部分人，甚至还有人认为“汪精卫不一定是真心给日本鬼子当傀儡”。溥仪在宫中还对汪赐宴。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帝室御用挂”这个名词是日语，有的翻译为皇帝机要秘书，我看不如说是皇帝的看管人或大管事更为妥切。

这位日本军人，是个矮个，高颧骨，留个日本式小胡子，长得一脸横肉。据说溥仪在天津时，他经常出入静园给“讲时事”。后来，溥杰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他当战史教官。我是1937年认识他的。当时，他只是中校军衔，不过他军服前经常挂着参谋带，因为他还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出入宫内，高傲无比，对我们学生从不理睬。10年间，逐级晋升为陆军中将，他是溥仪的监视人。溥仪对吉冈安直是言听计从，吉冈就成了关东军和溥仪中间的传话筒。溥仪每次接见外人，他是照例参加，站在最前面。对宫内看管很严，例如有人求见溥仪，由兴运门入内，先到奏事处，正东面就有与吉冈通气的日军宪兵队，看得

清清楚楚。假如奏事处引见，经过中和门时，日本宪兵队更要严格记录。总之院内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记录，只有我们学生例外。“七·七”事变前，还不严格，以后一天比一天紧，甚至溥仪到了沈阳被苏军俘获，吉冈在旁边还向苏联将军要求允许溥仪去日本，日本的宪兵曹长浪花还一步不离，一直到通辽下飞机，才被迫与溥仪分手。他与溥仪谈话，不用翻译，有时用他那日本式的英语与溥仪交谈，经常使用的是“协和语”。

建国神庙

1940年，溥仪去日本庆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庆，接回来了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坂琼勾玉。这3件东西的模制品，在日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

溥仪秉承关东军太上皇的意旨，在同德殿东南角院外，又修了一座用白木头造的建国神庙，进院子的通道上铺了白、红、绿三色的雨花台石子，在庙内供上了那3件宝。现成立了一个祭祀府的机构，由退役的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陆军中将桥本虎之助任总裁，清廷的旧臣沈瑞麟为副总裁，还为此颁布了一个《国本奠定诏书》。每月初一、十五日，溥仪带头去神庙祭祀，全东北的人民也被迫每日向神庙遥拜。这种愚民的事情，一直搞到伪满垮台为止。

溥仪与日本人

溥仪和日本主子的关系，是傀儡和主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七·七”事变前后又有所不同。以前日本人在形式上还留点面子，有些重大事情，还要走走“御裁可”的过场，一些伪大臣们还要不断地去勤民楼觐见。那时候每天都唱“国歌”（据说是郑孝胥作的词）：“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这些鬼话，固属荒诞不经，然而却如实地道出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万恶罪行，也逼真地勾勒出一副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形象。尽管如此，那时溥仪为了当傀儡皇帝，确实在骨子里真跟日本人“一德一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主子对这个傀儡在形式上也不怎么需要了，索兴“过场”也不走了。所以在溥仪的心中，就是维持个“皇帝”名义，“保命”就行，对日本人更加奴颜婢膝。假戏还得真唱，这样的场面很多，如伪满后期，“大东亚战争”已经筋疲力竭的时候，吉冈来和溥仪谈，要他对“圣战”有所表示，溥仪满口答应，并立即执行。他下令把伪皇宫的铜物器皿、宫灯、楼梯扶手等都卸下来，进行“金属献纳”；把自己的一些不值钱的日用品，也交出来表示他个人“献纳”的忠心。但是真值钱的好东西，包括他的白金表却都藏起来。还听说他第二次访日时，见了日本皇太后，又行礼、又搀扶，极尽阿谀之能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春天，在同德殿南晒台上，他接见日本青年“敢死队”时，我们几个在他身后不远的屋内偷看热闹，亲眼看到庭院内站着一帮龇牙咧嘴的“肉弹”，他们都是准备“玉碎”的日本青年兵。溥仪在上边，一面讲话，一面痛哭流涕。我们这几个都感到他在那里“演戏”，由于这种闹剧，演习惯了，所以虚伪也仿佛真的一样，表演时动作自如。在大栗子听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那个动作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登峰造极的表演。

（摘自《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伪满宫廷见闻琐记

孙喆姓

傀儡皇帝上场

(一)“帝出乎震”，袍褂登场

1932年5月，溥仪以伪满洲国元首——执政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会见了“国际联盟调查团”。在短短的20分钟内，按照日本人事前布置好的一切，象鹦鹉学舌似地和调查团长李顿做了简单的对答，既替日本人侵略打了掩护，也为自己脸上擦了粉，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赞赏。实际上，日本人早向国联调查团行了巨贿。溥仪和调查团长李顿的对话，也只是假戏真做，走走形式，掩人耳目而已。

日本人为进一步利用溥仪，于1933年10月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正式通知溥仪说，日本准备承认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消息传来，溥仪如承“天封”，一时竟忘乎所以，准备自己“龙袍加身”；股肱之臣，也都要翎顶袍褂起来，开始演一出大登殿了。然而事情并非尽如人意，日本人只是同意他当“满洲国皇帝”，并不承认“清朝复辟”，反对“龙袍玉带”、蟒袍花翎，要求溥仪只能穿着大元帅正装礼服登极。最后经过“行走”们反复周旋，达成调和，于1934年3月1日的早朝，在长春（改称新京）南郊杏花村筑起的一座土垒的“天坛”上，让溥仪穿上特由北京送来的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光绪当年用过的龙袍。溥仪仿照祖制，象做戏一样怪模怪样地行了告天即位大礼；然后回到宫内府，又卸下古装的龙袍，换上陆

空军大元帅正装礼服，登上“勤民楼”大厅，举行登极典礼，当上了新“皇帝”。典礼上，由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上将张海鹏（绰号“大麻子”）站在两旁，分由侍从武官、侍卫官们陪列两侧。正厅由国务总理秃翁郑孝胥为首，率领文武百官（日、满混杂）进行朝贺，溥仪“龙颜”大悦，如登春台。当晚大摆家宴，宗室觉罗三代同堂（来自京、津各地的载、溥、毓三代），行三拜九叩大礼。

为了庆祝这次大典，“举国”欢腾，宠赐优加，向官员们颁发了胸佩式的银质褐色圆型圈边的“大典纪念章”，正面是双凤朝阳，中间四个大字：“帝出乎震”，背面是康德元年3月1日大典纪念。

（二）过海成龙，溥仪访日

溥仪登极重称皇帝之后，诚然是头脑发胀，想入非非，果真梦想恢复祖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察到日本人“皮里阳秋”，与当初请他出关的承诺条件大相径庭。他心里狐狐疑疑，感到不是滋味。然而退一步想，日本人在对他恢复帝制上还是履行诺言的，他们事事不撒手，也许是因为邦基未固，需要“友邦”“无私的”援助。他有时也打卦问卜，若逢“乾乾卦”象，便兴高采烈，认为是大吉大兆；若遇“水火未济”，就感到懊恼，大失所望。

1934年4月，溥仪不知爻出什么喜卦，忽然得到关东军通知，日本天皇裕仁邀请伪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以敦两邦友好之情。溥仪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为了“日满亲善”，当然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按照关东军的计划，按日、按时“启驾东游”。在大连登上日本战舰“比睿丸”。在飞机舰队的护航下，飘飘然横渡日本海，直抵东京附近的横滨登陆，受到隆重的“礼遇”；鸣礼炮21响，乐队作乐，裕仁亲自迎接，检阅仪仗队，然

后设宴招待，元老重臣们拜谒祝贺。这些，足以使溥仪认为是“以诚相见，亲同手足，昭如日月”了。裕仁的母亲、“皇太后”，还一破常规，在后宫里宴请了溥仪，乃至亲贵的妃嫔们也是隆礼倍加，极为尊崇。这就使溥仪更认为自己和裕仁真同兄弟般的平等了，自己在满洲的地位和裕仁在日本的地位也一样是“至尊至贵”的，日本人对自己也应该是象对天皇一样的“忠诚”。溥仪昏昏然了，所以一回到满洲，他便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文曰：“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朕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与友邦一心一德”，“人类福祉必可致也”。继又下令，立即把在京（长春）的简任官以上的官吏，不分国籍民族全部召集来，溥仪亲自训话，发表了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讲话，宣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皇帝陛下和天皇陛下“亲同手足”云云。复用推理逻辑得出：“日本人不忠于满洲皇帝，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满洲人不忠于日本天皇，也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

伪满宫廷内外

伪满的皇居宫廷，是溥仪办理政务和起居生活的地方，为了区别于日本东京的“皇宫”，改称“帝宫”。而实际一般人仍多称之为“皇宫”或称“宫内府”。

（一）帝宫所在及建筑物情况

伪宫坐落在旧长春市的东北方向，系原长春“吉黑樵运局”的旧址。当地人俗称“盐仓”。因此有人说，溥仪住进了盐仓，必要成为一条咸（闲）龙。樵运局原有三幢二层楼房，还有平房若干间。伪满成立后用做“执政府”，后又经修缮整理，

增建部分房屋，便用作宫内府了。

宫内府 正大门面南开放，院庭分内、外两层。外层由2.5米高的宫内府围墙环筑而成。墙身下接台座，上接墙帽，各有“水刷石”条带框一条，中间抹赭赤色墙心结合而成。大门正面系三组共六座不等高式的方形门柱对称分列两旁，中间一组最高，安装有对开双扇铁花门一组。比邻一组稍低，分列左右。各装有单扇铁花门一槽。铁门下均装有滑动门轮，开闭在铁轨上滑动。门柱上均装有照明灯，实用美观。另一组接墙门柱与铁门门柱之间，有弧形抱壁相连形成整体。宫内府外观虽非雄伟壮丽（尤其是与北京紫禁城相比，连一座王府也不如），但远近相望，红墙铁门整肃壮观，也十分醒目。由正大门西行约100米处，另开有侧门一座，系禁卫军机关部队通常出入的通道。门内庭院，前半部有禁卫军司令部各科室礼堂、会议室、饭厅等，后半部则为禁卫步兵团兵舍及应有的附属建筑。另有骑、炮兵连驻军在南岭兵营。

由宫内府正大门北行是一段上坡路，约80米处则系“帝宫”所在，另有围墙，较外墙为高，森然庄重，紧密严实。正门曰：“承光门”，面西而设，与南向的正大门成90度角方向。内外围墙均修筑有了望岗楼、哨所，常年有哨兵守护。另有巡察线路，巡察检视官兵游动其门，日日夜夜，常年不懈。

进入“承光门”帝宫内部，主要建筑有：“三楼”、“两殿”，及一切应有的附属建筑，如膳房、花园、球场、滑冰场、假山、防空地下室等。

“三楼”系原権运局旧有建筑。“两殿”为伪满新增扩建的房屋。主要建筑均由溥仪亲自命名定称。三所楼房曰：勤民、缉熙、怀远；两殿曰：同德、嘉乐。

勤民楼 是溥仪平时理政办公和节庆日举行典礼朝会宴飨

的地方。“勤民”，采“勤政爱民”之意。把他自己的办公室又命名曰“健行斋”，是取自《易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义。开始“登极坐殿”，打叠精神，“日理万机”；可是时间不久，便感到“勤政无权皇帝假，爱民乏力空有楼”了。此楼下还有贵宾室、候见室等。

缉熙楼 “缉熙”，出自《诗经》“于缉熙敬止”，希国家达到光明和乐的境地。在“中和门”之内，为溥仪寝宫后室，属于内廷，按章非承召见之人，均不得擅入。溥仪和婉容就分居在这楼的东西两头，但很少见面。贵人谭玉龄曾住此楼下，白天谈谈笑笑、说说唠唠，但夜晚，仍各归各室，互不相扰。除皇后（婉容）、贵人（谭玉龄）外，楼中还有少数眷属。溥仪特设的中药和西药房也在楼内。楼下还专设有小客厅一处，原为接待皇亲国戚、勋臣故旧，谈心叙事之所。可是日后，常来常往，经常出入这里的，却是一个自称和溥仪是“脚趾”关系的“准家属”，帝宫内头号日本特务大总管、太上皇、皇帝的“御用挂”（专属之意），名叫吉冈安直的日本军人（中将）。

怀远楼 “怀远”，自然是对祖德宗功，有慎终怀远之意。是供奉祭祀觉罗列祖列宗的祖先堂所在，也是供佛诵经做佛事的场所，因此文圣孔子、武圣关帝和如来佛都各占有堂位。此外听说还有对清朝肇业有过恩德的人和神也享有奉祀等等。尚书府也在怀远楼上设有办公地方。

溥仪受制于人，过着傀儡生活之后，心灰意冷，悔愧万端，无以自拔，经常跪在列祖面前忏悔，到佛堂上祈祷求救。

同德殿 寓“同德相求，同心相应”之意。原本为显官重臣们讨论研究国家大事、论政决策的地方。然而事实证明，国家大事却有人另在东京研究讨论；决策则多由关东军司令官、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制定。问及“总理”有关国务的事宜，“总理”

只能回答说：“总务厅长官在办”。问及各部大臣“总长”，依样答复是：“次长正在办”。而总务厅长、各部次长则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实际讲来，溥仪以下伪满官员，只能喊“日满一德一心，建设王道乐土”；掌权的都是二号人物，什么“次长”、“次官”之流。中国人的什么总长、大臣们，除了拿薪水吃饭以外，什么都没有份儿，也没有可做的事。谈到拿薪水，还有一段插曲。事情发生在伪满建国伊始。一次国务会议上，讨论所谓的“给与令草案”，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薪俸标准问题。草案早由总务厅印好，即会分发给总长们讨论，走走形式，准备定案颁发，照令实行了事。本来，若事不关己，总长们已经明白：提出异议，也是自找无趣，因此一向都是“举手赞成”。而今天，总长们一看草案内容规定，“日系”的薪俸比“满系”高得多，一般的同等官要相差40%。就以各部次长（日本人）为例，比满人的总长也要高得多。利害攸关，大官们忍耐不住了。此中自恃有点靠山的、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有师生之谊的财政部大臣熙洽首先提出异议说：“我们既然是一个复合民族国家，就要一德一心，各民族就该一律平等。为什么在薪俸上，日本人要享受特殊待遇？这个草案定得简直不合理！如果说是个‘日满亲善’，就该有亲善的表示，拿高薪能算亲善吗！”继之，丁鉴修等也纷纷发言，要求不分厚薄，“一视同仁”。结果日本人的“总务厅长”驹井、人事课长古海说话了，说：“要想一视同仁讲平等，须先看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待遇要高；何况生活程度也不同，日本人生来就是吃大米的，满洲人吃高粱米就是上上的。要讲亲善，给日本人高薪才是亲善吧。”大家听了憋一肚子气，当然不满，闹个不欢而散。结果还是关东军作出了决定：为了满足总长的利禄要求，把总长们的薪俸额一律提高，和日本人的次长们平等（同一标准）。但是，

驹井传达说：“日本人为了帮助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决定在薪俸之外给日本人官吏以特别津贴。军方已做出决定，不能再有争执了。”多数大臣们认为已加了码得了利，不想再找无趣。独熙洽自恃系日本留学生（士官毕业）和军方人有些联系，很不平气地说：“我争的不是钱，不过我要问问，日本人在哪个地方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我们满洲国吗？谁请你们来的？没有满洲人，你们有能力就能建设吗？”这一言冲了驹井肺管，不禁拍案大吼道：“你还是一个满族人，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用生命之血从俄国人手里夺来的。你懂吗？”这一闹，熙洽憋一腔闷气，回到家里把恩赐给他的30万元“建国功劳金”摔到地上，叫家人交给张燕卿、谢介石转退给关东军以示抗议。而谢、张二人揣情度势，一怕到关东军那里碰钉子，二又见钱眼红，何不一举两得，干脆来个“二一添做五”各得15万元。同德殿，有殿无德空悲切。

嘉乐殿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嘉乐殿和同德殿一样，都是皇帝即位后新扩建的殿堂，采用民族形式，宫殿彩色，修得有些“古香古色”，别有雅致风味。本来是举行集会的场所，可以说是召宴群臣欢聚，赐酒开筵乃至大喝香槟酒，大吃山八珍、海八珍、燕窝鱼翅之所。然而真正的嘉乐并没有。溥仪逐渐精神空虚、心绪日烦，到后来连荤都不想吃了，还有什么嘉乐之兴呢？

建国神庙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名义上是参加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大庆，但真正的使命则是迎接“新祖宗”，日本的建国大神——“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是个什么神，勿庸多谈，日本天皇就是大神的神裔，因此每代天皇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称天皇为“现人神”。日满既然是精神如一

体，就不能不奉祀这位“干祖宗”。大神具体有3件宝：八咫镜、御汰刀（另名记不清）、八坂琼曲玉（被溥仪说为勾玉的）。

溥仪把干祖宗迎接回来，遵照太上皇的意旨，先在宫内府修建起日本神社式的“建国神庙”，以此做榜样，伪满到处都建起日本式的神庙。在宫廷内设立了“祭祀府”，置“祭祀府总裁”，规定每逢初一、十五，以溥仪为首，连同关东军司令官以及“满洲国”的官员们，均参加致祭。全国各地也都遵章按时致祭。另外还要求凡路过“神庙”附近的人，都须面向庙，立行90度鞠躬礼，以示崇敬。然而由于中国人“纲常伦理观念”最深，这项要求引起了人民极度的反感和厌恶。因此凡有神庙的地方，行人都绕道而行，表面上“敬鬼神而远之”，背地里则是“骂不绝口”。东北人对此厌恶反感，不言而喻。

溥仪对迎接“天照大神”这件事，也是象在“疮疤上撩了一把盐”，苦痛在心。他在第二次迎神访日归途中，曾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后来从不穿规定的祭祀服。据溥仪自己的记叙，他每去“神庙”行祭之前，总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北京坤宁宫（紫禁城里过去祖先所在地）行礼。

（二）宫廷内的机关人事和职责

伪满皇帝的宫廷，虽比不上北京紫禁城的宫廷和日本裕仁的宫廷那样“富丽堂皇”，机构也不及前二者的臃肿复杂，但相对一般机构而言，它也还是庞大的，而且内部情形反而复杂得多。兹简述如下：

宫廷内设有“宫内府”、“尚书府”，后又有“祭祀府”。之外，还有侍从武官处、护军、禁卫军等机关部队，负责保卫宫廷和皇室。

“宫内府”设有总务处、内务处、掌礼处、近侍处、侍卫处、警卫处、秘书处等，据估计从事各项业务的职员，就有七百人之多。

“宫内府”大臣先后有沈瑞麟、宝熙、熙洽，次长是日本人。

总务处先是许宝蘅，后来也换了日本人。

内务处长先后有商衍瀛、罗福葆、刘杰三等人。

掌礼处长不详。秘书处处长胡嗣瑗、陈曾寿等人（陈曾任皇后婉容的老师）。

近侍处长先后有陈曾寿、佟济煦、溥佳、毓崇等人。

侍卫处长先后有工藤忠（日系）、溥佳（改名金智元）、陈懋侗等人。

警卫处长先是佟济煦，护军事件后换日人长尾吉五郎。

“尚书府”大臣先是郭宗熙，后任袁金铠、吉兴等人。外有秘书官长，日本人。

“祭祀府”总裁是日本人桥本虎之助，副总裁沈瑞麟。

侍从武官长先是张海鹏，后任张文铸。

侍从武官处是皇帝侍卫机关，对溥仪人身安全直接负责。侍从武官长则系专陪伴溥仪的最高武官，一向由上将军衔的老资格武官充任。每当“御巡狩”、“御临幸”，以及举行各国典礼仪式时，武官长必在皇帝身边相伴随，以示皇帝的尊严威仪，并保证其安全。武官长以下有若干名侍从武官，一般由上校、中校军官充任。调任的侍从武官必须先得溥仪的同意，因此以亲属贵戚出身的人居多。通常在溥仪例行各种典礼仪式时，作为伴行人员相随，负安全保卫责任。

禁卫军 原称翊卫军，后改禁卫队，归伪军政部直辖，专任宫廷内的安全保卫警护戒备责任。设有禁卫队司令部，下辖禁卫步兵团、骑兵连、炮兵连等部队。通常除承担宫廷警卫戒

备外，还有派出仪仗兵或随行警卫兵的任务。军官中有少数日本人的校尉级军官，被称谓“日系”军官，实则是放在军队中的监军、特务。禁卫军首任步兵团长郭文林上校是蒙古族，后作兴安省军管区司令官。继任禁卫队（改称后）队长是步兵上校任广福，后期任第四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再后禁卫步兵团长是步兵上校于宗谦（于芷山之子）。1936年后，禁卫军扩设司令部，先后由陆军中将李文炳、王克震、张明久等充任司令官，直至日本投降。

护军 不同于禁卫军，不属于军政部管辖，也不在宫内府编制之内。护军共有300人，完全是由溥仪私人的帝室费出钱养活的贴身亲信武装卫兵，专负帝宫内皇室的安全警护之责，大部由满、蒙族人所组成，不分兵种，平时训练以武术拳脚，扑打擒拿或枪击为主，由警卫处领导。护军军官一般称“武官”，实际就是教师爷，没有日本人。这支武装表面是皇室的卫队，但溥仪豢养他们真正的却是以其为基干核心，以便将来扩大自己的亲信武装势力。这支卫队也可以说是皇室的羽翼死党，因此很受日本人的警惕和猜忌。所以关东军对此也十分瞩目，这就是后来发生护军事件的内在原因。

侍卫处 处长以下有侍卫官若干名，在宫内府编制之内。侍卫官分一、二、三等，均由皇帝国戚或勋臣后裔充任，经常出入内廷，为溥仪身边更亲近的武官。

“日本宪兵” 在溥仪帝官之内，负有保证宫廷安全和溥仪人身安全的责任。除有上述侍从武官处、侍卫处、警卫处、护军、禁卫军等机关部队以及武官等等外，更有负特殊使命的“日本宪兵”。这一小撮来自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派的一群官不官、兵不兵的人，名义上是保护皇室、保护溥仪的，实际上则是宫廷“监狱”里的刑警狱卒。他们在“御用挂”的直接指挥

下，监视着宫中的一切。

现将溥仪身边宫廷里的高官近臣，人事关系简介如下：

沈瑞麟（后任祭祀府副总裁）：清末遗老，辽宁地方绅士，有财有势，与袁金铠等在张作霖时代名噪一时，炙手可热。

熙洽：字格民，觉罗远支宗室，早年参加宗社党，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张作霖时代曾充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的参谋长，伪满成立后任财政部大臣，后调任宫内府大臣。

宝熙：字瑞臣，宗室豫亲王多铎九世孙，翰林出身，曾官拜礼部侍郎、府中令等职。

胡嗣瑗：字琴初，贵州人，翰林出身，历官翰林院编修、内閣左丞。伪满特任官宫内府秘书长等职。

陈曾寿：字仁光，湖北人，进士出身，历官监察御史、学部侍郎，皇后婉容的老师。

佟济煦：福建闽侯人，历官内务府堂郎中。

商衍瀛：翰林出身，历官懋勤殿行走。

万绳栻：复辟时张勋定武军参谋长，历官内阁右丞。

郭宗熙（尚书府大臣）：字侗伯，翰林出身，张作霖时代黑龙江省长。

袁金铠：字洁珊，辽阳人，秀才出身，历官四品京堂，张作霖时代军、政两署秘书长，一贯为张出谋划策，深得信任。

罗福葆：字君羽，罗振玉之子，日本留学生。

溥佳：宗室亲贵，贝勒，载涛之子，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改名金智元。

陈懋侗：陈宝琛之子。

吉兴：满族，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伪满先任第二军管区（吉林）司令官，后调宫内府大臣。

张海鹏：张作霖盟兄弟，绿林好汉出身，张作霖时任洮辽

地区镇守使，伪满初任第五军管区（热河）司令官，后调第一任侍从武官长，绰号“张大麻子”。

张文铸：旧东北军旅长，伪满第三军管区（黑龙江）司令官，后接替张海鹏任侍从武官长，晋上将军衔。

伪满皇帝的权力和地位

1934年3月1日，就在溥仪受命“登极称帝”的同时，颁布了所谓的伪满“组织法”（相当于宪法性质）。“组织法”里明文规定：“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即由皇帝统揽统治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归属于皇帝溥仪：“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不负刑事责任，国务上也无回答之责。一句话，皇帝拥有最高最大的权力却无任何承担的责任或过失（不受法律限制）；“皇帝还拥有统帅权”以及发布各种法令和命令，即有统率陆、海、空军，颁布“紧急令”，掌握大赦、特赦权等。

但是，实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代理人——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充分控制溥仪，真正掌握统治伪满的大权，极力夺取皇帝头上的太上皇的地位。一扫伪满“组织法”中规定的内容，于1936年9月18日，即日本侵入东北5周年之际，另起炉灶泡制了一篇名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文章，其中有一节专门阐述日本天皇、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皇帝之间的瓜葛关系。其文曰：“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日本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皇帝的天职。”本着天皇意旨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合理化建议”，为了保全伪满皇帝之尊严和溥仪这块“金字匾”，在关东军内部特设了一个“第四课”，溥仪身边挂上了一个“御用挂”。

(一) 皇帝的地位和尊严

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组织法上的明文规定。具体表现在“御巡狩”、“御临幸”时的威仪；奉祀“御真影”和奉读“诏书”、“敕諭”的严肃。在一切满洲人的面前确是如此，在内宫亲族奴仆面前就更是如此。然而在太上皇内部指导的面前，溥仪就完全失去了皇帝的尊严，更谈不到不可侵犯了。

御巡狩 所谓“御巡狩”就是溥仪遵照关东军的意图、指示，每年到外省或外地进行观察巡视。这是宣示日满“一心一德”、皇帝尊严的一种假戏真做的形式。从宣布出巡到御驾出宫，经过沿途到达目的地，到处警卫森严、繁礼缚节，十分庄重。后台操纵和导演的是太上皇关东军；配角是国务总理和有关大臣、军管区司令官、省长、市长之流；跑龙套的是随行的警卫、侍从官员以及各地方的警备部队等等。

1938年一次去奉天巡狩，出巡之前，“首都”（长春）车站内外先行安全大检查，对来往乘客严加盘询检查，对通行便路严加封锁；到处加设岗哨，同时把车站内外的建筑、室内室外打扫洁净、粉刷见新，以示敬重。出行当天，机关、部队、学校，以及沿途铺店门面均悬挂伪满五色“国旗”。沿“车驾”通路先满布军警，面向外立，禁止路人通行；另有军警巡察，监视两旁店铺或住户有人出入，禁止有人在窗口上探头张望。在宫内府正门外马路旁，有由禁卫步兵团派出的“仪仗队”，捧持军旗、持枪佩刀，排列整齐。车驾通过时，奏号音，军官行撇刀礼，士兵行据枪礼（上刺刀），确是威仪赫赫、无上尊严。车驾出动前，全市即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在车驾之前，最先头是浇道泼水的净水车，再次是军警乘坐的插有小旗的导行车，然后就是所谓的“卤簿”车列。车列前头是“警察总监”，坐着一辆红色敞篷汽车，随后有四辆全红色的三轮摩托车护卫

在“銮舆”的两侧，车上乘坐的护卫军官四人例由禁卫军指派少校或上尉军官佩带勋章、手枪充任。

万寿节（正月十三日溥仪诞辰）祝寿的仪礼形式：伪满的万寿节即溥仪的诞辰纪念日，系旧历正月十三日（后改阳历2月16日）。从历史上看，封建皇帝的生日是当时一件大庆贺日。不独是当朝的文武大臣都要煞费一番心机，投其所好，就是商人、投机分子们也要挖空心思，争作一笔应时的生意，从中渔利；甚至也仿效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一样，在全国放假一日。然而溥仪在伪满时期，万寿节的庆祝却从未象祖制那样辉煌煊赫。具体情况是：一般在皇宫勤民楼内举行祝贺仪式。每年万寿节，在长春的有资格参加祝贺的文武官员们，当日按时分批进宫朝贺，宫内府禁卫军军官以上均有份参加。

届时，勤民楼礼堂内悬灯结彩，倍极装饰，为庆祝仪礼准备好一切。通常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靠北墙根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讲台似的地方。中间放有特制的饰有“兰花御纹章”的御用高背椅。前来参加祝贺的臣子们佩带进宫标志，依次进入勤民楼礼堂，排列整齐。然后伴随奏乐声，溥仪亲临台上，祝贺的人们行90度祝寿礼。溥仪以半躬礼答礼后，静立台上。乐止，臣子们抬起头来，一睹“天颜”。既无祝词，也无答词。礼成，溥仪退下。然后就位赐斟，各饮祝寿酒一杯，即将各自的酒杯作为祝寿的纪念品携带出宫。

酒杯历年不同，但均系特别烧制的瓷质品。记得有一般圆型杯，外面有黄色镶框带“寿”字的花纹，内杯底有团龙金色花纹；有细筒高脚式圆口杯，外面釉质，黄色框边花纹，中间镶有红色寿字，杯内有金色“御赐”两字；有方斗型平底带把杯，四面黄色花纹，内壁素白，杯底有“兰花御纹章”。这些杯造型比较精巧，内杯均用黄缎布包好，外有方盒木函，上盖顶

有金色“御赐”字样，以黄丝绦带十字绑结而成。

万寿节对外虽很简略，但在后宫内室仍袭祖宗旧制：盛开家筵，祝礼拜寿，倍极隆重，一律行跪拜礼，但也只限皇亲内戚才能参加。

为了庆祝溥仪生日，对宫内府警卫部队也例有惠赐酒肉，以示恩宠。

（二）皇帝的权力

首先，溥仪有权发布各种法令和命令，读读伪满洲国史，就可知道溥仪裁可发布的法令和命令为数实多，难于记叙。就其莘莘大端，溥仪自1934年3月到1945年8月15日，颁发的“诏书”就有六种之多，如1934年3月1日“即位诏书”；1935年5月2日“回銮训民诏书”；1940年7月15日“国本奠定诏书”；1941年12月8日“时局诏书”；1942年3月1日建国10周年诏书；1945年8月15日“退位诏书”。

其次，溥仪的例行公事有：每月有三次关东军司令官的例见；每周接见伪国务总理一次——听取伪国务院工作报告；每周接见伪参议府议长，听取他对国务会议的意见报告。

所有这些都是例行公事，纯系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什么事都是关东军方面决定了，写在纸条上，叫他念一遍他就念，叫他签名就签名，叫他裁可就裁可，什么条约、诏书、敕令、法令，概莫例外。

（三）危言震主，杀鸡给猴看

1. 凌升之死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是原张作霖独霸东北时代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顾问兼蒙古宣抚使。迨日本侵占东北，凌升曾为“劝进”的请愿代表，到过旅顺面谒溥仪。由于有功于伪满建国，便当了伪满兴安省省长，在蒙古贵族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威信。而凌升自幼是一个王孙公子，自尊自贵

惯了。从历史上说，他父亲算得上是清室的重臣旧勋。满族、蒙族一向都是北方民族，相互依存拉拢，上层人物中结亲联姻之事屡见不鲜。伪满成立，凌升表现忠诚，愿为“大清”复国尽力。溥仪为了加强自己力量，进一步结好满、蒙间关系，便允把四妹韞嫔（人称四格格）许配与凌升之子，结成亲家之好。谁能逆料，以伪满皇帝亲家、伪满洲国兴安省省长地位的凌升，竟突然被关东军逮捕了。逮捕原因，据军事法庭宣布的罪行是：勾结外国（指苏联）图谋叛变，反对日本。真正的事实谁也不清楚。但宣布的罪行十分严重，依法当诛。结果宣判死刑，而且是“斩首示众”。

后据确凿可靠的传闻：凌升之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实则就是在省长联席会议上，不知深浅地发了几句牢骚话，抱怨日本人太跋扈，至使他这个省长有职无权。这就是“叛逆”，确有点“反对日本”的气味，使他一言丧命。无怪乎做为亲家的溥仪皇帝感到震惊！留在心灵上的却是一个“怕”字。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对溥仪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这一件事使溥仪浮想联翩，他想前思后，悟出了一条奥秘，日本人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即是对日本的态度。他不禁想到被人称为“老豆腐匠”、胡子出身的“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竟最受日本人的宠爱，原因是他十分聪明地会做奴才，专长于替主子说有利的话。例如，日本人说日、满“一德一心”，张景惠就说：“日、满两国是两只蚂蚱（蜻蜓）拴在一根绳上。”日本向东北“拓殖移民”，廉价强购农民土地，遭到伪满官民一致反对，张景惠却说：“满洲土地多，但人是老粗没知识，日本人用新技术来开荒”是“找饭大家吃”。日本人夸他是“好总理”，直到伪满垮台。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粮

草接济困难，进一步向伪满洲国实行压榨，强行征购农民粮谷，美其名曰“支援圣战”。而征购价过低损害农民元气过甚，因此农民反应强烈。部分“大臣”们将此事提到“国务会议”上研究，日本人当然反对。就在这关键时刻，这位“宰相”又出来排难解纷了，他不急不躁地说：“皇军在前方出人卖命，我们在后方拿点粮、流点汗不流血，谁轻谁重，还用说吗？少吃一口粮，勒勒腰带不是什么都有了吗？”内阁首班这样一说，大家只好嘿然通过。这个老豆腐匠，早在张作霖独霸东北时，同样官运亨通。他曾是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还兼任过哈尔滨“工大”校长。有一次因为“工大”学生闹学潮，他以行政长官的资格到学校去进行威吓，大发雷霆，并大骂校长“混蛋”坚决要严惩不贷。有人提醒他：你就是校长，他才悻悻作罢。

2. 会晤德王 由日本操纵的“内蒙自治军政府”的首脑德王原是蒙古王公，早年就和溥仪有过交往，1937年到长春找关东军联系事务，借机请得关东军同意，允许他到伪皇宫探望溥仪。旧友重逢，互道别情；同病相怜，倾诉心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一王、一帝，视景伤情，大有寄人篱下之感。这对“难兄难弟”，话说得离了本题，不免相对黯然，发起牢骚来。谁知“窃窃私语，墙上有耳”，二人所言竟一五一十地被传送到关东军。关东军的替身所谓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竟毫无忌惮地捅开德王与溥仪的私语，提出质询：“昨天陛下会见德王谈了些什么？”溥仪一听，顿感大事不妙，若按实说来，一条绳上系两个蚂蚱，谁也逃脱不了，悻悻于凌升之死，溥仪“急中生智”，假装糊涂死不承认，硬说是否德王说了什么假话云云。因为两个傀儡发怨也颠覆不了“皇军”，无关大事，吉冈就顺水推舟，警告警告，落个好人，就不再穷追了！又是一场惊心动魄事件，溥仪真乃不寒而栗。

3. 护军闯祸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如果说凌升事件对溥仪的威慑是在远处的闪电，而1937年6月的“护军事件”就等于在溥仪的面前打了个响天雷，使他不能不感到惊骇了。

护军是溥仪近身的亲兵。6月28日是星期天，护军部分人员休息，借假日，有二十几人结伴去“大同公园”（原名儿玉公园）^①游玩，被经常在暗中监视的日本便衣发现。通过密谋，日本人无事生非，蓄意寻衅，由关东军驻军抽派一个班，两名参谋带领扮成便装游客，假来公园游玩，结果以争租游艇为由，打起架来。日本人摆出柔道架式，护军则使出武术功夫，柔道毕竟不如武术高，结果闹事者被打得落花流水。关东军恼羞成怒，放出了警犬。护军见势不妙，被迫踢死一条狼狗，然后冲出重围，逃回宫内府了。人们哪能料想，日本人摆的却是“连环套”。日本宪兵跟踪而至，勒令护军头目警卫处长佟济煦立即交出肇事的护军人员。佟济煦是一位遗老旧臣，一直追随溥仪身边，可说是忠心耿耿，但官大胆小，特别怕日本人。他耳朵里，早充满了可怕的消息：什么把百姓当土匪枪毙呀，抓去修国防工程的劳工全部被杀害呀，连曾给溥仪充过英文翻译的吴某，也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捕失踪等等。因此他看到日本宪兵就眼睛发直，四肢瘫软起来。他本来“口吃”，越发急越眨眼，额头冒汗，脸颊抽搐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唯唯听命，惶惶然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一群可怜的青年护军被推出宫廷大门之外，任日本人宰割去了。以后听说，他们受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大杠等等，逼迫他们供认有“反满抗日”行为。这些护军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日本宪兵的欲加之罪。日本人无可奈何，向宫内提出三个条件：（1）由护军头

^① 作者回忆有误，“大同公园”解放后改称“人民公园”，现称“儿童公园”，“儿玉公园”为今长春市“胜利公园”。

头警卫处长佟济煦出面，向被打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2）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永不复用；（3）保证以后永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甚至迫使溥仪将佟济煦革职，另指派日本人长尾接替，把原有300人缩减为200人，并一律不准配带长武器。

这场恶作剧表面看来是惩治护军肇事，但实际在骨子里就是要将溥仪身上的一点翎毛拔掉。联想溥仪御派遣的两批留日学习陆军的学生（几乎都是皇亲国戚，勋贵后裔，目的是以护军为基干部队，以留学生为铁良、良弼式的骨干人物，扩大自己亲信武装）也被日本人剥夺了使用权，统改由伪军政部分配。这样就把溥仪的凤凰翎毛拔净。实际内情并非如此简单，远在公园肇事爆发之前，早就埋下了导火线。1934年3月，溥仪即皇帝位之后，7月间在北京的醇亲王载沣为庆贺溥仪登极，探望儿子近况，带着溥仪的弟妹们来到长春（伪都新京）。宫内府的大臣官员们到车站奉迎并由警卫处长佟济煦率领一队护军到车站仪仗助威。结果关东军用大使馆名义下令，以旧有约定，在铁路两侧一定范围内不准日军外任何武装进入为理由，向宫内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溥仪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溥仪以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首都范围里，用自己的亲信武装，去迎接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会受到如此奚落！但他却只能逆来顺受，唯唯诺诺，而大臣们也能安之若素，不以为耻。何况这件事是发生在皇帝即位之初，正是溥仪还未访日之前。

在此前不久（指护军事件），一个家住通辽回家探亲的护军，带来了一百个鸡蛋，到长春下车时同一个日本人相撞，日本人看出是护军（呢军服、大帽徽），就一把将筐抢下，摔到地上，一时鸡蛋汤流泻满地，观者如堵；日本人还把护军帽徽扯下进行侮辱，护军气冲肺腑，但在车站范围内孤掌难鸣，只得忍气吞声回到了宫内，将经过情况向佟处长作了汇报，佟济煦不但

不敢吭一声，反而责斥他多事。

满、蒙结盟破灭，日、满亲善有方

溥仪同蒙古王公结亲的目的原是加强满、蒙同盟，巩固复辟基础，进而抗衡日本力量。岂知结盟苗头一露，凌升先被斩首。可是日本人很熟悉历史，想出了“昭君和亲”的办法，最初是把主意直接打到溥仪身上，想给溥仪娶一位日本姑娘作“贵人”。由于溥仪顾虑重重，婉言谢绝。继而他们又考虑溥仪不一定能生太子，就以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和亲目标改换到“御弟”溥杰身上。

（一）“御弟联姻”，“日本昭君”来满洲

溥杰是溥仪同母所生，自幼即在溥仪身边伴读多年，两人既是手足亲兄弟，又是“恢复祖业”的志同道合者。早在清帝失国，军阀角逐时期，溥杰就有投笔从戎的意愿。当时由于客观环境多变未能如愿。但溥杰投笔之心不泯，而溥仪复国之志长存。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充实股肱之士，溥仪早在去伪满之前，即亲送溥杰和三妹丈郭布罗·润麒去日本学习军事。其后，溥杰、润麒均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毕业回国。溥杰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很多日本人，其中有一个日本教官吉冈安直，与溥杰交往甚深。就是这个人日后成了溥仪的“御用挂”，挂在溥仪身边十年，对所谓“日满亲善”起过极为特殊的作用。他为溥杰和亲，也出过“三姑六婆”的气力。

异族人婚配早已有之，日本人嫁给中国人也不足为怪。然而日本贵族从来极少外嫁（只有朝鲜李王垠），而满族皇室也例不娶外人之妻。日、满皇室间唱和“亲善”，结婚则不能不另有其目的，不然为什么在溥仪极为不同意而溥杰也非出自自主的情况下，却结成了这样的姻缘呢？日本关东军起草的伪满“帝

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有儿子继承帝位，太子六岁须去日本学习。如果皇帝无子，皇帝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也可以继承帝位。”所以给溥杰娶个日本贵族，醉翁之意何在，不就“路人皆知了”吗！

溥杰夫人（日本皇太后懿命为“王妃”）嵯峨浩是嵯峨天皇的后代华（贵）胄出身。通过国策的决定，经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皇室一系列策划、酝酿、选评之后，即由当时任日本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此人就是侵占我东北的首魁，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出面为媒，直接牵线，将溥杰与嵯峨浩结合在一起。嵯峨浩其年23岁，当时在东京的贵族学校女子学习院学习书法、绘画、插花（日本花道）和钢琴，多才多艺而又年轻貌美，作为和亲的使者，是符合标准的。溥杰开始心存犹疑，但在情逼势迫之下，不容推辞，只好顺水推舟。及至一见嵯峨浩才貌双全，也就爱慕倾心了。1937年4月，在东京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伪满派有专使按礼参加。回到伪满首都长春（新京）后，又特在“军人会馆”大礼堂内举行结婚披露宴会，参加人又多是“衮衮诸公”。我当时虽官小职微，但以近水楼台与其列。婚姻披露主持人，还是那个大将本庄繁男爵。大婚既成，嵯峨浩循例就被定尊为满洲国皇弟溥杰的“王妃”了。

嵯峨浩在“于归”来满洲国时，受到日本皇太后（即贞明皇后）的召见，嘱告她安心侍候溥杰，应发挥日本的“妇德”，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做出表率。为了不负皇太后“懿命”关切之殷，嵯峨浩随夫更名为爱新觉罗·浩，表示决心要为“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做出榜样。缘此，她到满洲之后，一切都遵以宫廷礼法，在家族之中、夫妻之间、兄妹之间，一切公私之间，都确保其妇德，进退得宜地出入于宫廷之中，颇得左右一般人的尊重。更由于她耳闻目睹，察觉到日本人所谓

的“亲善一心”并无真意，而处处表现出日本人高出中国人一等（甚至连溥仪和她丈夫溥杰也受着窝囊气），使她十分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的礼品，其奈国事何！解放后，溥仪、溥杰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爱新觉罗·浩毅然回到新中国，与溥杰和美相处，正为中日友好而共同努力。

（二）“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来历及其行径

吉冈安直，日本鹿儿岛人，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七期学生，陆军大学毕业后在1931年之前，曾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大尉参谋。当时为溥仪进讲过“时事”，有一面之识。后来溥杰到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恰逢吉冈安直在该校任战史教官。这个武士道分子熟读兵书，深怀韬略，很懂得放长线钓大鱼、“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野心和日本的霸业国策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和溥杰拉关系，然后利用同溥杰的双重关系（师生、朋友）穿针引线，铺路搭桥，博得溥仪的好感。而后吉冈进一步向溥杰游说，关东军有意调他到满洲，出任军方与溥仪之间的联络人，无异于暗示溥杰，打通关节，里外其手，以遂其愿。果然此方“灵验”，溥仪去信表示欢迎。有了皇帝的属意，吉冈如鱼得水，便要起他政客说客的诡辩术，穿梭于溥仪与关东军之间。以溥仪的关系取悦于关东军；又以关东军为虎皮，显威于溥仪。一箭双雕，名利两收；既轻取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头衔，又荣膺伪满皇帝的“御用挂”（后来定名）之职（“挂”这个字在日文中说来并不难解，如“联络挂”就是联系人；“兵器挂”就是军械股一科系之意。但“挂”到“御用”上，实在是一个创新）。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这个“挂”掌握在吉冈手里，挂在溥仪身上，其作用之大，涵义之广，真是无法形容。用溥仪的话说：“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溥仪）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

礼、训示臣民、举行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吉冈先是往返游动于伪皇宫与关东军之间，后来居然把日本皇室和溥仪的帝宫直接连在一起，往来于皇室之间，成了公开的“亲密的”“内亲”使者。不但溥仪要仰他鼻息，就是关东军内部他也炙手可热。可以说，他包办了伪宫的一切。他在帝宫之内，翻手为云覆手是雨，可以任意出入“中和门”窜进“缉熙楼”，一直挂在溥仪身上10年（1935年至1945年），把溥仪挂得头晕目眩，四肢麻痹，连自主的意识都消失了。这个日本武士道特务，对溥仪又拉又打，直到伪满灭亡，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为止，他一天也未离开。忽怪乎“福贵人”李玉琴说：“吉冈是缠在皇上身上的一条毒蛇、贴树皮。”

吉冈其人不独是阴谋家、军事家、政客、策士，还会英文，也能说“协和话”（半拉子中国话），又会水墨丹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特下功夫画一幅墨竹，请溥仪为他题字并郑孝胥题诗。画以字贵，诗以人名，于此，画中有名人的诗，诗之上有皇帝的题字，更贵重的是“印章”。他把“三全其美”的画，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转眼间，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宣扬一番，并称吉冈为“采笔军人”。于此，吉冈声望倍增，由“贴树皮”一变而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了。

吉冈挂在溥仪身上的另一杰作，就是打通溥仪思想，迎接“天照大神”来满洲。当然，关系这一改祖换宗的大事，不是吉冈所能决定的。就是关东军酝酿此事，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研究，才作出决定的。由于溥仪“敬天法祖”思想根深蒂固，骤然提出改换祖宗是难能接受的，因此吉冈便刚柔并济，打通溥仪思想。这样一来，溥仪对这件痛心的事，既抗拒不了也谢绝

不了，只有通过吉冈的疏导，啼笑皆非地接受下来，以庆祝日本神武天皇2600年大庆为名，恭迎“大神”来满。

吉冈还有一套奇怪的逻辑推理。1934年溥仪访日，受到日本“皇太后”的隆重而亲切的接待。吉冈对溥仪说：“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光荣！”又对溥杰说：“我和你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而论，也算手指与足指的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1936年前后，吉冈的话变了：“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啊！”

溥仪在小天地内的所作所为

溥仪跳进虎穴之后，曾为“恢复祖世”而发誓说：“将忍耐一切艰苦困难，兢兢业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并深切地记住他老师陈宝琛的教导，坚决把懒散的习惯改掉，以资振作自强。所以把自己从政办公的楼命名为“勤民楼”；自己的办公室命名曰“健行斋”。乃至“登极称帝”，根据“满洲国组织法”的规定，他即认为：“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皇帝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的。溥仪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牢牢把住统治满洲国的大权，不容许溥仪插手。最生动的事实就是郑孝胥罢了官，溥仪亲举臧式毅为继任总理，结果关东军给了他一个软钉子，硬把“老豆腐匠”推上台。不但如此，相继而来的就是皇帝宫廷内的人事，溥仪也无权自主了。宫内府、尚书府乃至后来的祭祀府大权都操纵到日本人手里，最后警卫处长也换上日本人，连日本宪兵也进宫了，幸而还只是在中和门之外。

日本侵略者残忍讹诈，他们把满洲看作日本在中国的“生命线”。对待傀儡溥仪，其方针是：举凡政治、军事、人事等大

权，绝不让溥仪染指，而对溥仪的私生活享受则尽可能予以满足。他们每年拨给溥仪的帝室费用达80万元，其价值相当于200万公斤猪肉，称为“内帑”。至此，溥仪也只能关上门在中和门以内缉熙楼这块小天地里，在一小群皇亲显贵和侍奉奴仆中称孤道寡。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六辑）

继承帝位的密约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 译

爱新觉罗家族

溥仪的父亲载沣有三子七女。载沣是清朝第九代皇帝光绪的弟弟。因光绪皇帝无子，慈禧太后决定立载沣的3岁长子溥仪为清朝第十代皇帝，年号为宣统。

在北京，我们见到了溥仪九个弟妹中的两位，第一位就是溥仪的二妹韞和。她在1932年满洲建国时同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结婚。

我们是在北京市鼓楼甘水桥居民委员会文化站的一间会客室约见郑氏夫妇的。因为他们居住的两间房屋过于狭窄，才借用了居民委员会的会客室。1933年郑广元从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携夫人韞和在日本住了两年。作为“满洲国”总理的孙子和皇帝的妹妹，他们有着显赫的青春时代。

韞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皇上指婚的”。在清朝的宫廷制度中，只有皇帝有“指婚”的权力，即由皇帝指名决定婚姻的

一种独特的宫廷习俗。韞和还告诉我们：“皇上同我们不是兄妹关系，而是君臣、主从的关系，见皇上时要跪下磕头。”

韞和给我们讲了许多宫中的珍闻轶事：她是在摄政王府长大的，幼年时有3个乳母。摄政王府在清朝覆没后，成为孙文的夫人宋庆龄的宅邸等等。

我们约见到的另一位是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78岁）。他每日护理着身患重病的夫人。爱新觉罗·浩夫人与溥杰共同走过了曲折多变坎坷的一生。

爱新觉罗·浩（原名嵯峨浩）1937年4月与爱新觉罗·溥杰成婚。她出身日本名门华族，她的父亲嵯峨实胜侯爵与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一位局有血缘关系。

同溥杰会见的时间是上午10时，我们提前来到了他的家中。当时溥杰还在医院未回来。几年来他每日在医院陪伴护理长期患肾功能衰竭的浩夫人。他乘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准时在约定的时间回到家。与我们预料的相反，溥杰是一位身高不到1.6米的小个子。溥杰用十分流利的日语说：“让你们久等了”。交谈时，溥杰说的日语中经常出现只有在日本军队中使用的郑重其事的言词。对此，我们在《严密会见录》中得知，溥杰早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在溥杰的客厅里，还悬挂着他19岁的爱女爱新觉罗·慧生的生前照片，照片前摆着祭品。爱新觉罗·慧生在19岁时，因婚姻不幸双双情死于日本的伊豆天城山。

日本战败后，溥杰作为战犯被捕，长期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爱新觉罗·浩携两个幼女回到了日本。从此他们夫妻离散，音信不通，过着中国、日本两地牵挂的战后生活。

中学三年级的爱新觉罗·慧生日夜思念父亲，开始专心学习汉语。给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写信询问他父亲的情况。在周总

理的妥善安排下，溥杰给他远在日本的女儿写了回信。这样中日之间开始了通信。

然而，在1957年溥杰临近获释时，爱新觉罗·慧生因婚姻不幸情死于日本。终于失去了生前再见父亲的机会。

“这是慧生留下的唯一纪念。”

溥杰指着客厅一隅悬挂着的一幅绘有鱼的水彩画，告诉我说这是慧生在中学时画的。

溥杰的婚事

根据《严密会见录》，证明日满亲善一体不可分的是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爱新觉罗·浩）的婚事。这是1936年1月13日南次郎大使与溥仪举行例行会见时，由南次郎提出的。

这一天，南次郎以十分神秘的神情对溥仪说：“今天有两件事要奏告陛下，但说话声千万不可泄露到窗外。”南次郎所讲的两件事之一，是劝已经31岁而未得一子的溥仪皇帝再娶侧妃。溥仪应允命大格格（皇后生母之姐）等人选妃，目前正在物色人选。第二件事就是溥杰的婚事了。

大使：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给溥杰早日完婚……自古就有政治联姻，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也是首先考虑到溥杰的终生幸福。

皇帝：言之有理。溥杰也对自己讲过，完全不考虑人种上的差别，而要考虑到两国邦交。若同日本的皇族喜结良缘，不只是本人满意幸福，也是两国的无上幸福，并向两国国民做出真正的日满亲善的表率。这确是好事。

事前得到情报，察觉到关东军意图的溥仪，竟先由自己口中提出溥杰可与日本人联姻。

溥仪在日趋懦弱的背景下，又发生了一件使他颇感震惊的

事件。这就是在内蒙古的中心城市海拉尔发生的一般称为“海拉尔事件”又称“凌升事件”的事件。

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凌升是“建国元勋”之一，凌升之子溥仪的四妹韞嫫决定结婚。然而凌升在1936年4月突然被关东军逮捕。

逮捕凌升的理由究竟是他对关东军专制独裁的统治抱有不满意以至惹恼了关东军呢，还是他与外蒙古联盟谋求蒙古民族的团结独立？还是以俄国的间谍罪名被捕的呢？众说纷纭，一时真相不明。最后，关东军以凌升向俄国和外蒙古提供日满军事机密情报的间谍罪，宣判了凌升死刑。凌升被处以斩首之刑，这是关东军对反满抗日者杀一儆百的做法。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对溥仪说：“处死凌升是为了杀一儆百。对于凌升的处罚未夹杂任何政治因素，只是遵从法律的威严，依据他的罪行程度，秉公而断，未掺入丝毫恩怨。”

凌升的父亲贵福来乞求溥仪拯救凌升时，溥仪恐被牵连拒绝与贵福见面。

对溥仪来说，使他感到阴森可怕的莫过于凌升事件了。他深深地领悟到，在关东军的势力之下，自己的命运也不例外。

在1937年1月25日的《严密会见录》中，记录着一年前由南次郎大使提出的溥仪皇帝的弟弟溥杰的婚约才算告成。

大使：今天拜见陛下，是将溥杰婚事的进行经过禀告陛下。关于联姻之事，经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大将、朝鲜总督本野的未亡人以及其他各方人士的尽心竭力，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在众多的候选人里最后选中一位佳丽，她现年24岁，学习院^①毕业。订于1月8日，按日本的相亲方式与溥杰见面。对方讲若为

^① 学习院：1877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一所专为皇族、华族子女实施教育的学校。

日满两国的亲善，就同意这桩婚姻。溥杰也对此颇感满意，东京的“三格格”也表示赞同。陛下若恩赐许可的话，这桩婚姻就算成了（将嵯峨侯爵家的家谱及嵯峨侯爵长子，即浩姬的父亲嵯峨实胜的身着大礼服的照片和浩姬的双亲身着日本和服及浩姬本人的照片介绍给溥仪，并说明嵯峨侯爵家是继五摄政之后的名门世家，有着被称为大臣家的家世）。

皇帝：很好。溥杰本人满意，又是经各方面人士的充分选定，我同意。并对大使为这桩婚姻付出的格外努力，深表感谢。

这一天，经溥仪的赦许谈妥了溥杰的婚约。可是，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坦白了他内心对自己的弟弟溥杰与日本女人结婚的恐惧。

“这一定是一项阴谋，日本人想要笼络住溥杰，想要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必要时取我而代之。”

然而，结果溥仪还是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承认了溥杰的婚姻。

1937年4月3日，溥杰与嵯峨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婚礼。溥杰的婚姻使溥仪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记述了自己的重重忧虑。

“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曾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做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已详细记述了这段历史背景，作为史书或读物已无多少兴趣了。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满洲国”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

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然而，关于帝位继承问题，在《严密会见录》里，记录着关东军与溥仪之间交换的令人吃惊的密约。

溥仪的密约书

溥杰结婚的一个半月前即1937年2月17日，皇帝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溥仪的书斋——健行斋举行例行会见。溥仪首先说道：“由宫内府大臣为首的帝室大典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大典草案，已于昨日上奏。因这份草案同以往看到的并无不同之处，只要大使认可，可令国务总理和宫内府大臣正式上奏，由参议院决定。”植田关东军司令官通览了草案，表示同意。在此基础上，植田说：“在帝室大典中，最重要的是决定了继承帝位的问题，是值得庆贺的。”说着植田拿出一份事先由双方一致达成的备忘录，请溥仪在上面签字。

请求在备忘录上签字时，林出刚要打开装有备忘录的纸袋，陛下说，事后再签吧。便把备忘录置于桌上。

这是林出贤次郎在《严密会见录》里，所记录的溥仪当时的言行举动。溥仪在关东军司令官的面前，显露出如此露骨的感情，这还是第一次。

话题转到溥仪选定侧室的问题上，溥仪对此事向关东军司令官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关东军司令官破例地接受了溥仪的想法。

大使：我充分理解陛下的尊意。

皇帝：那么，就在方才说的备忘录上签字盖印吧，于是溥仪在一式四份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文字均是中文）上签了字，填好日期后，由林出盖了御印。其中的两份递交给溥仪本人，另两份交给大使保存。此时已接近零时30分（署名的墨迹不轻易

干)。

《严密会见录》记录了署名之后，墨迹未干时包括林出在内的三人打哑巴禅，而此日会见是在“三人大笑”如同往日一样，无任何障碍地告终搁笔。但是，这反而愈加显露了签署帝位继承法的备忘录时这场有点窘迫的气氛。

溥仪给关东军司令官签名、盖印的备忘录如下：

备忘录

康德皇帝无皇子时，有关皇位继承应得到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并按以下顺序决定。

(1) 康德皇帝和皇后无皇子并被确认时，继承皇位应依遵天皇之睿智决定之。

(2) 康德皇帝无皇子时，决定继承皇位应依遵天皇之睿智，继承皇位之圣旨，由皇帝宣布之。

(3) 历代皇帝亦依此规定。

康德4年2月17日

满洲国皇帝

溥仪

节略

(1) 皇帝无子，并被确认时，经关东军司令官之同意，侧室可入宫内。

(2) 皇子之教养人员，以日满两国人格高尚者充任之。

(3) 皇子于适当时期留学，在学习院学习之。

(4) 皇子必须成为军人，皇帝之女必须下嫁军人，若有皇子不能成为军人，皇帝之女不能下嫁军人之特殊情况时，须经关东军司令官同意，予以决定之。

(5) 侧室非皇族。

(6) 历代皇帝亦依此规定。

康德4年2月17日

满洲国皇帝

溥仪

《严密会见录》中，图示着盖有皇帝御玺之处的记号。备忘录雄辩地证明了“满洲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国家。

在北京见到溥杰后，我们忽然想起假设一下当时的历史。皇帝与皇后虽未得一子，而在皇帝与侧室得一子，溥杰夫妇也得一子时的关系又将如何呢？

然而，溥仪、溥杰这兄弟二人终究都未得一子，围绕《帝位继承法》的权力之争也就不存在了。“满洲国”的崩溃，避免了溥杰夫妇再次成为日本关东军政治工具的可悲命运。

爱新觉罗·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确实是由关东军一手安排的。然而，经历了50年的岁月，溥杰夫妇已结下了超越国境的深情挚爱，度着宁静的余生。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溥仪不敢住同德殿

于勋治 孙贵田

1934年，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以后，要给他在南长春（指现在长春的地质宫）修正式的皇宫。溥仪当了“皇帝”，自己感到住盐仓（当时人们把樵运局混称为盐仓）很不体面，所以他提出还是先给我修建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住住吧！后来，也有的说，修建同德殿名义上是溥仪提出来的，实际是通

过溥仪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提出来，溥仪也同意了。

同德殿名字的由来是取日、“满”同心同德的意思。因而，宫殿的造型、设计就特殊。乍一看，宫殿好象是中国式的建筑，实际上不是。那时，屋顶上黄瓦的瓦头都刻有“一德一心”的字样，瓦脊是日本式的，中国式的瓦脊头大半是龙咬的形式，而日本式的就是伪宫现存的样式，瓦筒才是中国式的。日本关东军用这种式样表示日、“满”“一德一心”，真是挖空心思弄出来的“杰作”。

由于溥仪疑惑日本人要在新殿中安窃听器，所以落成之后，他并未去住，这也是对所谓“一德一心”的绝妙讽刺。

（吉林市政协供稿）

伪宫内府的日本人

赵健平*

关于溥仪身旁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了。但伪宫内府先后还有许多日本人任职及其活动，就鲜为人知了。其实最先到伪宫内府的日本人，是所谓“支那通”（即“中国通”）的日本浪人。他们大都是很早就到中国来的，会讲中国话，熟悉中国情况，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与日本特务系统有一定关系，在中国大肆活动兼做特务工作。

* 作者系熙洽之子，曾任伪宫内府近卫处总务科科长。

这一部分人随溥仪由关内到东北来的几个人，可以做为代表，如工藤铁三郎，后由溥仪令其改名的工藤忠，表示对他个人忠心耿耿的意思。工藤在前清时代曾在陕甘总督升允那里干过事，后又在旧军阀张宗昌那里混过。通过日本军部介绍又与溥仪联系，随其到东北，也算是溥仪的“亲信”之一。在伪执政府时，他充任侍从武官，在伪宫内府时任侍卫处长。1941年，他到了停年之时后退官，但仍任宫内府顾问官。这是个仅有名义不支薪的名衔，在有典礼时到伪宫参加仪式。工藤会中国话，但说得不太好，一般应用也还勉强。他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倒很熟悉，溥仪对他也很重视。他下班后常到“内廷”，陪同溥仪闲谈、打球、吃饭……也常到驻府日本宪兵班的屋子，闲谈、下棋、吃饭，顺便也可能作些“汇报”工作。表面上看，他对中国人倒常表示好感，相当客气。他经常穿着长袍、马褂，戴帽头，俨然一个中国式“土绅士”。工藤爱吃中国饭，他说比日本饭强多了。也许这些假相，使伪宫内一般中国人对他没有恶感，认为他虽然当了处长，但不拿架子，不发脾气，对属下倒也客气。其实这正是他圆滑之处，也是日本浪人的“特色”吧！

此外，还有上角利一、清宫，他俩也是由关内来东北的，住在府里，由府里供给食宿，生活相当优裕。他俩也会中国话，也常同溥仪见面、谈话，不过还比不上工藤，溥仪对他俩不太重视。上角住了1年，看看没什么意思，没得到相当地位，在1933年便走了。清宫也仅在掌礼处当1名礼官（荐任官），1935年到1936年间病故。以上三人属于比较高等的浪人。至于林田英七郎等小角色，仅在府内弄个下级官吏，林田先当警卫士，后任日语翻译官。他们都没有能飞黄腾达；这可能是因为资格的限制吧。

1934年，日本殖民当局安设了1个日本人次长，名之为辅

佐大臣办事。宫内府首任次长为入江贯一，年约60余岁，是由日本宫内省转来的。伪宫内府掌握大权的日本高级官吏，大都是由日本派到东北来的，通过关东军人事部门同意而任职的。他们在国内都有相当地位、身份和学历，有的原在日本各省（即部）内任职。所以到伪满后都以特任官或简任官任用，特任官为次长级，简任官为处长、局长、秘书长等。次长入江贯一、秘书长长武宫雄彦、会计审查局长加藤内之助等人均属此类人物。他们待人接物、处事都还明白、客气，心里如何想法就不知道了，在表面上可以叫你下得去。

还有由当时伪外事官署转到伪宫内府的高级官吏，如后来担任伪宫内府次长的鹿儿岛虎雄、荒井静雄，总务处长小原二三夫，都属于此类人物。总务处是掌握文书、人事大权的，首任总务处长小原二三夫是由新京邮政总局长转任到宫内府来的，他是日本帝大系里的一个人物。

另外还有从“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转到伪宫内府的一班人，他们中许多人在东北日久，歧视中国人，自命不凡，具有优越感，有的人还有吸大烟的恶习。不过他们占据高级地位的不多，多是中下阶层的位置。在伪满头一两年，日本国内的人，尤其有资历的人来的不多。缺者为贵。所以日本官吏中满铁系占多数，而且具有一定的势力，后来从日本来的人逐渐增多，他们有些吃不开了。在伪宫内府的满铁系日人也多是为上级日本人支配驱使的下级官吏。

还有一类人是由警界转来的，有的原在满铁附属地任警职，他们人数不多，大都担任伪宫中技术方面的工作。如消防队长佐藤三郎、卫生股长川崎若二、防空股长伊藤等。

二

在伪宫内府的总务处里管人事的科是“综理科”，事关重要，自然也换用了日本人。首任的科长是由尚书府秘书官转任的冈本武德。这个人号称“支那通”，在中国住了很久，先在关内各地，后来到东北。中国话说得很好，并且精通中国文学。他在尚书府秘书官任内事情不多，清闲时把中国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译成了日文，印书出版发售，发了一笔小财。他充当管人事的综理科科长，倒很尽责，不象处长小原二三夫那样马马虎虎。冈本也看出小原处长的马虎劲，所以有些事情就独断专行，也不通过小原而自行作主办理了。小原也不过问，乐得个清闲自在，倒也没发生什么矛盾。内务处里的会计科是掌握财政的，自然也要换用日本人。会计制度变得更加严了，各处不能各自为政，均由会计科统一管理。首任会计科科长是松本，是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也不是学会计的，对会计业务是个外行。但他手下有事务官、属官等辅助他。松本虽然隶属于内务处，但是不听命于内务处处长商衍瀛，而是听命于日本人的总务处长，商衍瀛对他也无奈何，听其自然而已。

日本人对伪宫内府的人事、财政部门控制住后，便轮到警卫部门了。当时的警卫处长是佟济煦，日本人久拟更换，因溥仪不同意而未实现。1937年发生伪宫护军在大同公园与日军官兵殴斗事件，而迫使佟济煦“引咎辞职”。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他是由民政部警务司长转任而来，原系退役陆军少将。这个人架子很大，见了中国人不爱搭理。对于转任此职，不算满意，认为无事可做，也没有多大实权。不如警务司长统辖伪满全国的警察厅、警务局、警务科，那么威风十足。而警务处的大小范围、权力不出伪宫这个大院，没有什么油水。长尾吉五

郎大不高兴，对于事务处理不大过问，委之于手下各科科长。每天他到时来了，往办公室一坐，便看小说、读报纸、听广播、写私人信件。有了例行公事，大致看看便打上名章，拿去照办。到了下班时，挟起皮包一走了事。所以，在他任职期间，掌握实权的还是处内的各个日本人科长。1940年，他65岁，到了退休年龄便辞职了。由日本陆军退职少将长野义雄接任，这个长野与前任正相反，事无巨细必须过问，大小事都得由他解决。一天总开会，召集科长以下的负责人研究讨论，问了那个，听了那个，不够他一个人忙的。1942年初，他转任伪黑河省当省长去了。后任的大泽寅一，也是日本陆军退职少将。这个人的作风与长野又不同，好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自以为是。每天忙于“作案”（即拟草稿，日本人称“作案”），他忙于改革这项、变更那样，可是常常行不通，碰钉子。记得有一次，他出主意在警卫处院内后面修建了一座高达十丈的了望楼，说是为防空了望之用。伪宫内府的防空，事务是由保安科所管，内设防空股，股长为伊藤三郎，日本警察出身，由伪首都警察厅转来的。我当时兼任保安科长，大泽寅一拟好方案，交给我施行。我看过后，当时就向他建议：“宫内府的防空做好灯火管制就可以了。而且在防空时，与外面防卫司令部联系即可，我们用不着去了望敌机，这个楼没有什么作用。再说，此楼的地点正在内廷的南墙外面，高有十余丈，上面站了望人员，对内廷方面有些不便，恐怕内廷不同意。还是先联系近侍处转奏内廷，同意后方可施行，不然怕有问题……”

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你太小心了，太过虑了，防空事关重要，我们有专责，建了望楼是有必要的，内廷也无权过问，你安心好了，一切由我负责，你照案施行好了。”

我见他决意要办，只好交与防空股长伊藤三郎，照案建立

这座了望楼。几天内便建好了，他很高兴，带领防空人员上了这座楼了望一下，很满意。谁知到了第二天早晨，近侍处来电话问我：“为什么建立那座楼，可以窥望内廷行动，诸多不便，上边（指溥仪）问下来了，是不是你的责任？”

我只好据实报告，并告诉近侍处，假如上边不同意，我可以转告处长，但他未必听从，还是请近侍处长直接向大泽处长转达上边的意思，这样，事情好办些。

到了下午，大泽又找我去，我一进门，他便对我说：“赶快找人把了望楼拆除。”我明白是近侍处长告诉他了，他也无法抗拒了。但我故意问道：“刚刚建成就拆除，那防空怎么办呢？”他面上露出尴尬的样子，说：“事情真难办，内廷不明白此中情形，非叫拆除不可，只好照办，你去施行吧。”我也不再多讲，告诉防空股长：怎样建立的，怎样去拆除吧，而且今天就得办，不能等明天。这座了望楼的寿命仅仅一日，就寿终正寝了。大泽寅一碰了这个硬钉子以后，有好些日子没乱出主意，倒也省了不少事！

内务处长原先也是中国人，商衍瀛走后，换刘杰三，刘原任宫内府秘书官转任内务处长。后来调换为冈本武德，他原为总务处综理科科长，综理科由会计审查局的审查官泽山继任，刘杰三便转任到审查局去了。

警卫科长原为中国人，也换上日本人菅谷，后换川口次郎。保安科长原为日本人，曾换上中国人李金声，李走后一时无相当人选，照例由总务科长兼任。但只是兼职不兼薪，但另有职务津贴，每月50元。因我当时是总务科长，故一度兼任保安科长。1945年，才任命吉田正为保安科长，但仅两三个月，便因日本投降而完事大吉了。

伪宫内府的人事、财政、警卫等重要部门，都由日本人控

制了，其他各科科长倒是中国人，可下面的事务官又是握有实权的日本人。车辆、马匹等管理和使用也有日本人的管理员，甚至连伪宫内的扫院子、扫厕所的杂役，也由日本人管理、支配，真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而公文中也常用什么“出張”、“登庁”等日文词，因公事多由日本人拟稿，然后再译成中文，结果成了不伦不类的“协和式”公文，叫人看了头痛。好在反正只需中国人的伪官吏在上面盖戳，表示“知道”、“同意”、“通过”就行了。长此以往，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三

伪宫内还驻有日本宪兵班，有一班长率五六名宪兵。与溥仪来往的人也会受到日本宪兵的监视、干涉。伪参议府有位胡嗣瑗参议，原先任过宫内府秘书长，也是清末一位老人物了，随同溥仪到东北，后转到参议府的。有一个时期，他经常到伪宫来，陪溥仪闲谈，有时看看古玩，讲点历史典故。次数多了，日本宪兵生疑心了，认为有什么活动。有一次这位胡参议又来了，出来时，日本宪兵等在门外，把他老人家请到办公室，由班长对他大加盘问和侦讯，问他为什么常来？都说了些什么？是你自动来的，还是陛下（溥仪）的召唤，你愿意来吗？有什么用意？……问得胡老头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好歹算完事了，跑回去了，从此再也不敢来了。溥仪也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也不找他了。常在宫中陪他的也只有皇族青年，日本宪兵也还照顾面子，不再干涉过问，也知道这些人年纪小，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因太平洋战争日本失利，1943年春季的一天，伪皇宫警卫处长大泽寅一召集科长会议，有警卫科长川口次郎，我因兼任保安科长，也出席了。大泽对我们说：“目下要加强治安，保持

秩序，要在宫内府建立一个监察机构，以防不测。外面虽然有警察来负责控制，但是宫内府比较特殊，外面的警察执行任务感到困难和不便。而宫内府的职员都是供奉皇帝陛下的，时常与皇帝陛下接触，假如里面有了坏分子，对皇帝陛下有不利行为，那个关系该是如何重大，更是我们警卫人员难卸的责任。所以现在计划在宫内府里组建一个保安的组织机构，好专门担当此种特别重大的工作和任务……”然后他又说，要在处里成立一个“特务股”，任用专门负责的股长，另外再选用几个中国人以供驱使。他问我和川口，以何人任股长为宜，这个股设在哪个科内？

我听完感到不安和进退两难，这时川口首先发言表示赞成，并说：“这个机构应当设在警卫科内，符合警卫的性质，股长可由警卫科里的警卫官鹤弥市充当，此人原先当过警察官，办理特务事项有经验，一定可以收到相当的功效。至于选用中国人，可从三个科内挑选，由各科长推荐挑出采用”。大泽听了点点头，然后问我的意见，我立刻表示同意。

可会后，鹤弥市希望把特务股设在总务科，以便可以大权独揽，不受川口的干预。大泽又来征求我的意见，尽管我极力反对，也未奏效。于是我表示：特务股的事我不过问，由鹤弥市股长直接与大泽处长联系，他们点头同意。特务股成立后，又调去佟诸功、刘玉田、裴鑫炎、于永生、杜长忠等。他们这些人每天穿上便衣，各处瞎闯，到处探听伪宫内中国人的言行，有无“反满抗日”的思想，以及赌博、冶游、盗窃、贪污。从1943年到1945年，他们的特务工作并没有什么“功绩”可言，因为伪宫内的中国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一个“反满抗日”分子也没抓到。至于贪污等事也常是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从此伪宫内常有人给大泽、鹤弥市等人送点大米、猪

肉、鱼、鸡蛋，这些东西在伪满末期，都不易买到，算是昂贵的好东西了。于是有的人讲：“作点违法的事，不要紧，一百个鸡子，就可以消灾免祸，还打发他乐乐呵呵的。”由此可见大洋等人的丑态了。

撤换伪总理郑孝胥

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

天津编译中心 译

郑国务总理的更迭

溥仪访日取得的成果，增加了皇帝与关东军统治“满洲国”的信心。据《严密会见录》记载，1935年5月3日南次郎大使与郑孝胥国务总理举行例行会见时，提到了有关改组“满洲国”内阁之事。在此以前更换了掌握“满洲国”实权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南次郎大使推荐的长冈关东局总长被内定为总务厅长之职。关东军司令官将此事征得皇帝溥仪的认可后，南次郎大使与郑孝胥国务总理的会谈，便直接进入了有关改组内阁的事宜上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事先透露出希望郑孝胥国务总理引退的意向。

5月3日下午4时，郑总理与南大使在大使馆邸举行了会谈。

大使：（上略）方才谈论了内阁改组问题。由于长冈的人事已定，想以他为中心，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总理：现内阁已过3年，内阁成员都是建国的有功之臣，让

他们引退应给予优厚的待遇，以保全他们的荣誉为上策。即便在他们退職后，也应适当照顾他们担任相应的职位为妥，或是让他们暂时休养一个时期。关于此意，我已同臧式毅民政部总长进行两三次恳谈。他颇赞成，并相信新内阁一定会取得功绩。关于总理大臣的人选，我认为让现任间岛省长蔡运升担任颇为合适。他有学问、有阅历，德才兼备。更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能胜任国务总理之职。

大使：具体的事情待以后再慢慢谈吧。

郑孝胥荐举下任总理的提案被南次郎大使婉言回绝了。两个星期之后的5月18日，溥仪与南次郎大使、新任总务长官长冈三人在帝宫就组阁的人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商议。

皇帝：今天召见二位是关于组阁之事。昨日，郑总理向我提交了新内阁成员的名单。我想大使早已见到这个名单了。名单上的人安排到各部，却再未提出其他候选人，是颇有不便的。在此说句内部的话，让我们抛开一国元首、一国大使的立场，站在同一立场上谈论国事，开诚布公地各抒己见吧！

郑总理是我十几年的亲信，对他的人品性格我是了如指掌的。可是近三年来，他以超然的态度在国务会议上一言不发，沉默寡言，自以为清高。去年在发表登极感想时对日本说，不能把“满洲国”永远当小孩子对待，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这是很不适当的。假若对关东军或日本的对满洲政策有不满之处，应堂堂正正地向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提出来商量，或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尽其意才是应该的。然而他有话不摆在桌面上讲，却在报纸上流露内心的不满。这对身为一国的总理大臣来讲是颇不谨慎的行为。他对我虽忠心耿耿，但担任总理之职，他的才能和度量都是欠佳的。我打算此次内阁改组时，让他暂时退职去休养为好。

溥仪早已觉察到关东军对郑孝胥的不满，故借重新组阁之机，由自己提出了更换总理的建议。

溥仪出席每周召开一次的国务院会议，有各部大臣、总务厅长、各部次长（日系官吏）参加。会议的决议案再交付参议院商议决定后，由国务总理每周一次送呈皇帝，仰承皇帝批准。

此外，规定国务总理每周一次定期到关东军司令部官邸举行会谈。议案几乎都是由日系官吏起草的，据说这些议案在会议上，全无更改。这是从前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的证词中知道的。

郑孝胥国务总理在签署日满协定时，就曾显露出抗拒姿态，其后对关东军仍怨气未消。在国务院会议上的沉默作战，是他对日系官吏在国务实权上执牛耳的一种反抗。

5月18日三人会谈时，溥仪披露了和平时不同的真情。

皇帝：建国初期，事先我对组建的现内阁一无所知。恰如这次郑总理向我呈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样，只不过就这样决定了罢了。这样各部总长之间就欠融洽。由于驹井总务长官的专横跋扈。郑总理与驹井关系不和，导致不愉快的结果。解除驹井职务后，阪谷与郑总理之间关系也欠融洽。这些令人感到不愉快……

这一天溥仪以十分强硬的语气向日系官吏陈述了不满。说日系官吏不了解日满官吏的不和，完全不知满洲的情况，只是全部照搬了日本的制度，照葫芦画瓢地实施而招致了混乱。

溥仪的幻想

大使：今日陛下讲出了我心中所想，就象我自己说的一样。

陛下：今日所言，虽说有些象是身居超然地位的元首对国政有所干涉，这是离开自己的立场，为求万全，而在内部与你

们商量，并陈述我的意见。对宫内府的人事也谈了自己的意见。我从6岁到30岁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受过东洋道德教育，深知东洋之精神为何物，也看到西洋物质文明恶习带来的丑陋现象。这些对自己多少形成领悟世间的阴暗面和人生的正反两面的心得体会。不论宫内府的人对我说什么，还是听到小人背后传言，只要自己无私无欲，胸怀坦荡，就感到任何事情都心如明镜。就有关内阁成员之事谈论了许多，对现在内阁成员我的看法是，他们是一些平庸之辈，稍有头脑、可靠的人只有臧式毅一个人。

大使：如陛下所言，臧是深谋远虑的可靠人物。

溥仪推荐“满洲国”建国的功臣，原奉天省主席，现“满洲国”民政部总长臧式毅为郑孝胥总理的后任。自“满洲国”建国以来，溥仪对郑孝胥日益不满，他心中暗暗决定：总理要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这方面臧式毅最合适。溥仪期待着让臧式毅当总理，行使自己的职权，把自己的国家充分治理好。

1935年5月20日上午10分，在宫内府皇帝的会客厅，溥仪皇帝与南次郎大使举行了会谈。

大使：今日拜谒陛下，想就前几日的组阁之事谈谈本人的拙见。郑总理建国3年来付出巨大辛劳，现年迈力衰，已露倦勤思退之意。故此，借组阁之机，应恩准郑辞职。而下任总理似应具备下列条件，当然要对陛下无限忠诚，我想下列三条也很重要。

- (1) 有统治能力的人；
- (2) 人格正直高尚者；
- (3) 对国家有功勋之臣。

按以上三条进行人选是必要的。我认为有熙洽、臧式毅、张景惠3人。而熙、臧两人各有长短，大致属于同等人物。况且，在社会上他们两人看做是各把持一派势力的头脑人物。若将其

中一人任为总理是不妥的。前几日，陛下所言让熙洽任宫内府大臣，让臧式毅任参议府议长，使他们两人不分伯仲。这样3人中就剩下张景惠，让他当总理大臣组阁如何呀！

溥仪：大使的意见很对，我也有同感。

这样，由郑孝胥推荐的蔡运升，皇帝溥仪推荐的臧式毅，全未被采纳，下一届总理大臣决定由关东军推荐的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出任。张景惠在满洲建国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议长兼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是一个颇具实力的人物。满洲事变时，投降日本，后被推荐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成了满洲建国的功臣之一。

在改组内阁上，溥仪这次也未能反映出自己的意志，只得听从关东军的安排。溥仪按他自己的意愿组建内阁的幻想被彻底地粉碎了。

应溥仪皇帝的要求，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就内阁成员的安排做了如下说明：

大使：谨向陛下禀告内阁各部长的人事安排。于芷山任军政部总长，张燕卿任外交部总长，冯涵清留任司法部总长，这是因为涉及治外法权的问题正在研究中，不便易人。李某任交通部总长、吕荣寰任民政部总长、孙其昌任实业部总长、文教部、财政部总长忘了是谁了。

以上是《严密会见录》记载的满洲建国3年后的关东军司令官与皇帝溥仪关于决定新内阁人事的部分对话，从中反映出皇帝溥仪非常简单地接受了关东军司令官提出的内阁人选名单。然而，溥仪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的前半生》里，溥仪记述了他朝思暮想、再兴清朝的幻想，如同一座座玻璃城被一个又一个地击碎了的情景：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

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

尽管处于这种困境，溥仪仍竭力维持延续皇帝的地位。然而使溥仪感到震撼的事件接踵而来。这就是从1936年到193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勋臣”与走狗

孙喆娃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人。青年应试科举曾名列第一，称为“解元”。早有盛名，诗文和书法均名噪一时。书法为磔笔字，据说民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典面书箴就是他的手笔。至于诗更是“脍炙人口”，连溥仪也为之倾倒。他有几首打动溥仪的心事诗，使溥仪这位圣明乃“知言”了，遂而为后来成为傀儡种下灾难。其诗云：“君臣各避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自意转沟壑，岂复知寇纒。须叟愿无死，终见德化成。”“太王事獯鬻（匈奴别名），勾践亦事吴。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一慚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避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蚕豕。”溥仪逊位之后，这位清末才子久居上海“卖字”，不做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以后却做了伪满的总理，拿了60万元的建国功

劳金)，清末遗老重臣们说他有“骨气”，称之为“名节之士”。其实，他以前虽历任过按察史、边防督办、驻日本神户领事等要职，当时并未见重于溥仪。嗣后在溥仪大婚不久，由溥仪最尊崇的太傅陈宝琛（字韬庵，别号听水老人，也是福建闽侯人，20岁点翰林，历官礼部侍郎、内阁学士、懋勤殿行走，简放过山西巡抚）和英人老师庄士敦的推荐，郑孝胥遂任懋勤殿行走（懋勤殿是溥仪读书的地方），深得溥仪的赏识，郑由此才飞黄腾达，当了首班内务府大臣。

后来就是这位自许为“文种”、“诸葛亮”，乃至象“钟馗”的秃翁，却急功好利起来，和日本人打成一片，伙同罗振玉，用耸言动听的辞辩（刘秀复国机不可失……），主张溥仪学“太王事獯鬻”的故事，战胜了稳健派的陈宝琛、陈曾寿等人，打动了溥仪恢复主业的素志。岂料这位清末“名节之士”，一入龙门，便身价十倍，上得知言圣主，下有左膀右臂的两个儿子（长子郑垂，字让予；次子郑禹，字炎佐，均系日本留学生，且长于英文，擅交际，和日本人打得火热）相得益彰。对外，和日本军部勾结紧密；对内，首先战胜了稳健的保守派陈宝琛，又挤掉了和他旗鼓相当的大投机家、大连“墨缘堂”古董商罗振玉。

罗振玉，字叔言，又字贞松、雪堂，别号仇亭老人，浙江人。他凭着江湖市侩的本领，白手起家，又经商又作官，在清末小朝廷当上了“学部参事”。民国成立后，他客居日本达10年之久，考古著书闯出文名，深得日本军政各界的重视。由于他善长交际，手腕灵活，经常穿梭于日本政客和清末宗室遗老之间，成了半官半商的政客。由太傅陈宝琛推荐，竟跨入小朝廷做了“南书房行走”。他也有个儿子，名罗福葆，字君羽，也是日本留学生，亦是罗的膀臂，出谋划策于左右。当溥仪在天津作寓公的时候，日本人早就认定他是“可居的奇货”。而这两位

溥仪的“行走”一个做过日本神户的领事，一个客居10年在东瀛。由于这两位“行走”的行走，促使溥仪甩掉保守派，“行走”到了满洲。之后两个“行走”又经过各自的行走较量，终于是郑占了上风，最后荣膺了国务总理，而“仇亭老人”也做了几天监察院长。都得到了大数的“建国功劳金”，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罗振玉得了名，拿到钱，便泛舟回到老家卖他的古董字画，自作“陶朱公”去了。而有点迂阔的“腐儒”郑孝胥却很不识时务，耿耿于他那个“执政宣言”，“人类必重道德”，“人类必重仁爱”，“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等等。不久日本人把他的总理撤掉，他在家里作诗写字，又讲王道又发牢骚，说什么：“满洲国已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自己走路了，不该总是把着不放手。”话不多，却触怒了主子。至此不久，郑氏父子便双双不明不白地死了，走狗当烹吧！

溥仪发现受骗上当之后，曾悔愤地说：“郑孝胥心粗胆大，有进无退”。但溥仪对他仍有旧情，死后特予谥“襄勤”。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六辑）

花谷正的一段讲话

万嘉熙

花谷正是日本军中很著名的法西斯人物。长脸大嘴，满脸横肉，煞象凶神一般。他在伪满军事部任高级顾问时期，曾于1939年到沈阳伪训练学校来视察。到了伪训练学校之后就召集全部伪军官讲话，他站在伪训练学校本部的高台阶上，声色俱

厉地说：

“‘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请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我在济南时曾从广播里听到郑孝胥国务总理的讲话，郑说‘满洲国’是个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他说的这是什么话？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满洲国’可以脱离日本的怀抱么？我听了很气愤，当即打电话给关东军司令部，把郑撤职了，这就是个前车之鉴。‘满洲国’皇帝的‘后见人’（即监督人）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再重复一句，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请他自便吧！”

“要啥给啥”的伪总理大臣张景惠

张辅麟

1935年5月19日，在伪满国务院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当晚8时，伪大臣们被召集来到总务厅长官邸开会，却不告知会议内容。只见会场内外日本宪兵出出入入，门口还有武装宪兵把守，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可是，届时并不召开大会，大臣们一个个被“单兵教练”似地召到密室去，告知国务院改组及本人被调动的事项。就在这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张景惠取代了“建国老臣”郑孝胥，当上了“国务总理大臣”。

从1935年5月到1945年8月的整整10年期间，日本关东

军为便于操纵，对身居伪满军政要职的汉奸，频频进行调动，有人竟被调动达四五次之多，唯独张景惠稳居“总理大臣”宝座安然不动。据与张景惠关系密切的于镜涛说，关东军曾向张景惠保证：让他终身坐稳“满洲国”的第二把交椅（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伪皇帝溥仪，他不能“僭越”）。伪大臣们背地里说：张景惠是“铁杆总理大臣”。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发动事变的罪魁祸首本庄繁和土肥原在11月7日致天皇裕仁的电报中，就曾这样评价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颀硕，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可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伪总务厅长古海忠之后来回忆说，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张景惠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于得人和，是个‘好好先生’。”

所以，关东军决定把越来越不大听话的、还十分热衷于“国际共管”的郑孝胥，换上了张景惠。由此可见，张景惠所以地位稳固，一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需要这样的傀儡，二是他本人媚敌卖国有术，二者结合铸成了他这“第二把交椅”的坚实基础。这种卖国求荣的诀窍，可用他自己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来概括：“要啥给啥”，张景惠说到做到，“要啥给啥”成了这位“总理大臣”奉行的主义了。

首先，他推行“粮谷出荷”，大肆征收粮食，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征粮720万吨；到1945年增为950万吨；直接运往日本的粮食，1940年为200万吨，到1945年增为500万吨。他为了向日本主子显示忠心，不仅到处倡导“要啥给啥”，还主张多给、给足、给够。就拿1943年来说，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原定“粮谷出荷”的计划量是720万吨，张景惠却说：“今年年景不错，可

望丰收，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总理大臣一句话，“出荷”量这年就又增加30万吨，造成很多农民不仅口粮毫无保证，连种子都被征去。黑龙江省林甸县农民因拒交“出荷”粮，而被日本人副县长殴打致伤，并被烧了住房和柴草。这一严重事件在伪省长会议上也是议论纷纷，张景惠见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第四课长黑川大佐在座，唯恐他们听了不高兴，正当大家谈论时，他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吼叫训斥说：“不用往下说了，他妈的，不管是谁，不出荷的，就拉出来给我毙了！”

他这种反常之举闹得众大臣一时不知所措，都怔住不敢吱声了。

日伪在拼命加大“出荷”量的同时，势必要控制人们的口粮，张景惠通过他管辖的伪国务院这架机器，先后炮制了“主要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市场法”、“粮谷管理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对人民群众的口粮实行严格的统制配给，配给量之低，是举世罕见的。1943年7月，在当时的奉天（今沈阳市），大人供给量为7公斤，少年为4公斤，幼儿2公斤；鞍山市成人供给量6公斤半，抚顺6公斤；哈尔滨4月份成人配给仅5公斤，5月份5公斤半，6月份因另给点白面，只供给2公斤半粮，真是让人难以糊口了。虽然也有黑市粮食可买，但那是要冒着打成“经济犯”的危险的，而且黑市交易的粮价奇高，1斤苞米价是配给价的5倍，高粱米配给1斤1角钱，黑市价1斤1元3角钱。老百姓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所谓“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秕、杂谷的“协和粥”。可就是这样，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还说：“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牺牲的也不少，和日本一德一心的‘满洲国’人吃得少一点，多出二成粮谷不算什么。”张景惠马上接着说：“我是庄稼人出身，明白庄稼地里的事情，这样大的满洲国，哪有因粮食不足而饿死人的道理”、“勒紧裤带

也就过去了。”总理大臣在上面号召“勒紧裤带”，下面的小汉奸狗腿子们真就勒上了，有的地方干脆一粒粮食也不配给。在伪北安省，1943年7月份完全停止了粮食配给；在伪牡丹江省有6620名老弱妇幼被长期停粮。老百姓说这不光是勒裤带，是让我们扎脖子，人不吃粮，哪还有活路！仅1942年1至5月，在双城、佳木斯等5市县就有346人因无粮可吃被迫自杀。而张景惠在1945年4月作为慰问特使亲赴日本东京，送去大米30万吨、盐70万担，并表示：“满洲物资丰富，有力量援助亲邦进行圣战。”

除了“出荷”粮食外，张景惠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求，又通过“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人民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如门拉手、汤匙、点心模子、乐谱架子、炉篦子等，不论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统统都列在“金属类回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唠叨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又如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务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协力圣战”。

张景惠还下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1944年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一次就从东北运去20吨铜。

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物，而且还要钱。1932年伪满刚成立，全东北税收1.7亿元（伪币）。张景惠上台执政后，巧立各种名目，拼命征税。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他经手所收的税，就有土地税、人头税、畜牲税、车辆税，还有保甲费、协和会费、门户费、天照大神供奉费、狗牌子费以及鸡、鸭、猪等都要上税。这位伪甲长初步折算一下，当时一般

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150多公斤粮食的杂税。因此，仅1937年伪满的一年税收增至3亿元（其中包括专卖收入），到1944年竟增为11亿元（也包括专卖收入）。

掠夺成性的日本殖民侵略者要物、要钱之外，还要地、要人。张景惠上台执政两年，关东军自认为已经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于1937年夏，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满洲拓植会社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国要以20年为期，向“满洲国”移民20万户、100万人。移民自然要先占地，自1937年以来，先后有2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包括山林荒地），其中有1200万垧良田，逼得40700余户农民背井离乡。

要人，是征用东北人民无偿地为日伪当局服劳役，即“出劳工”。开始是煤矿、水电站征用劳工，以后关东军搞什么“北边振兴计划”，大修军事工程，更是大量征用劳工。经张景惠的手，又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18岁到45岁男子都有当劳工的义务，日伪当局每年所需劳工起码50万，有时竟达近百万。1942年为落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计划，又临时紧急征用劳工40万。一时征不到，就在城市大抓所谓“浮浪”，一些无业的城市游民或上街碰上抓人，就都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被押运到东部或西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每天平均强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加上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流行。劳工死亡率平均达15%。由于人民叫苦连天、怨气沸腾，关东军闻知找张景惠，他却说：“满洲人苦力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们不要顾虑……”

张景惠奉行的“要啥给啥”主义，自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疯狂掠夺。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掠去煤炭21661万吨、铁1183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掠去

钢、钢片 988.6 万吨、钢材 319.6 万吨。这些数字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几乎近于天文数字那么可观了。

1942 年，当“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关东军又抛出了什么“十年的历史发展已使日满结成不可分的父子关系，满洲应该称日本为‘亲邦’。”作为去日本面谢十年“援助”的特使张景惠，在东京致辞时便口口声声称日本为“亲邦”，不惜连祖宗都出卖了。

1944 年日本已经面临全面失败的颓势，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对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张景惠仍然倾向日本，为日本尽力。”确实，就在 1945 年 4 月，张景惠最后一次去日本送米送盐时，还向铃木贯太郎首相拍胸脯保证：“请放心吧，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好办。”

总之，张景惠的“要啥给啥”是汉奸的卖国逻辑，也是个人荣身富贵的可靠保证，循此也就找到他这位铁杆“总理大臣”稳坐其位的奥秘。

“凌升通苏事件”真相

正珠尔扎布

所谓“凌升通苏事件”发生于 1936 年 3 月（伪满洲国康德 3 年），日本宪兵队在海拉尔等地逮捕了凌升等许多人。一个月后移送伪新京（长春）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经伪军法会审判处死刑者 4 名，13 年以上徒刑者 2 名。

这件事是在汉奸、蒙奸之中轰动一时的大案。当时驻海拉尔的日军骑兵军集团长笠井中将、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中佐、伪

满兴安军顾问寺田利光中佐和日本海拉尔宪兵队长北川宪兵中佐等4人，是制造这件事的主角。

究竟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有无事实呢？至今是一个哑谜，综合我对这件事的见闻，我认为只是“莫须有”而已，凌升封建余孽叛国求荣，决不会采取通苏以实行反满抗日的爱国行动。只不过自以为拥戴有功，分省长的地位没有满足其愿望，流露出怨愤之情，加以刚愎自用，某些地方刺痛了日寇的隐衷，触犯了主子的尊严，所以被杀。

“九·一八”事变以前，凌升是呼伦贝尔副都统。他封建思想很浓厚，对满清皇朝的复辟抱着幻想。“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把废帝溥仪拉出来作傀儡引起了蒙古封建阶级攀龙附凤的兴趣。溥仪到了旅顺，凌升积极活动起来。跑到旅顺见了溥仪和关东军，参加策划伪满建国的阴谋活动。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凌升被任命为伪兴安北分省省长。他的父亲贵福被任命为伪参议府参议。凌升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对日寇的专横、满系官吏有职无权的状况很怀不平。对日系同僚态度傲慢，对日寇统治满洲国的政策措施，多有抵触，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走狗群中称硬汉，取死之机已伏。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省长会议。当时，我在会上当翻译，凌升公开发言，反对日寇对满蒙的一些政策如土地国有；日寇参加满洲国政府当官吏（所谓日系官吏）；用日语作为满洲国国语并用日文行文；把蒙古地方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等。他说在满洲国的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能作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什么叫分省？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能实施呢？弄得主持会议的日系蒙政部次长瞠目不知

所对。他提出的意见也很多，都为日寇难以接受的。这样凌升与日寇鸿沟很深，参加会议的满系人（汉奸）都噤若寒蝉，莫敢是非。

1932年10月，伪满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郭尔罗斯前旗亲王）、伪兴安东分省长额勒春、伪兴安北分省长凌升等赴日本参观。随员有辅导员、伪兴安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翻译正珠尔扎布等。在日本各地参观了一个多月，参观当中也对白滨提出很多难题。最严重的是他反对到日本各地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他说我们参观的目的，是为了逛逛名胜古迹，观赏风景而来的。不是为参拜天照大神而来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凌升作为伪满首席代表，参加在满洲里举行的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会议，当时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的日本代表、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路过满洲里，驻满洲里的日本领事和凌升联名在满洲里车站食堂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看见日本领事的座位是主人的位置，而自己则列了次席，不肯参加宴会。日本领事解释说：因为请的是日本代表，日本领事应该坐在主席。凌升说虽然请的是日本代表，但是这个地面（指满洲里）是属于兴安北省管辖的范围，我是这省的省长，客人到了我的管辖地方，应该省长我坐在主人的席位。两人争执了一番，领事无奈把主席让给凌升。

凌升和抗日将领苏炳文有来往。他的妹夫春德也同情苏炳文。而且为苏炳文的事，他还给蒋介石打过秘电。这些都在日本人的手里掌握着，成为日寇将他列入“视察人”的把柄。

根据上述情况，凌升在日寇的心目中已成为统治呼伦贝尔的一大障碍。

伪满成立以来在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上，由于日寇野心挑衅而不断发生国境上的纠纷。特别是在1935年以来，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一带发生的彼此间的冲突中，每次战役日军出动军队若干人，蒙古人民共和国总是用加倍的兵力来对付，日寇老是打败仗，伤亡很重。

驻地海拉尔的笠井骑兵团长认为皇军惨败的事实，对所谓“皇军之面目”来说是难堪的。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责任，因此扬言有人通苏，窃取了日军的行动情报，于是首先在国境附近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伪满上尉团附沙德勒图和伪警察沃兴泰等。逮捕以后，日寇宪兵严刑拷打硬逼他们说出背后关系。终于捏造出凌升等有间谍活动和反满抗日通苏的口供。

1936年3月27日日寇突然宣布海拉尔市戒严，出动了许多宪兵和军队戒备、巡逻，旅客乘坐的火车、电信电话的使用、文件来往均行禁止，形势非常严重，人心惶惶不安。当天逮捕了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并搜查他们的私宅，结果一无所得。过了一个星期，凌升自伪新京回到海拉尔。下车后就在车站被日本宪兵队长逮捕。凌升的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偕同顾问田中佐等，到笠井骑兵团长那里抗议，要求释放凌升。笠井支吾应付，不一会，日本宪兵就在笠井司令部逮捕了福龄。

在新京（长春）伪蒙政部召开的伪兴安省长会议，随行秘书官华霖泰也在新京被诱捕。

凌升被捕后，数十名日本宪兵包围了凌的住宅进行大搜查，但私人住宅里，除了金银货币以外，没有什么通苏的证据，只是在旧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了两挺机关枪，以及四五十支步枪和子弹数万发。这些枪械子弹是马占山、苏炳文出走时无法带去，给凌升留下的，凌升尚未正式移交警务厅。日寇得了

唯一可以作为凌升“通苏”证据的东西。

此外日本兵还捕了保定（伪省公署科长）等许多人，又到伪兴安北省总务厅长荣安和海拉尔伪市长春德家里去劝诱，软硬兼施叫他们说有关凌升等反满通苏的事实。但是仍然什么证据材料也没有得着。

凌升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里，经过严刑拷问后转解新京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以后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伪满军法会审，在日本所宣布的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公报上，一点也指不出事实，只不过是空空洞洞二三百个字的罪状。

“凌升等通苏事件”宣布后，日寇对蒙古民族加强了统治。在一次集会上，伪满军事部高级顾问花谷正少将宣称，今后无论任何人，若是说蒙古独立的话，就拿反满抗日的罪名来惩罚。

所谓“凌升等通苏事件”发生后的一天，堀内一雄（中国名叫满良，伪满第一军管区少校参谋长，我早在日本时与他相识）由新国都旅馆来电话找我。会见后他问凌升事件是怎么回事？我答以不知，他说这次为了裁判凌升，要组织军法会审，特地调他来充当裁判长的。他也不知道这事的底细，问我有什么意见，给说一说。我说我想他（凌升）不可能有这个事，他还要跟皇帝结亲呢，在新京也盖了大楼。他父亲是参议，自己是省长，还能有别的想法吗？堀内默然。

裁判结果，把沙德勒图判了15年徒刑，沃兴泰判了13年徒刑（他们都在狱中死去，怎样死的不详细）。凌升、福龄、春德、华霖泰都处死刑。

1936年4月，在新京南岭刑场凌升等人被执行枪决，当天在太子堂（日本庙）尸体由各家属领回。这个案件的处理是按着关东军的意旨行事的，既没有辩护律师，而裁判长及裁判官又是日人，只是扮演了一出傀儡戏罢了。

凌升事件结束，关东军宣布这件事不再扩大；不再检举逮捕。拿这话来安定人心，又假惺惺地表示怜悯说这样大事件本来应该诛灭九族，但是大日本帝国不忍那么作，他们的亲属都免罪。于是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到日本留学去了。

(海拉尔市政协供稿)

凌升之死

恩克巴图

凌升是伪兴安北省省长，达斡尔族，1936年被日本统治者杀害。那是在3月末4月初，海拉尔的日本宪兵队，发布了戒严令。出动了几千人马，包围了海拉尔及南屯、西屯、莫和尔吐屯，禁止行人来往，出入者必带日宪证明。在街道口村落中贴满了布告，其内容是：要在几天内一网打尽不良分子，搜查了不少住户。经过七昼夜才解除了戒严令，各行业恢复正常，报上登载了凌升通苏事件。与凌升事件有牵连的春德（伪警务厅长、凌升妹夫）、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凌升的弟弟）、沙德勒图大尉和警佐沃兴泰也都先后被逮捕。

凌升等四人被捕后，在日宪惨无人道的审问中，没有承认任何罪状，也没交待过其他人，由于案情重大，很快就把他们送往长春军事法庭。他们在长春也没承认任何罪状。同年4月末凌升等四人，在长春的南岭被日宪枪决。

据正珠尔扎布（伪军官）的回忆文章说：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到伪康德皇帝（溥仪）面前说，前几天破获了一个案件，罪犯是陛下认识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

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当时目睹行刑情况的伪治安部官房长官入江上校，后来对我谈过凌升被枪决的情况。他说，这人真倔强，临刑时面不改色，含着冷笑，叫他带上覆面带时，坚决不带，挺着腰板不在意。问他还有什么说的，他说：“没有，快打吧！”事后听说，凌升被拷问中，始终没供出任何通苏事实，只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凌升事件当时轰动一时，在报纸上发表，但没具体事实，谁也不敢议论。现在在文件报刊上难于找出线索，他们四人被捕至枪决只一个月，其后报刊上也不刊登，日本人也不谈，象毫无其事一样。

凌升被捕当时，日军到他家搜查了好几次，没找到任何秘密文件，登记了所有的财产，到野外敖特鲁查点了他家的牲口，没有没收。

其后不久，把凌升的儿子色布精太送往日本学习。

伪满洲国刚成立时，凌升是拥护并亲自前往旅顺，参加了各地的“请愿代表团”，拜见过爱新觉罗·溥仪，请他出马上任伪政权元首。但是凌升当上了伪兴安北分省省长以后，在工作中他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日本侵略者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有一次和伪满各省省长去日本参观，参拜日本天照大神庙以后，他说这是日本皇帝的祖先，不是我们的祖宗，为何让我们去参拜。

伪满政府给凌升发了勋章，他拒不接受。

有一年关东军为了向苏蒙挑衅，调来一批精锐部队陈兵到满蒙国境线上，当时凌升到车站去迎接，日本的队长同他谈过军事情况。当该部队开到西部国境交战时，苏蒙方面早已布置

了大军，超过了日军好几倍。在交战中，日军大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因失职被调回国。当时有一位从长春来海拉尔的蒙族官吏说过：“因对方的消息很灵通，所以在几次的国境冲突上日军大败，一定是在兴安北省的大官内有地下活动组织。”

于1936年3月末，在长春召开了伪兴安四省伪省长会议，会上谁也不敢提土地问题。可是，凌升挺身而出，强烈反对日本内地开拓团移入内蒙地区，反对日本官吏的独揽大权，反对日本关东军干涉地方政权等等，惹起了日本军部的恼怒。散会后，凌升和华霖泰二人回到海拉尔就被捕入狱了，以后又逮捕了春德和福龄。这是我所知道的凌升被害的片断。

附 记

花赛·都嘎尔扎布

关于凌升被杀害的问题，当时的伪兴安北分省公署警务科长板水梧郎（日本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36年4月12日的夜间在自己的家里用小型电影机放电影的时候，日本军司令部来电话命令说：火速来到司令部。我马上跑到司令部时，那里的接待室里坐着特务机关长寺田大佐（上校），我小声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用汉语说：“没法子”，过了一会，司令部的参谋长出来正式命令说：

“一、同蒙古人关系密切的三位可能有意见，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严禁向上级提意见和联系。

二、凌升为首的蒙古人搞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已经揭露，因为今夜早晨4点钟宣布戒严令，要逮捕凌升以下几名蒙古要人，

对于有关这个事情的一切事儿都由日本军队来施行”等等。他还写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一些以前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怀疑的行动，军参谋长说他们搞了蒙古独立活动，但是凌升没有军队的指挥权，或者向外蒙古请求援助么？过去没有这样的行为，头脑聪明的这个人（指凌升）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但是成立满洲国以前，在呼伦贝尔，他们掌握绝对的大权，成立满洲国的时候，他也有功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过分干涉省的内部事务，他有些不满意，这是事实。关东军方面，找理由换省长的意图过去是有过。从多方面考虑对凌升事件，不能不说关东军有些阴谋诡计的事情。”等等。

以上是摘自日本人冈本俊雄写的《一名布里雅特蒙古青年和一名日本青年的会见》一书，第111页到113页。（昭和54年7月，日本奈良市实业印刷株式会社发行，非卖品。）此人当时是伪第十军管区司令官乌尔金的翻译官。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枪决的内幕

藤山一郎

贾玉芹 译

“满洲国”宣布帝制后不久，在一个秋季的日子里，我去中央银行总裁荣厚的公馆拜访。当谈话提到王维时，荣厚突然说：“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说完，他把我带到新京城内东三道街

益通银行院内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有袁金铠、李槃、宝熙、三多、王季烈、沈瑞麟，还有年轻的于莲客，此外，佐藤肥高也在座。事后得知，这个集会叫做“乐诗会”，在这一俱乐部内有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荣厚从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拿来芳醇的绍兴酒，每月举行一次集会。达斡尔族出身的贵福和溥仪夫人秋鸿（即婉容）的父亲荣源也参加这一集会。贵福最为平易近人，以后同我成为至交。他是我将在本文中记述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的父亲。建国前他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自清朝以来，一直是驻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麾下主持蒙古行政，在草原绿洲的海拉尔威震一方。

中华民国时期，政府为了博得蒙古人的欢心，编制满洲八旗，使其负责镇守边境，尽力使彼此间不致产生裂痕。而当吴俊升任督军时，呼伦贝尔被纳入黑龙江省长管辖之下。民国7年，爆发了巴布扎布事件。巴布扎布与张勋一派相呼应，企图复辟清朝，很快夺取了伏西、嫩江，进军至林西，最后以巴布扎布战死而告失败。其幕后就有这位貌似温厚的贵福在暗中活动，他曾为巴布扎布提供过大量金元和子弹。

民国11年（1922年）又发生了“梅尔赛叛乱”。他与贵福同样，也是达斡尔族人。他企图搞呼伦贝尔独立，私赴苏联，获得大批武器，同吴俊升交战。但是，他也是武道不佳而一败涂地，逃入苏联驻齐齐哈尔领事馆，又去外蒙，以后杳无音讯，下落不明。梅尔赛的父亲荣禄长期任索伦旗旗长，建国后任蒙旗联合办事处处长，在凌升身边充当卫士的角色。梅尔赛叛乱的直接原因是反对吴俊升向呼伦贝尔输送山东流民开垦土地所导致的。

二

贵福已近入暮年，表面上似乎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但我却有一种直感，他暗中在祈祷着凌升大业有成，并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时，我正任恩赏局局长，总想去呼伦贝尔拜访凌升。截止1936年，草原大约有2.7万名游牧民散居各处，而贵福一行的达斡尔族却只有386人，其中壮年男子据说只有165人。自清朝300年以来，被称作“达斡尔政权”，掌握草原主权，广施仁政，颇得好评。达斡尔族共分三家，其姓为郭尔钦（郭）、孟尔钦（孟）、和敖罗钦（敖），其意为“川上”、“川中”和“川下”。据说，这一名称来自他们是在蜿蜒的额尔古纳河边形成的部落。孟尔钦一门居其首，据说连张作霖主持的东北政权，对于其实力也难以敌对。

我同凌升的相识是通过兴安总署次长菊竹实藏介绍的，后来交往甚密。经常在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相会，每当这时都是边进餐，边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乍一看来，他似乎是一个住日本农村的私塾先生，身材短小，面容温和。但他却具有天生的骑兵团官性格和祖传的不屈不挠的强悍精神。谈话一旦涉及蒙古行政问题，他便十分激动，语言中多有过激之辞。例如，他曾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现在我们已经走投无路，连北满的日本开拓民，关东军也把他们当做看门狗，我们的要求或许是过分的，不过满洲还有辽阔的土地，即便是日本人，如果将农耕民族引进草原，也是无视天理的愚蠢之举。政府既然提倡五族协和，蒙古人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蒙古人拼上性命也要死守西边。”这是他坦率的肺腑之言。

如上所述，凌升不欢迎汉民族进入草原，同样也不欢迎日

本移民。关东军决意要消灭凌升一族，而重用布里亚特族的乌尔金。乌尔金毕业于帝俄时代的俄国军官学校，1917年10月间被驱逐，带领布里亚特和蒙古族两千人，从伊敏河支流越境。建国后，被编入索伦族，任族长，后来又被任命为满洲国陆军上校；在关东军策划的消灭达斡尔政权的阴谋中又晋升为少将，任蒙古军司令官。1934年，在海拉尔公署就任时，曾在省长凌升面前行“跪重”之礼，而很快便同省长平起平坐，甚至在关东军的某些集会上，有时竟居省长的上席。此人活泼开朗，身材高大，潇洒英俊，颇有将军风度。

凌升有一弟弟名福龄，是陆军上校，但生来缺乏阳刚之气，颇有文人气质。作为军人终究不及乌尔金。而在凌升的内心中，由于他失去了担任司令官的机会而不胜惋惜。因此，在兴安北省的官场中投下一缕阴影，从而导致政治动摇，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警察厅长敖春德，他的汉语是在南京大学学习的，音调优美，思想激进，被视为危险人物。每次到新京来都来我这里，毫无保留地畅谈他对引进新文化和开发草原的设想。其妻子是凌升的胞妹。关东军早已在待机消灭他。

三

对于建国有功人员的首次奖赏大约用了两年时间。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关东军强行要求其全部官兵都要获得奖赏，这样一来，人数将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在公布前夕，又发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那就是关于省长凌升的问题。恩赏局早已进行过充分调查，认为凌升至少应授予勋二位。建国当时，他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拥有实力的人物之一。他曾置生命于不顾将皇帝带来满洲。对

于苏联，他也属于第一线人物。然而，横山中佐却一再来恩赏局，强烈要求授予凌升以勋四位，相反却要求授予乌尔金以勋三位。我作为恩赏局的负责人，当然不会屈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恩赏局同关东军经过激烈的争论，我曾一度遭到软禁。最后，我的顽强抵抗也是徒劳无益的。对于在建国时毫无功劳可言的乌尔金授予勋三位，而省长凌升却只被授予勋四位。事出无奈，只好公布了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恩赏名单。当时任兴安总署次长的伊田四郎和前任次长菊竹实藏，在公布之前由于问题严重，认为它不仅将对蒙古行政的前途投下阴影，而且对满洲国的政治也将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求关东军三思而后行，但却遭到了关东军的严厉驳斥，凌升的勃然大怒自不待言，贵福一门的绝望心情也是可以想象的。

贵福一门始终绝对效忠于溥仪皇帝，私下称清朝时代为“前清”，称满洲国为“后清”。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必须着用清朝时代的官服，以显示其热忱与忠诚。据说当凌升拿到勋四位景云章时，立即将它摔在地上。他一是为我这个朋友和恩赏局长的无能而感到气愤，但在关东军的强权面前，我也确实无能为力。

凌升在授勋典礼上的急躁行动已在关东军的意料之中，于是便嫁以“反满通苏”的罪名企图将其消灭。同时，还以同样的罪名将除乌尔金之外的兴安北省的全部首脑，包括凌升、孟福龄、敖春德，以及郭华霖泰（省长秘书官，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生，梅尔赛的堂兄）等人，于1936年3月23日上午10时，在新京郊外的南岭刑场，依据关东宪兵司令官的命令全部予以枪决。

按照郭华霖泰、敖春德、孟福龄和凌升的顺序执行死刑，临刑前他们的态度都极从容。其中，凌升特别被问到有无遗言，他

对在场的下永宪次说：“希望你能转告我的长子，以背叛皇帝的罪名处我死刑，我感到十分遗憾。请将这件上衣转交给他！”说着，脱下上衣，拒绝覆面，站在了受刑的位置上。

然而，他那大义凛然的態度震慑了行刑者，子弹射偏了，他虽一度倒下，又自己站了起来，并指着自己的心脏部位，从容地说：“向这里开枪！”枪声起处，按照关东军的意图完成了对他们的杀害。

伪兴安南省省长 叶喜海顺被革职一事

查干 萨哈雅

叶喜海顺是图什业图旗（今科右中旗）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袭札萨克和硕亲王。1914年叶喜海顺亲王与清室皇族肃亲王的女儿金孟显珍结婚，成为肃亲王的贵婿。辛亥革命后，得到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赏识，1920年又认了东北军阀张作霖为义父。

叶喜海顺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大清”的肃亲王善善及其子女宪真、金璧玉、金璧辉（川岛芳子）等关系密切，他们勾结日特山良为首的日本人，经常出入叶喜海顺王府，秘密搜集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叶喜海顺亲王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把东蒙古并入伪满洲国，他参加了日本关东军策划的“郑家屯会议”，会上他积极赞同会议主持人菊竹稻藏提出的满蒙政策，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赏识。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1932

年9月，叶喜海顺被任命为伪兴安南省第一任省长。日本天皇为了表彰他对建立伪满洲国的“功绩”，授予他一枚三级旭日勋章，叶喜海顺成了当时东蒙古地区显赫一时的人物。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开始调整对蒙政策，废除了蒙旗制度，实行“蒙地奉上”。大大削弱了王公利益。这些政策逐渐引起了叶喜海顺的不满，加之当了一年多省长的叶喜海顺，深感日本人专横跋扈，身在上层的王公毫无实权，因而不满的言论行动时有流露。一次宴会上，叶喜海顺亲王有了几分醉意，当时他无顾忌地说出：“如果我早知你们日本人是这样，当初就不该为你们卖命！”一语出口，招来了祸事。从此，日本人对叶喜海顺产生了疑心，认为他不忠于日本帝国，准备寻机撤换他。

当时兴安南省公署设在郑家屯吴俊升的宅院内，省长叶喜海顺的公馆安排在县长高某的一处宅院。1933年正月初一，房主高县长回叶喜海顺居住的宅院内设的家堂庙祭祖，省长公馆门前的警卫，将高县长一行阻拦在大门外，不准入院。高县长及其随从欲强行入内，与门卫争吵起来。门卫朝天鸣枪警告，高县长的马弁亦鸣枪示威，后院的省长叶喜海顺听到枪声，问及缘故，卫兵排长如实报告了门前情况，叶喜海顺大怒，拔枪朝大门方向开了两枪，当时并无伤亡，高县长等无奈，只好在大门外放鞭炮祭祀祖宗，开始的枪声和后来的鞭炮声混在一起。高某心怀不满乘机驱车到日本宪兵队和“满铁”公所告状，谎报省长叶喜海顺无故开枪，欺压汉族等。日本宪兵队不经调查，就到叶喜海顺公馆问罪，并抓走了1名仆人、1名家乡来拜年的亲戚。后经叶喜海顺和省公署的官员到宪兵队陈述情况，才不了了之。叶喜海顺一气之下，长时间没有上班，日本人以此为由，革了叶喜海顺兴安南省省长的职务。

当年春天，叶喜海顺带家眷先后转至沈阳、旅顺闲居。1939

年妻子因煤气中毒病故，叶喜海顺则于1944年秋在家乡科右中旗病歿。

本文据查干、萨哈雅等回忆文章及有关资料整理。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伪警察总监修长余之死

王德五

1930年秋，我充任大连泰东日报社记者兼长春分社社长，驻在长春。由于经常到长春市公安局采访，有机会和该局的局长修长余接近，渐渐地处熟了。

熙洽叛国投敌，成立吉林伪政府后，为了奖励修长余丧权辱国的“功绩”^①，特提升修为吉林全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卫团总办和清乡局副局长。做为熙洽的亲信，修长余到任后，叫他的督察长梁尊一两次来长春找我到吉林去，要我做他的日文秘书。此后，由于和修共处在一起，因而对他的情况我是知道一些的。

修任伪吉林全省警务处长时，他的家眷住在吉林德胜门外警务处的后院。每天晚饭后，他总要到熙洽的南公馆去。这里汇集着大小汉奸，赌博聊天，乐以忘返，修是不过午夜不回家的。他对熙洽、孙其昌这类人，自然是很恭维的。就是谢介石、张燕卿、郭恩霖、李铭书、荣孟枚一类所谓的新贵人物，也极力周旋于其间。吉兴从延边来省城时，他设宴表示欢迎，并有

^① 参阅《九·一八事变》卷中《日军侵占长春见闻》一文。

日本宪兵队植田中佐作陪。张书翰接任吉林省印花税处处长时，受到日本宪兵队的反对，他叫我给张书翰当翻译，请植田的客，进行联络。伪省政府各厅安插日人做顾问后，他向伪财政厅长孙其昌推荐我兼做该厅的日文秘书。有时候，他又好象很叹惜似地说，东北的情形愈弄愈复杂，凭中国自身是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的。看样子他认为中国人的前途只有寄托在外国人的身上。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随后伪政府的各院、部相继成立。一批批日本浪人和一伙伙汉奸纷纷来到了所谓的国都新京，当时客棧旅馆家家客满。3月12日夜間，修在吉林接到熙洽从长春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为了重视新京的治安，臧式毅民政总长和他商量决定调修为首都警察总监，要他到新京接事。13日修布置马季援督察长和张主任秘书共同负责暂时看守吉林警务处，14日早车他便带秘书王肇澄、王稔五、科长王致中和郎某等一齐奔向长春。下车后因旅馆到处满员，就暂时住在头道沟志远永鲜货代理店。当晚，修在省城公安局借用的200名警察也赶到，住在城内的一个大车店里。修连夜先后到熙洽、臧式毅的住所报到，他们两人对修从吉林借来200名警察充实长春的公安力量一事都感到非常满意。

第二天(15日)，修带着我到伪民政部去见警务司长甘柏正彦。甘柏却对修说，首都警察厅的编制还没有决定，请总监在家暂候几天，等到厅舍的地点和编制决定之后，再与你联系，新京的公安业务暂时仍由原来的市、县公安局照常负责。甘柏的这一番话，弄得修摸不着头脑，一切都同他原先所想的不一樣。他原来以为首都警察总监是全国警察之冠，有职有权。然而没想到上头出来这么一个警务司，又是日本人在管事，警察总监也不过是个虚名而已。为这事他曾亲自问过臧式毅，也未得到

什么肯定的答复。用他话说：“我总是糊涂。”

总监没有事，我们也得闲，整天里打牌喝酒。大约过了四五天，修叫我和他同去见甘柏，到了警务司，说是司长忙，由警务科长星子敏雄代为接见。一见面，星子敏雄劈头就问：是谁要你到吉林的警察带到长春来的？如果吉林市发生什么问题的话，谁来负这个责任？星子敏雄说话非常不客气，一听就知道他是不满意的。修被星子敏雄所激怒，也怒目相视，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是吉林省长同意，民政部总长要我这样做的，如果吉林市治安发生什么问题，我这个还没有辞职的吉林全省警务处长，一切责任还能负得起！你有什么意见，直接问总长去。说完他回身就向外走。这时，星子敏雄连忙起身追在身后对修说，总监不要误会，今晚我约你详细地谈谈。修未说什么，出门登车而去。到家之后，他对我说，这里一定有谁说坏话，今晚上如果星子敏雄真的来了，我们倒可以探询一下。下午6点钟，星子敏雄果然坐着小汽车来了，请修到“八千代”喝酒。星子敏雄原来是个嗜酒如命的狂徒，三盅入肚就丑态百出。从他口中，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与孙仁轩有关。原来自修调转吉林全省警务处长之后，熙洽就把这个长春市公安局长的位置派给了孙仁轩，修这次又回来担任警察总监。孙很是不安。于是就造谣说什么修要强制接收长春市公安局，还从吉林带来200名警察做打手，等等。警务司的日本人信以为真。修对星子敏雄说，孙仁轩不过是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个光杆局长，他的督察长、科长、分局长、分所长以及800名警长警士，哪一个不是我修长余的旧部下，他从哪一点能说我要强制接收？真是无稽的澜言。几句话说得星子连连点头，不断地举起酒杯，不住地说：“是啊，是啊！请喝酒，请喝酒！”

3月末，甘柏和修商谈，决定把第二模范监狱的一栋办公楼

暂做首都警察厅的临时厅舍。4月初，修把我们这些从吉林带来的人带到临时厅舍开始办公，进行筹备工作。这时，已有数十名日本人比我们先来了。这里也和各院、部的情况一样，只见日本人进进出出地很忙，而中国人只是东张西望地无处着手。修也只是上午来照照面，坐上一两个钟头，下午就不来了，晚间到熙洽、孙其昌、臧式毅的住所走走。

6月间，民政部正式公布了首都警察厅的官制，10月间正式开厅办公。按照伪政府的规定，接管了长春市和长春县两个公安局的警察消防业务，直接受民政部总长的指挥和监督（实际上是受警务司的指挥和监督）。原长春市公安局长孙仁轩调警务司督察室任督察官。首都警察厅的6个科长，日本人占了4个，修从吉林带来的人中，只有王肇澄弄了个保安科长，王致中、姚时中、郎某等人派为股长或科员，而我早在4月份就离开了警察厅。修长余也只好让日本人说了算。

10月间，在警察厅开厅后的不几天，我到修那里去，闲扯时提到国联调查团一事。记得，修很得意地说道：国联调查团来长春的时候，中国代表顾维钧的一个随从人员（名字记不清了）是我在营口时的一个同事。一天晚上，他偷着坐人力车从下处大和旅馆直接来到我家，向我打听满洲国的真实情形，我就当做说故事的一样讲给他听，他一直呆有两个多钟头才走。我看修说的很高兴，当时，我心里有些话想说，但未能说出口。我想：日本人为了监视国联调查团的活动，不能不做防范，这个人力车夫会不会是日本人伪装的特务？即或不是特务，也会有人跟踪的。修长余虽然是警察总监，但是日本人也不会完全信任他的。这个事日本人能不知道吗？我虽然想到了这些，可是由于修正在兴头上，尤其是他这个人平素好胜，总以为自己聪明，对别人的话总不愿采纳。所以，我只好抱着姑妄言之姑妄

听之的态度。后来在修的身上发生了两件事，使我不能不联想起他和顾维钧的随员秘密会晤的事，是否与这个事有关系？现在也是个谜。

1934年冬，伪满洲国实行地方区划改革，将原有的奉、吉、黑、热四省划为10个小省。当时，想当省长奔走活动的大有其人。修长余由于臧式毅、熙洽的推荐，已经内定为间岛省的省长。最初，修对此职本来不大满意。因为间岛省地处偏僻，省份小。后来由于大家的劝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后，他才同意了。可是等到正式发表时，间岛省长却是蔡运升。这个突然的变故，使他不能不为之一惊，究竟是什么原因？他自己纳闷，外界人也是弄不清。翌年（1935年）春，孙其昌从龙江省来新京出席新省成立后的第一次省长会议时，特地到修长余家去看望他。孙说，这件事一定是日本军部的意见。修说，关东军对我不满，也是在所难免，这几年我很少和这群军人有来往。孙和修本人都认为是日本人搞的，而日本人为什么反对修长余呢？这倒是一般人猜想不透的。

1935年的深秋，伪首都警察厅连续发生了两件不体面的事：一件事是长通路警察署长范某，发放鸦片零卖所许可证有受贿嫌疑被逮捕；另一件事是厅里的保安科长王肇澄因为三马路燕春戏院的建筑问题，受到长春地方检察厅的拘押审讯。一时间满城风雨，传说与修长余有牵连。范、王二人，在检察厅里几次受到严刑审讯，检察官直接向修长余的身上逼问，叫他二人咬定修长余受贿。据说这两个人始终没有承认，拖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论。在范、王二人被捕之前，长春地方法院检察厅修葺了一间优待号监房。当时，法院、检察厅内部人员都私相议论说，这是给高级人物准备的，要有重要案件发生。过不了几天，抓进来的是当科长、署长的小汉奸，也没有把他们押

进这个优待号监房。最初人们并未在意，可是经过几次刑讯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是要在修长余的身上找问题。从检察厅透出来的消息，传到了警务司和警察厅。果然，在范、王二人被捕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检察厅的小车开到修长余的住宅，说是检察官请总监有事。修去了之后当即被扣留，在那个“优待号”里拘禁40来天。据说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和翻译全是日本人，中国人谁也摸不着准信。修的妻子探过几次监，时间限得短，监视也严，不准随意谈话，一般朋友则不准许接见。当时的伪民政部大臣臧式毅、次长赵鹏第都是修的直接上司，但是谁也不敢过问。熙洽、孙其昌、谢介石、张燕卿等往日旧友也不敢露面出头。当我向孙其昌提出设法营救时，他只是闭目摇头。我曾想过：就算是修真的受了贿，就至于这样的严重吗？这里面日本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那么是什么问题呢？使我想到会不会与顾维钧的随员到他家访问的事有关？可能是日本宪兵借题发挥。

有一天，孙其昌一到班上就对我说，修云汀（修的号）回来了。又说，昨天晚上在大和旅馆看见他和总理（张景惠）在唠嗑，谈其被审的经过。并说，我看他有些精神失常，你替我去看看他。于是，我坐着孙的汽车到修公馆，我把孙其昌劝他“安心静养，暂时不必急于上班”的话告诉了他。回来后又听孙说：“云汀这个人刚愎自用，缺乏涵养，这事搁在他身上，他哪能受得住，气也得把他气死。”果然，修长余回家不过一星期就死了。据修的家人讲，他从检察厅回来后，始终不愿吃东西，医生也看不出是什么病。然而，在当时有谁敢说是日本人害死的呢？

修长余死后留下妻子和三男三女，大孩子刚满7岁，小的不过周岁。幸好修长余生前加入日本生命保险1万元。修死后，日

本帝国生命保险会社新京支店说修长余死因不明，不能履行契约之规定。我找伪首都警察厅去交涉，日本警务科长告诉我，决不许保险会社乱说胡说。从此，保险会社再也不敢说死因不明了。伪国务院还拨给一笔死亡退职金，修的灵柩运往营口原籍安葬。这些都说明，日本人是抱着一了百了的态度，不愿无谓地给其他汉奸们一种不安的刺激。

伪满修聘特使熙洽访日的罪恶活动

罗靖策

从1934年伪满政府改称帝制后，溥仪总算称了“满洲国”皇帝，觉得兴高采烈。其他遗老，如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胡嗣瑗等，也都觉得夙愿克偿，非常满意，并都对日寇极为感激。于是遂有向日本皇室派遣修聘特使，表示感谢的决定。特使的人选，正使为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副使为伪满洲国的财政部大臣熙洽。熙洽是满清的宗室，在“九·一八”事变后，首先推举溥仪为满洲的皇帝，对满清的复辟极为热心，所以决定派他为特使。以后，他就计划利用这次到日本去的机会，向日本当局首要提出他的满清复辟计划（就是卖国计划），要求日本政府许可，并给他以军事装备的援助，以便向中国大陆燃起战火把4亿5千万中国人民，都投入水深火热的战争灾祸之中。

1934年3月中旬，熙洽即命令我和秘书长李铭书准备到日本送人的礼物，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古董书画，都特别喜爱，所以就决定以中国书画古董为礼物。但是吉林是个小地方，长春也是商业都市，古董商特别少。特别是高价真品的古董，可以

说绝无仅有。如果到北京去购买，又因为去日本的期限太近，时间太短，并且没有真正的认识古董专家，难免受人的欺骗。尤其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古董，有很多专家、鉴定家，如果以特使的身份，送给日本政府要人的礼品是假的，让人家发现出来，岂不是笑话。所以对这个准备礼品的事，大家非常伤脑筋。幸而吉林永衡官银号（吉林国库银行）的经理李荆山，这个人一生酷好古董。他在官银号20年作经理，所赚的钱，全都买了古董，都是真物，决无赝品。他和李铭书及实业厅长赵任羹都是好朋友，所以赵任羹说，可以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他所存的古董，让出一部分，不过20件，如书画、铜器、玉件头等，即可以够用的了。虽然李荆山这个人有古董迷，但是为了给熙大臣救急，他也不好意思不给。赵任羹去和他商量，果然一商量他就满口答应，允许自己所存东西，熙大臣可以随便取用，并将他买古董时的存帐拿出来，熙大臣用什么东西，就按他当时买的原价照付。就这样，把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熙洽就叫赵厅长、李秘书长和我就他所收藏的古董之中，选定了20件，都系最好的，如王石谷的山水，他有三幅，我们就选了最精的两幅。其它如戴克昌的作品、仇英的作品等书画共十幅，又选了周铜器鼎、觥、盘四五件，白玉和碧玉的件头四五件，共值一万三千几百元钱。选好后遂令吉林的秀古斋古董铺给打箱装好，负责在运输中不能损坏。这一切准备，一直到3月25日，才算忙完。

熙洽的随员，由吉林派定的为罗振邦、赵任羹；由财政部派定的为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庶务科长古海忠之，还有事务官二人。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随员有国务院秘书官郑禹（他的儿子）、国务院翻译官日本人（姓名我忘了），还有事务官2人，共12人。财政部星野直树，担负一行的一切事务的责任。至于

由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送给日本天皇裕仁的礼品，有东北出产的虎皮、豹皮、貂皮、最好的老山参、鹿茸等等的土产品。最可笑的是当我们到日本东京把这些礼品送到日本宫内，摆在日本天皇的招待外宾的宫殿内，请日本天皇看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不知道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送给他的，还说什么南洋的菲律宾送给他的。

在1934年3月28日早8点，伪满洲国访日修聘特使一行共12人，由新京（长春）乘专车出发去日本。3月30日晚8时，抵朝鲜釜山。31日6时抵下关，有日本宫内省派人来迎接，上陆后乘日本国天皇派来迎接专使的国宾专车，于31日晚5时抵东京。

熙洽拟定在日本住三星期。熙洽在4月2日晚对我说，他打算在日本皇室正式招待完了以后，用两星期的时间，分别拜访日本政府的各大臣和在野的要人，叫我给他做一计划和接洽联络，并且把带来的礼品，分别各人的身份，及和“满洲国”的关系，每人给一份，也拟出一个清单来。我当时主张对于日本政府的各大臣及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必都一一访问，只选重要的与满洲国特别有关系的大约在20人以内即可。熙洽同意。我当时即着手调查，我那时对日本国内各要人的履历以及他们在社会的地位、政治背景等，虽然知道一些，但是并不十分完全。我当时想起来，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赵欣伯正住在东京，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他对日本的情形非常熟悉，在日本政界的友人也很多、可以说是日本通。我遂去找他，和他商量，拟定一个名单，计有斋藤实内阁总理大臣、陆军部大臣（名字我记不清了）、内政大臣与部麒三郎、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犬养毅，文教大臣（我记不清姓名了），系以前内阁的陆军大臣，在军人中亦颇有势力，系少壮派军人的领袖。

军事参议官榎崎大将，他为当时军人中资格最高，年岁最老的典型。本庄繁大将、高桥是清大藏大臣（财政部大臣）、芳泽公使、小矶广岛师团长、宇垣一成朝鲜总督、外交部大臣内田康哉、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共13人。除了小矶师团长及宇垣总督、芳泽公使外，均由赵欣伯给接洽拜访的日期、时间及地点。4月8日，熙洽首先访问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子爵。当日早8点，我同熙洽由帝国旅馆乘汽车到总理官邸，当时有秘书在门前迎候，将熙洽让到客厅，由秘书献烟、茶后，约5分钟，斋藤总理大臣到客厅与熙洽握手寒暄后，分宾主坐定。首先斋藤实子爵向熙洽说，阁下在许多天的应酬中，一定很累，今天还特地分出工夫到我这里访问，太不敢当了。熙洽说，这次来贵国访问，蒙各方面热烈欢迎、招待，实在感激得很，尤其是此次满洲国改称帝制，阁下一定尽力很多。我们皇帝陛下，也对阁下非常感谢。熙洽又接着说，我这次来访阁下，除了表示敬意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阁下谈一谈。因为满洲国已蒙贵国的援助，改称了帝国，从此我们两国的关系，象兄弟左右手一样密切，利害是完全一致的。满洲国的发展，即是日本国的发展，所以我打算从现在开始，完全脱离行政的职务，训练30万人的军队。所有的装备及重、轻武器，完全希望日本供给。待军队训练好以后，即行开进关内，占领北京、华北及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看蒋军的强弱多少以及当时军事的情形如何，决定占领地区。总之，以黄河以北为限。待人心安定、治安确保以后，那时即请满洲国皇帝陛下回到北京。以北京为满洲国的首都。对这30万的军队，进行休养整编，然后看情形再行训练新兵50万人（50个师团），一切装备，轻、重武器，也请日本供给，待训练好后与前有的30个师再一齐向长江以南进展，向蒋介石的老巢南京进攻。同时，进兵武汉、四川、江西、

湖南、两广、西南各省，以及云、贵等地，以恢复旧日满清的全部版图。到那时，日满的关系，更加密切。名虽两国，实为一体。日本可以尽力在满洲国内发展经济，开发矿产，建设工厂企业。不到20年，则满、日两国，均能富强起来，可以雄飞世界。日本可以为东亚盟主。欧洲英美的势力，可以完全由中国大陆驱逐出去，满洲国人也能和日本人一样，过富强康乐的好日子。这是我的计划，但是实现这个计划，日本必须从现在起援助满洲国30个师团全部军事的装备，待进入北京后，日本需要再援助满洲国50个师团的全部装备。所有的代价，由满洲国作为借款的形式，分期偿还日本。不知阁下以为我这个计划怎样？如果阁下认为可行，我回满洲后，即行奏请皇帝陛下，派遣专员来和贵国有关方面，正式来商洽制定条约。斋藤总理大臣听完熙洽谈话以后，说阁下这个计划是很好，非常远大的。但是满洲国成立刚刚3年，国内治安，尚未确保，人心还没安定，所以象阁下这种计划，为期尚早。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冷淡，面上也没有表现丝毫的感情。熙洽遂叫我把带来的礼品，周铜鼎一个，送呈斋藤，说略表敬意，作为纪念。斋藤说阁下到我国来，我们应该送给阁下纪念品，反倒受阁下的，实在不敢当。熙洽说不要客气，请收下吧。斋藤就叫秘书拿去收下，熙洽遂即起身告辞。斋藤送到门外阶下，我们遂即回归帝国旅馆。熙洽到旅馆后，心中似乎非常不快，午饭后，向我说，斋藤这个家伙真正太岂有此理，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并没思索考虑，就拿为期尚早四个字来作判语加以否定，令人太不痛快了。我说我看他在听大臣说话时，象毫不在意的样子，也可以说他根本对于这个问题，不感什么兴趣，所以态度非常冷淡。

4月9日午前10点，往访榎崎军事参议官。榎崎大将是日本旧军人的典型人物，只知道为天皇尽忠，自己的生命都是属

于天皇的，为了表示自己忠诚，随时可以拿生命报效天皇。根本不结婚，没有家族，只自己一个人住在东京郊区一所小民房内，没有任何使用人。只有他一个侄孙女来照顾，给他做饭洗衣服，整理家务。我们到他门前时，只有一个很小的庭院，种点草花。院内进不去汽车，车就停在门外的街道上。我们进入他的住宅时，他已经站在门内相迎。由他本人引导熙洽到楼上日本式客厅，分宾主坐定。看榎崎大将有70岁以上，须发皆白，面色红润，身材非常魁梧健壮。他先开口向熙洽说，阁下这次来我国，每天都有公事的应酬，当然很累，今天还特别来拜访我，太客气了。熙洽说，听说您是国家的元老重臣、日本军人的模范，又是我的老前辈，所以特地托赵欣伯先生介绍，前来拜访表示敬意。并且有一件事情，想向阁下请教，并请援助。榎崎说，我们是先后同学，又都是军人，无论有什么事，尽管说，绝对不要客气。这时由他侄孙女献上日本式茶点，榎崎让茶，并请吃点心。他说，我一生无所好，只好吃酒和饭茶，我这茶是今年的新茶，京都宇治山的玉露，请阁下尝尝新茶的风味。熙洽遂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又说，这个点心是风月堂制的最细的纯日本式的茶点，都是日本特别风味的。熙洽又拿起点心尝了一块。为了表示答谢主人的盛情，熙洽称赞茶点甚好。这时遂说，我今天来是向老前辈请教及请求援助。我有一个计划，遂将向高藤所说的事情，叙述一遍。榎崎大将听熙洽这套议论的时候，频频点头，表示赞成。待熙洽说完了以后，他说，你这个计划太好了。蒋介石是同英美合作的，绝对不能同日本合作。如果满洲国能够消灭蒋介石的势力，实行日、满经济合作，这是与日、满都有利益，日本当然赞成的。如果有必要，你还可以向关东军商量，把关东军动员一部分加入满洲国的军队内共同去作战。再训练军队时，也可以大部分利用关东军的将校作

教官，那就快得多了。熙洽说这是当然的，我也这样打算。熙洽又接着说，如果将来我的计划，日本当局能采纳时，希望阁下在军事会议上予以支持和援助。榎崎说，那是自然的，我祝你的计划成功。然后又问熙洽在东京住多少日子，几时离东京，还到何处旅行的杂谈。熙洽遂即叫我把带来的礼物，王石谷山水画一张送给榎崎，榎崎推辞不受。熙洽说这是作为会见的纪念，无论如何，也得收下。榎崎遂即接下，并令他的侄孙女当时挂在墙上。熙洽遂告辞，仍由榎崎送到屋外，等我们上车，方始回去。我们于11时回到旅馆。午餐时，熙洽的表情，不象昨天那样不高兴了。

4月10日去拜访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10时半到他的公馆。当由秘书官让到宅后一间布置极为精致的日本式书斋中，这间书斋面对庭后的花园，三面为整个玻璃窗，时值早春，花园中盛开各种花卉。有白色的玉兰及粉红的杜鹃，还有各种兰草。所谓日本有名的樱花，还含苞未放。中间有一活水池，周围陈列很多的奇石。室内陈设亦极为雅致。陈列的古董书画，大部分为中国的物品。在一个古董架上，陈列一个均窑宋瓷古瓶，一个青花大瓷盘极为美观，这两件物品，在中国亦属罕见之物。秘书献茶后，约三四分钟，近卫着纯日本式服装，方始由室外的走廊进入书斋，向熙洽寒暄后，分宾主坐定。先由近卫说阁下连日作各种公事访问，一定很累了吧，还在百忙中到我这里访问，实在太客气了。熙洽说对于满洲国这次改称帝国，公爵一定有很多的支持援助的地方，我代表我们皇帝陛下向公爵表示谢意。从此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两皇族的关系，当然日益密切；如同兄弟手足一样。我久仰公爵阁下是日本国家的重臣、政治的中心人物，所以特地来拜访，表示敬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公爵请教，不知道公爵有没有时间。近卫说，今

天院里体会，我正在休息，有事尽管慢慢地谈，我有充分的时间奉陪，请不要客气。近卫说，听说阁下是满洲国皇帝陛下的直系家族吗。熙洽说是直系家族，不过年代已经很远了。熙洽接着向公爵说，因为我有一个计划是今后满洲国的发展问题。遂将以前向斋藤、榎崎二人所谈的事情，又重述一遍，说这是我个人的计划，不知公爵以为如何，倘蒙赞同，就希望将来在贵院会议中，予以援助支持。近卫听完熙洽这个谈话以后，态度很从容不迫地说，对于满洲国的将来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在今天日本的立场来说，是有种种问题的，关于满洲国的成立，由于国际联盟李顿的调查报告，欧洲各国多认为日本是侵略中国的东三省，不承认日本是援助东三省民众脱离张作霖父子的暴政而独立自主。现在各国的印象还大部分没有转变，假设日本再援助满洲国训练军队，供给武器，那就有可能引起新的风波，于日本更不利。日本已经脱离国联，并不是怕英美的干涉，但是如能避免，又何必惹他们狂吠呢。所以象阁下这种计划，还是缓一缓再行提出，较为适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只能作为参考。熙洽说，我是军人出身，对于外交及国际局势，知道的很少，公爵对于国际情势，了如指掌，所见当然是对的，只得候候国际局势转变再说了。二人又谈了一些闲话。熙洽遂叫我把送给近卫的礼品拿出来，系羊脂玉巧做香炉一个，高约九寸，刻的是仿周铜饕餮信。炉盖与炉身由一尺多长的玉石练相联，都是由一块玉石雕刻的，非常精致美观。呈给近卫公爵作为纪念，近卫当时极为推让，说我不敢受这种重礼，再三谦让之后，方才收下。熙洽说，以后俟机会成熟时，我再给公爵来信，请公爵不客气地指教为盼。近卫说一定不客气地陈述我个人的见解，然而是否正确可不一定，只作阁下的参考好了。熙洽遂起身告辞，近卫只送到玄关，遂即止步。便由

秘书送我们到门前上车。

4月11日午后4时，拜访“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这时本庄繁大将担任日本国际红十字会总裁，已经离了军职。他住在东京郊区，自己新建的住宅，系一日本式的房屋，内部客厅、饭厅系西洋式，规模很小，家内并无佣人，由他的太太和女儿出来招待客人，看样子生活非常朴素。因为他和熙洽在满洲国时非常的熟，可以说是老朋友，所以见面后并没有什么客气，即叙些别后的情形。由本庄繁问熙洽说，连日忙于拜访应酬，累不累，打算什么时候离东京，还到什么地方去参观。熙洽说最近接到满洲国财政部的来信，说有许多紧要的事情，待我回去处理，打算再住上三二日即行回满洲国。当时由本庄的女儿送上茶点，本庄大将让茶后，熙洽遂说，我这次来日本，原打算借机会向日本政府当局商量一件事情，所以才多住几天，向各方面接洽接洽。遂将他的大清国复辟计划又重叙一遍。又说这是我个人计划，不知阁下以为我这计划怎样。本庄说，我现在已经脱离军职，对于军事，已不过问。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只好谈一谈我个人的见解和我所知道的事情，以供阁下参考。日本因为“九·一八”事变问题，与英美及欧洲各国的关系，近来均不十分融洽，所以日本对于满洲国的问题，暂时尽力避免深入，以免刺激他们的神经。阁下也知道日本现在与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进行三国联盟的交涉，如果成功，那么日本对欧洲外交问题，即占主要地位，对于阁下所提出的计划，自然一时无暇顾及了。所以这时对于阁下这种计划，暂时不能不缓一缓再研究。还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日本援助满洲民族不堪张作霖父子的虐政，谋求独立自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我在满洲的时候，对于这一层也曾和阁下谈过数次，满洲国就是满洲国。人民的内政采取什么样

的政体，也是随满洲人民的大多数自愿。若说是大清复辟的问题，那又错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因为我们是老朋友，所以不客气地说出来，作为阁下的参考。熙洽说，阁下这番话太使我感激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以为日本既然援助满洲国改称帝制，那就是默认大清国复辟。所以才这样来和日本当局商谈，现在我知道了，日本回避的是大清复辟这个名词。本庄说，以后阁下认清满洲国是满洲国，不是大清复辟这一根本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溥仪既然作了满洲国的皇帝，是不是清朝复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熙洽叫我将带来的礼物拿出来，系明朝戴克昌的山水，还有一个周铜觥。熙洽说，这是我送给阁下的一点薄礼，不成恭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我来的仓促，只将我旧有的东西带来两样，送给阁下作纪念，请不要客气，收下好了。本庄并没推辞，当即收下。当时并留熙洽在他家吃晚饭。熙洽说，谢谢阁下的盛情。我晚上已经有了约会，下次再领吧。本庄说，如果有约会，那是不能勉强的，下次来日本，一定要预先留出时间，我请阁下尝一尝日本的家庭料理的风味。熙洽当即起身告辞，本庄说，因为阁下太忙，我也不回拜了，请您恕罪。我们遂即起身，他太太、小姐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相送。我们于6时回到旅馆。

这天晚饭后，熙洽对我说，我在这几天的访问中，已经看出日本方面的态度。对于我的计划是不能立刻就答应的。再见谁也是一样，我打算对于其他的人不见了。我们过一两天，就起身回满洲国。我说，大臣对于其他的约会、见面的人，不见也行，就得推说满洲国有事，部里来电报催促大臣立刻回国，我得替大臣到处辞退以前的约会。就那么不辞而别，未免太失礼了。尤其是中间有赵欣伯的介绍接洽，如果就那么走了，对赵欣伯的面子也不好看。熙洽说也好，那么你就从明天起，到各

处去辞退约会，我们带来的礼品，可以拿着预定的物品，送给他们。我们不必带回去了。再到广岛给小矶师团长的礼物和到朝鲜宇垣总督的东西，要留好一些的。我说，那么我就从明天午后去办，大约有三个半天就可以走完了。但是后天预定拜访的高桥是清大藏大臣以及芳泽公使招待宴，还是按预定前往，后天休息一天，整整行装，15日即起身离东京到京都。熙洽说好，就这样办。

4月20日早晨9时，小矶师团长派副官到旅馆，陪同我们到市外广岛湾。湾口内即岩岛神社。熙洽及小矶师团长单预备一个小浴池。熙洽入浴后，即同小矶在临窗处找一比较清静的地方，开始和小矶谈话。除了谈一些别后的事情，熙洽又将他的复辟计划详细说了一遍。小矶说，将来一定有机会可以实现阁下的计划。这种百年大计，岂在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就看将来国内国际的局势转变如何而定。将来我到东京时，我再询问有关方面。日本政府将来的方针，是否有可能转换，那时我再给阁下去信，告知一切。

4月21日午前11时乘大阪来的快车赴下关。晚9时开船，翌晨5时许即到朝鲜釜山港。到旅馆后约一小时半，即带着送给宇垣总督的礼物到朝鲜总督府去拜访。带来的礼物拿出来送给宇垣，是碧玉雕的炉瓶三设，为一个香炉两个花瓶，雕工极细，玉质颜色均好。宇垣说，阁下送给我这样好的贵重物品，实在不敢受。推辞再三，方才收下。熙洽说，我这次访日，除了访问日本皇室，还利用时间，作了许多私人的访问。因为我有一个计划，遂又将以上复辟的计划说了一遍。待熙洽说完，宇垣说，阁下这个计划太伟大了。熙洽说，可是所得的结果恰恰同我的预期相反，斋藤实总理大臣和近卫贵族院长都认为这种计划为期尚早，现在还谈不到，必须候一候。满洲国治安恢复，国

际局势好转，才能考虑这些问题。宇垣说，斋藤这些人，都对外国人怕得很。现在日本因为满洲问题，脱离了国际联盟，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在下月初到东京去办事，那时候我和他们这些人谈谈，对于阁下的计划，究竟有什么不同意的理由，待回朝鲜后，将我所得的结果，写信告知阁下。熙洽说，那太好了，我候着阁下的信。熙洽起身告辞。

熙洽由日本回来后，对于一切日本人的态度都非常冷淡，不象以前对于日本人要人那样尽力拉拢。对于伪满的一切事情，亦表示消极，特别与吉林省的特务机关长中野英光中佐的感情非常不好。中野英光对我说过两次熙洽瞧不起他。待到1934年12月，满洲国政府改组，熙洽被调任为宫内府大臣。兼任的吉林省长亦被免职，由李铭书任吉林省长。从此以后，熙洽所谓实权一点皆无。到1937年后，溥仪竟在伪皇宫内建筑神庙，迎接日本天照大神为他祖先，对日本昭和称儿皇帝。这时伪满洲国上自溥仪起下至宫内大臣熙洽以及陈宝琛、胡嗣瑗等元老重臣，对大清国的复辟梦，才都被这些事实惊醒，而死心塌地地作日本的傀儡。

“满洲国”和关东军的关系

古海忠之

编者按：作者在文中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也涉及到关东军操纵伪满政权、殖民统治东北的一些事实，故摘选以供参考。

本庄·溥仪秘密协定

满洲国成立后，曾任关东州厅高级官吏的阪谷希一就任财政部总务司长，处理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满洲国根据阪谷的建议招聘了我等一行大藏省官吏。当我们到任后，星野直树接替了财政部总务司长职务，阪谷希一调任总务厅次长。我个人由于上述原因，从财政部文书科长改任总务厅主计处总务科长，作为阪谷希一调任的部下，曾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身为满洲国官吏的我，迫切需要了解的就是关于满洲国的国情，尤其是满洲国同关东军的关系问题。我在大藏省时，便听到传闻说，满洲国完全被关东军所控制，是根据关东军的命令而运行的。所以，当我们决定来满洲时，连大藏省也曾向陆军省次官提出要求：“希望将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事情完全交给我们，请关东军不要横加干涉。”

阪谷次长毕竟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关东军同满洲国的关系，那就是关于本庄·溥仪秘密协定，以及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问题。

关东军常驻满洲国，而且拥有根据上述协定确定的权限和内部指导权。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失败后，战胜国和部分日本人认为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产物。而上述关东军的存在便成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和条件。以下仅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满洲事变后，关东军基本上控制了南满，同时，又以武力或怀柔政策使各地方军阀臣服关东军，最后终于攻克张学良占据的锦州，从而称霸全满。

今后将采取何种形态统治满洲，从国内外和当地的关系而

言，确是一个严重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关东军在征求并分析当地文武要人、日本方面各机关团体等各部门的意见的同时，找出各方面意见的共同点，最后决定成立以五族协和（后改为民族协和）和王道主义（民本主义）为宗旨的道义国家满洲国，并付诸行动。通过关东军巨大的努力和支援，满洲国终于于昭和7年3月1日诞生了。

关东军在建设满洲国时，需要突出考虑的重大问题就是国防。位于中苏边境的满洲国，为了确保其独立，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只能由日本军（关东军）担任国防。以于冲汉为首的当地领导者也都一致提出这一要求。所以，关东军还必须同时完成日本国军的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新国家不应该是象张学良政权那样的践踏日本权益采取反日行动的政权，尊重日本权益，永远同日本友好相处，采取同一方针，乃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关东军（日本），认为不能不在这方面获得某种保障，其具体体现就是本庄·溥仪协定的缔结和对满洲国内部指导权的规定。

满洲建国后不久的3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溥仪和国务总理郑孝胥之间缔结了下述协定，被称之为本庄·溥仪秘密协定。其内容有：

（一） 满洲国将国防及治安维持任务委托给日本，其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

（二） 日本军将国防所需已有铁路、港口、航线、空运的管理和铁路的铺设，委托给日本或日本指定之机关。

（三） 满洲国对日本军所需之各种设施，积极提供援助。

（四） 在满洲国参议府参议（3名）和各地方机关中任用日本人，其选任委托关东军司令官推荐。

根据上述协定，决定日本国军（关东军）驻屯满洲国。关

于这一问题，于同年9月15日，通过随着日本决定承认满洲国而缔结的日满议定书，再次予以确认。日满议定书在其序言中指出其目的在于“永远加强日满两国间的睦邻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确保东洋之和平”。其内容有简单的两条：

（一）满洲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历来根据日中间签署的条约、协定和其他缔约以及公私合同等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二）日满两国约定，当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和治安受到威胁时，共同担任国家的防卫任务。为此，在满洲国驻屯必要的日本军。

在本庄·溥仪协定的第一项中规定的“满洲国将国防及治安维持任务委托给日本”，在议定书中改为“共同防卫”。

满洲国既然是独立国家，并拥有国军，则进行共同防卫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关东军却认为不能因此而受到束缚。于是，在签定日满议定书的同时，又由日满两国的军事协定委员缔结并签署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

其内容有：

（一）日满两国……当受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国军在日本国军司令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

（二）日本国军在满洲国领域内，享有军事行动上的必要自由和保障，以及与之相关的便利。

此后，在满洲国军政部内设顾问部，派来直属关东军司令部的将官及大批军官，用以统制满洲国军。

关东军对于本庄·溥仪协定也作了周密的考虑。在日满议定书签署当天，郑国务总理会见了武藤全权大使，并提出照会。照会指出：满洲国对于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及国务总理间已经交换并缔结的文件及协定，均予以承认，并使之继续生

效。同一天武藤全权大使送来回信。结果，本庄·溥仪协定作为日满议定书的附件，获得与正式条约同等的效力。

由此可见，在缔结日满议定书的同时，采取上述措施，完全确保本庄·溥仪秘密协定的效力。这样，关东军不仅负责满洲国的国防与治安，而且，作为日本国军，还获得了可以自由地任意行动的权力。

根据该协定第一项规定，日本军为满洲国国防及治安维持所需经费由满洲国负担。关于这一问题，在我制定满洲国预算时，就满洲国应负担的关东军经费的核算方法及支付等，有必要签署协定，曾同关东军第三课多次交涉，作出如下决定：即以从各年度一般会计总预算额中扣除国债等债务总额后所余金额的1%，作为上述关东军“所需经费”，并将其全部缴纳给日本政府，支付日期定为该年度决算终了时。

然而，于昭和8年（1933年）在日本国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日本政府决定不接受此项经费，所谓的所需经费完全没有支付的必要，关东军经费全部由日本政府支付。这项关东军经费，对于痛感日元资金不足的满洲国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

其次，根据第二项规定，铁路、港口及航路的经营及铁路的铺设，全部委托给南满洲铁道会社；航空事业由满洲航空会社；电信及电话事业交日满条约法人的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管理和经营。同时，对于上述会社的监督权，同军事上必要的命令一样，均属于关东军司令官。因此，满洲国对上述会社没有监督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只能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请求和委托。

第三项规定的宗旨，通过与日满议定书同时缔结的日满守势军事协定进一步明确，规定“日本国军享受军事行动上必要的自由和保障，以及与之相关的便利”。

这一规定，对于日本国军的行动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日本

陆军的假想敌国是苏联，因此关东军的行动就是针对苏联，关东军的部队基本上是沿着满苏国境驻扎的。要求满洲国协助为这些关东军解决设施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建筑工程用地和其他土地。而提供人口密度小的国境一带的土地，对于满洲国来说，并算不了是什么负担。

第四项是关于关东军司令官获得对日本人官吏的任免权问题，通过这一规定关东军策划并实施了对日本人官吏的统制。

关东军司令官的内部指导权

关东军司令官拥有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控制这一内部指导权，是关东军设计的一种保障制度，目的在于使在关东军巨大支援下诞生的新生满洲国，尊重有关满蒙问题的已有条约和日本的各种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将来采取排日甚至反日的态度和行动。

内部指导在实质上同根据本庄·溥仪协定第四项规定的由关东军掌握日籍官吏任免权，以及主持满洲国国家机构中的政治和行政的国务院组织具有重大的关系。关东军在听取当地及日本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决定成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独立国家作为统治满洲的形态，并立即在关东军司令部内新设统治部，任命驹井德三顾问为部长，部员全部是文官，负责关东军临时的行动善后处理。同时，研究制定有关行政、财政、产业、交通等各个领域的新国家的组织及重要法令，以促进建国准备工作的开展。因而，满洲国的国家机构，甚至连具有独特性的国务院组织也都是秉承关东军的意旨，由统治部研究确定的。

国务院的首席人物是国务总理，各部（日本的各省）设总长（后改为大臣）。对满洲国的元首，即执政负有辅佐责任的所

谓国务大臣只限于国务总理一人，各部总长是主持各分管事务的行政长官（事务大臣）。国务总理辅佐执政指挥监督各部总长，负责掌管国家行政机要事务，可以根据其职权发布院令。同时，国务总理是各部总长的上级长官，拥有在必要时可以停止或撤消各部总长的命令或处分的权限。此外，国务院还设总务厅，用以裁决并处理国务院内有关机密、人事、财务及庶务等事项。总务厅具有国务院总理幕僚的性质，国务总理在总务长官的辅佐下，通过总务厅处理各部由总理统辖的事务，这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成立的机构，采用了所谓的总务厅中心主义。

后来，总务厅的行政统辖事务逐渐增加，除机密、人事、财务、庶务之外，还遍及法制、宣传、计划、地方和统计等。各部在实施其主管行政时，如果不到总务厅就必要事项进行交涉，获得批准，则将一事无成。因此，国务总理——实际上是总务长官，其权限庞大无边，俨然是满洲国的最高领导人。

不仅作为总务厅最高负责人的总务长官，规定必须由日籍官吏担任，包括总务厅次长以及各处处长（局长）的位置也全部被日籍官吏所占据，日满人官吏的比例为7：3，总务厅实质上是一个以日籍官吏为核心组成的机构。

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为了行使对满洲国的幕后指导权，在司令部内新设第三课（后为第四课）作为主管课，满洲国方面与之相对口的机构只有总务厅。

根据满洲国组织法，有关法律、法令、命令、条约、预决算、高级官吏的任免以及其他重大国务，必须全部经国务院会议（相当于日本的阁议）审议批准。国务院会议由国务总理主持，以各部总长、总务长官等组成，除总务长官外，全部都是满籍领导人。

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的议案，经执政的咨询机关参议府讨

论后，由执政裁可公布。

最初，关东军准备在参议中安插日本人，通过日籍参议行使日本对满洲国国政的指导。本庄·溥仪协定的第四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以其所拥有的推荐权任用3名日本人官吏为参议。

然而，仅以数名参议的力量是无法左右国政的，何况日本要对国务院行使其指导权，就会议的组成和满洲国的性质而言，更是不可能的。关东军经过深思熟虑，作为内部指导满洲国的手段，决定成立一个可望获得充分效果的行政组织。其根据就是国务总理的特殊地位及其绝大的权限，这一主持国务总理亲自处理的重要行政事务的机关，就是由日籍官吏完全控制实权的总务厅。

如上所述，政府各部为了执行其主管的行政业务，必须经总务厅就必要事项进行审议和决定。因此，只要同总务厅保持内部联系，关东军就可以控制满洲国的国策和行政的全貌，充分发挥内部指导的效果。

关于上述关东军司令官的满洲国内部指导权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满洲国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协定。有人认为可以从本庄·溥仪协定中寻求根据，但是在该协定中也没有此类规定。关东军可能认为自己始终处于内部指导的地位，对方是以日籍官吏为中心的总务厅，因此，没有必要再特别求得满洲国的承认，而自行作出这一决定的。

驹井德三曾就任满洲国第一任总务长官，他作为关东军的统治部长建立了满洲国的政府组织，特别是国务总理和总务长官的特殊形态，而且清楚地了解关东军内部指导的作法。关于关东军和总务厅的关系，无疑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乃至承诺，内部指导得以顺利实施。

上述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内部指导权，是为了制止在关东军

的巨大援助下成立，并同日本拥有不可分关系的满洲国，向不利于日本、或排日反日的方向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从其后实践的过程而言，也不能认为这一制度是关东军为了谋求日本的利益，企图积极干预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而制定的。

建国初期，每当有需要关东军同满洲国之间进行联系的事情时，总务长官或次长去司令部，或者关东军的板垣参谋等来总务厅，同长官或次长进行磋商。然而，昭和7年、昭和8年，随着陆军的大调动，以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领导人全部调离，武藤信义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任参谋长，在司令部内又恢复了第三课，由原田熊吉大佐任课长，在其领导下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陆军参谋，如沼田多稼藏、盐泽清宣、岩畔豪雄等。此后，凡属满洲国的政治、行政方面的重大事项，以及日籍官吏的采用等，均由总务厅同第三课联系，求得关东军的同意。

然而，最初的作法很简单，关东军听取总务厅的说明后，表示同意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满洲国各项制度的日趋健全，它逐渐变成十分繁琐的事务性的手续。后来，逐件事情都需由总务厅向第三课提出报告，经第三课审查后再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名义发来表示同意的文件，指出：“对某某事项表示同意，特此奉命通知”否则，总务厅就不能将重要事项提交国务院会议进行处理。

通过上述作法，关东军可以掌握满洲国的重要国务及行政。而当关东军方面对满洲国有要求事项时，也要采取首先向总务厅提出，经总务厅研究后实施，但仍需向第三课提出报告，请求同意。总之，可以说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指导始终是在内部进行。

如上所述，根据满洲国组织法在决定有关国务、行政的重

大事项时，须按下列程序进行。首先将议案提交国务院会议，经审议通过后，再由执政（皇帝）的咨询机关参议府批准，最后经执政裁可决定，予以公布。因此，经总务厅整理、关东军同意的议案，并不一定按原案决定，实际上，也有由国务院会议作出部分修订或保留的议案；也有参议府提出某些条件或作出附带决议的议案。我认为，这就是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内部指导权的实质，也是其微妙之所在。

直接参与关东军对满洲国内部指导的有关人员，只限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第三（后改为第四）课课长及第三课所属参谋，与其他部、课员全然无关。同时，关东军首脑绝对不同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大臣）、参议等满洲人首脑面谈交涉，而是交由总务长官、次长、各处处长进行。此外，驻满洲国的关东军部队虽然大批增加，但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严格的禁令，严禁各部队对地方机关采取内部指导行动。因此，基本上未曾发生过任何纠纷，收到了军民融合的效果，是值得赞赏的。

关东军与日籍官吏

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本庄·溥仪协定获得了在满洲国任用日本人官吏时的推荐权，关东军将这一推荐权解释为任免权。关东军司令部第三课（后为第四课）具体负责任用日本人官吏，直至满洲国中期，包括委任官（判任官）的采用都需经关东军同意，总务厅人事处在同关东军交涉过程中曾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满洲建国当时，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深入地考虑了满洲国的国情，确定了除任用少数日本人为高级官吏外，日常政务以满籍官吏为主体执行的根本方针。石原莞尔参谋也积极支持这一方针，他曾指示，在建国当时满洲国中央政府600名官吏编制

中，日籍官吏不超过20%，即120人。同时，作为防止日籍官吏编制扩大和作风专横的措施，还确定了满洲国政府各机关、部局的日满官吏比例，并规定每个职位的日满定位，作为满洲国人事的重要原则，关东军拥有这一制度的决定权。

在执行上述有关人事的重大方针和两项制度方面，总务厅理所当然地是一个例外。总务厅是作为关东军实行内部指导的对口部局，根据由日籍官吏运营的宗旨而设立的满洲国的一个独特机关，就其性质而言，总务厅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此，在定位方面，以最高的总务长官为首，次长、各处处长（相当于日本的局长）以及科长等，全部由日籍官吏来担任，日满比例为日籍70%，满籍占30%。

各部（即相当日本政府的省）的日满官吏比例也是十分严格的，很难找到适当的满洲官吏的各部，如财政部和实业部，日满官吏各占50%。其次是司法部，日籍官吏占40%，满籍官吏为60%（满洲国进入建设时期后，上述各部的日满官吏比例均调整为6：4）。其他民政部、外交部、文教部、军政部的日籍官吏占30%，满籍官吏占70%。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也均以此为准进行配备。

地方机关、省公署、税务监督署等日籍官吏占20%，满籍官吏占80%。至于县公署、税捐局等基层地方机关，绝大部分是满籍官吏，日籍官吏只有极少的几个人。

就日满定位而言，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大臣）自不待言，包括监察院长、立法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参议、省长等特任官（日本的亲任官）基本上都由满洲人担任，日籍的特任官只有总务长官和3名参议。简任官（日本的委任官），也同样如此，最初，除总务厅外，只有少数日籍官吏。各部的各司司长（日本的局长）中，除总务司长规定由日籍官吏担任外，其他司长

初期也基本上是满籍官吏。

关东军对于行政各部也企图如同对总务厅一样贯彻关东军的意图，为此，各部的总务司主管并具体负责机要、人事、会计、文书等工作，相当于各部内的总务厅。各部在执行其主管行政工作时，必须同总务司磋商，征得其同意，方能制定方案。这样，只要总务司控制在日籍官吏手中，就可以对该部行政工作的动向和实际情况了如指掌，进而予以指导。为此，总务司的司长和科长应由日籍官吏担任，其他各司司长及科长尽可能任用满籍官吏，日籍官吏仅限于极少数人。这就是关东军的设想。

基于上述设想，荐任官（日本的委任官）同样除各部总务司的科长外，大部分科长也由满籍官吏担任。

此外，地方各省的省长规定由满籍官吏担任，其下属的总务厅厅长必须任用日籍官吏，这也同样是基于上述理由。

地方行政机关也同中央一样，税务监督署署长、地方专卖署署长、县长等，其正职为满籍官吏，副职则任用日籍官吏。

上述人事方面的双重体制，正是满洲国统治的根本方针。

关东军之所以确定上述人事原则，存在于总务厅等部门的潜在目的又当别论，可以看出，它是关东军为了尊重民族协和的国情，贯彻尽可能安排少量日籍官吏这一根本方针而作出的一种尝试。

然而，为了将满洲国建成现代化的理想国家，虽然政府的最高职位以双重组织为宜，但却无法坚持这一人事方面的原则。满洲国的治安基本平定，国家基础也逐步稳固，即将进入建设时期。自昭和11年（1936年）开始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中心，各部门为实现现代化而采取各种措施。遗憾的是，中国，尤其是满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体制下，拥有现代行政知识和经

验的人才奇缺，不得不采用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日籍官吏。结果，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最初制定的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也不能不加以修改。

关于满洲国的人事和行政，日籍官吏自不待言，包括满籍的主要人事安排也必须一一征得关东军的同意，当时在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方面不断地出现问题，总务厅人事处为了说服关东军第三课的人事部门曾经大伤脑筋。

以下拟就关东军对满洲国进行内部指导的实际情况略加探讨。

关于其实际情况和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关东军司令部首脑同其对方，即满洲国日籍官吏首脑（主要是总务厅）之间取得的一致意见，或双方同意的事项。

关东军首脑自本庄司令官、板垣、石原参谋时期以来，尽管根据所处时代而程度不同，但都是一贯尊重满洲国的独立，对建国原则、理想，有明确的认识，除纯国防性的问题外，经常在充分理解满洲国当面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态度。

另一方面，满洲国的日籍官吏不论其出身与经历如何，都能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建国理想而奋斗。如上所述，他们不计名利，坦率而热情，彼此之间拥有同志意识，形成了高尚的为官之道，并在这一气氛中努力工作。他们对上司也能毫无畏惧地阐述自己的意见，甚至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过后又毫无介蒂。如果有人谄媚骄傲专横的上司，他必将立即遭到鄙视乃至排挤，甚至由此产生风波。这样，为实现满洲建国精神而作出的努力成为一种媒介，使同志意识在官吏中日益发扬光大，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事隔30年，这一意识仍然记忆犹新。

日籍官吏对于掌握日籍官吏任免权，行使内部指导权的关

东军，其态度也莫不如此。没有人低声下气向关东军当面奉承讨好，经常敢于仗义直言，以期满洲国的政治、行政工作能准确无误地实施。在有些问题上，同第四课的参谋们展开激烈争论，经过反复争辩，最后满洲国的意见得以通过，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从上述过程看来，关东军行使内部指导权也可以说是就满洲国的重要政务和行政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们同满洲国日籍官吏首脑提供了审议和讨论的场所，以及判断议案正确与否的良好机会。

因此，关东军对满洲国进行内部指导的实质，就是关东军同满洲国日籍官吏首脑双方经过磋商，并取得一致意见，从而对满洲国进行扶持的一种措施。另一方面，也应该看作是满洲国不断地同日本之间协调融合，借以防止出现反日、排日行动的一种手段。应该指出，认为关东军利用这一权限为谋求日本国家的利益而向满洲国政府施加压力；是日本侵略满洲国的工具，这一认识是违背客观事实，是根本错误的。

以上仅就关东军对满洲国内部指导的实质略抒己见。与之相关联，也曾发生过由于没有关东军的内部指导，对满洲国的行政工作独断专行，从而引起严重问题，最后陷入困境的事件，那就是日本向满洲移民问题，略述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武装移民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的移民论者立即掀起了向满洲输送移民的运动，其中加藤完治、那须皓、桥本传右卫门等主张立即向满洲移民的人们，开始直接同关东军进行交涉，得到东宫铁男等关东军内赞成移民者的支持，终于获得关东军的同意。

昭和8年（1933年）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北满的佳木斯

近郊，第一、第二以至第三批武装移民团所使用的土地，都是关东军通过劝业公司亲手收买的。包括大面积的已开垦土地是按低于当时价格十分之一的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的。结果，导致3000农民拥戴土龙山村长、在当地有威望的谢文东为首领掀起暴动，这就是土龙山事件，佳木斯的第六十三联队长一行在镇压暴动中全部战死。

关于此次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满洲一事，未同满洲国政府进行任何联系和交涉。而且，当关东军开始征购大面积移民用地，当地农民出现动摇时，有关各县的参事官（日本人官吏，县长的助手）一致反对，认为是背离民族协和精神的行为，请求关东军审慎处理，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未被关东军所采纳，结果明石胜利等七名参事官感到对其后果无法负责，遂提出辞呈，离职而去。明石等参事官几乎都是大同学院的毕业生，由此也可见满洲国官吏风格之一斑。

关于导致土龙山事件爆发的农地收购问题，最后关东军总算认识到解决事态的必要性。关东军从土地收买工作中退出，交满洲国处理善后。满洲国确定适当的人选，动员主管此项工作的吉林省官吏，满怀诚意地同当地农民协商，同意提高土地价格，最后博得当地农民的谅解和感谢，一切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由于此次事件的发生，开拓（移民）政策原则上由满洲国执行，日本人和当地居民的开拓事业基本上得以顺利开展。

其后，根据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强烈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以未利用的土地为主，确定除非万不得已，不收购熟地的方针。

关东军在日本人武装移民团迁入满洲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正是超出其使命的越权行为；是不认识、不尊重满洲国独立和建国理想而导致的结果。

曾经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并竭尽全力给予极大支援的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三宅参谋长、板垣、石原、竹下、片仓参谋等，他们尊重满洲国的立场和国情，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对于满洲国从未超出内部指导的范围。问题发生时上述人员已经换代，那已是武藤司令官、小矶参谋长和新参谋的时代了。或许在两代之间对于满洲国的认识存在差距也未可知。

然而，除国防及治安问题外，在满洲国的内政问题上，关东军直接插手的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换言之，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虽然一切都受关东军的内部指导，但都是由满洲国政府制定方案，作出决定的。

对满洲国拥有内部指导权的关东军司令官，逐渐发展为兼有管理驻满日本各机关的权限，不久，就占有了日本在满洲的唯一代表的地位。

建国当时，日本的驻满机关代表是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总领事和关东长官，即所谓的四头政治。顾名思义，它在对满政策上必然缺乏统一性。根据昭和7年7月的阁议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和关东长官，采取所谓三位一体制。然而，由于日本中央机关的指挥系统和基层机构的不一致，仍然不断发生纠纷。为此，于昭和9年，在驻满全权大使之下，作为接受外务大臣指挥命令的事务机构，设大使馆参事官，同时废除了关东长官。为了赋与关东军司令官以行政监督权，又在其领导下，设接受内阁总理大臣命令与监督的办事机构，即行政事务总长（关东局总长）。这样，关东军司令官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驻满日本机构的一元化实权者。

藉此机会，日本在内阁中新设对满事务局、陆军大臣兼任总裁，主持有关保持日本对满洲行政事务统一的业务。

如上所述，关东军不仅对满洲国拥有内部指导权，而且还控制了日本在满洲的行政权，从而获得了日本在满洲唯一代表的地位和权限。

满洲国政府同尊重建国理想和独立性，而又精通满洲情况的关东军，就日满两国间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再与关东军共同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这样，在争取日本的援助方面，满洲国可以得到许多方便。

实际上，关东军乃至日本政府，一向尊重满洲国的独立，为了满洲国，不惜提供力所能及的积极援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收买构成满洲国独立最大障碍的北满铁路和撤消日本的治外法权，以及返还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

伪总务厅——伪满政权的中枢

谷香圃

长春市解放（伪兴仁）大路矗立着煊赫巍峨，堂构辉宏，具有现代装设的巨厦，这座日本殖民者妄图百世，侵略东北14年的中心建筑物，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所在。归复人民手里以后，用作民之福星，保健育材，医科最高学府，白求恩医科大学（原军医大学）校部教研楼。

伪总务厅乃伪国务院军事、经济、兴农、交通、民生、司法、外务等各伪部局的总枢；为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前星野直树）、次长岸信介、谷次亨等日寇巨奸所在。伪满初期，驹井德三、远藤柳作先后派来任取厅长，1939年（应为1937年），星野直树由伪经济部总务司长升转总务厅称

“长官”，直到武部任内崩溃。改称总务长官的用意在于名位，可以并肩同伪国务总理大臣出席“国务院会议”。这个厅的机构组织，形式庞大，表面上“法定”该厅承总理大臣之命，办理政府内机密、法制、人事、主计、需用、情报等事务，实际完全由伪总务长官掌握，事无巨细都须与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联系，所谓“军部、政府”二位一体。伪总务厅置总理大臣官房和人事、企划、弘报、法制、地方、统计、主计等处，各处设处长，除统计处处长为“满系”人员外，其余各处长都由“日系”人员担当。

官房（办公厅），伪总理大臣直属秘书官室，有秘书官两名，日满各1名，“满系”王子衡，精通日语，光复后迁居北京；日系松木侠精通华语，以后松本益雄与王子衡共始终，一直是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入值时间的监视人。官房设文书、庶务两科，文书科在官房是首席科科长荒川秀次，直接为总务长官办事，有“官房长”意味；文书科掌握总务全厅机密文件和各伪部局来往文件总收发，工作非常繁杂；主编“满洲国政府公报”，日出一册，主编者乃伪事务官经家宝，由于是“日满文”合编，尚有徐姓嘱托（北京人）和日人小谷文吉协助，这是文书科经常主要事务。所有机密文件完全用日文，由日系事务官三谷文雄、清水××掌握办理，任何人不能近前。伪参议院议决“上奏文件”，由科内派人专职楷书缮清后，装入锦匣，由伪事务官范钦议（精于楷书现在宽城区某卫生所服务）送往宫内府，非常郑重其事。全厅各处日文文件全需要打字和原纸油印，日满系打字员40余人，地下室一角落为打字室，如同工厂，由日人领导，内外人不能随意出入。另外设资料室一所，内储多为汉文线装、辞类字典以及日文大玄海等，异常丰富，有许多工具书。笔者于1939年秋临时由伪产业部调到该科整编资料，1942年秋由

伪开拓总局调入该科任伪事务官，办理一般汉文文书兼管资料室。

人事处：处长源田松三，参事官王贤伟（金州人，原奉天省长王永江子）。该处在总务厅有权威与神秘之称，设有人事、福祉、考查三科，科长全为日人，凡荐任（即理事官）以上至简任伪官吏，统由人事科掌握它的迁转任免，福祉专司荐任职科长级以上，每年年中6月，年终12月“赏与”（奖金）并筹谋伪官们的衣、食、住、用。日方专设有官吏住宅，依级分配，国人方面则设备简陋；对日方设有生活必需品会社，国人方面则为官吏消费组合。总之，一切待遇，都有差别。

弘报处：对内对外广泛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情报，也宣传其中可以宣传的情报；每月编刊“宣抚月报”一厚册，直接发行。日伪新京放送局（地址在今吉林省广播电台）、伪满洲国通信社（很大的新闻采编发行机构，简称“国通”）、满洲映画协会（地址在今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满洲新闻报社（日文）、大同报社（后改康德新闻），此外尚有丰乐剧场（今春城电影院）、帝都电影院（今人民电影院）、金城电影院（今儿童电影院）、银座映画馆（今长江路电影院），尚有其他剧场、影院等等，皆归其控制。处长武藤富男，设参事官一员，由伪民生部理事官王秉铎兼充，便于由文化教育方面佐助。另外设置了情报、宣传两科科长，皆由日系担任，未记其名。

地方处：掌握全满各省、市、县行政情况，县长、县参事官的升迁调转；地方财务收支预决算；负责日、满、鲜等青壮年的教育培养，如办各种训练所；每月编发汉文《地方行政月刊》一期，由各市、县供稿。处长菅太郎，设满系专任参事官一名李宝华，李留日出身，以后转升热河省伪民生厅长。又满

系理事官1名王富海，担任地方行政科长，以后升转长春县伪县长，直到光复国民党接收。地方人事、地方财务、地方教养各科长统由日员担任，另外尚有日系参事官10余名，皆各伪部有关理事官兼充。

主计处：分设3个科，一般会计科，特别会计科，司计科，处长饭泽重一，以后为古海忠之，置满系理事官1名，徐渐九担任一般会计科长（徐留日出身，原名徐鸿渐改名渐九，后转任铁岭市长），余两科长由日员理事官专任。该处不设参事官。

统计处：伪总务厅所设各处，只有此处处长为满系人员，由徐家桓充任（徐吉林人，留日出身，曾充吉林市筹务处处长），不设参事官，设理事官两名，分掌统计、统制两科，科长皆由日员担任，忘记其名，其统计事项，据不完全记忆，大致为下列各项：全满总务、行政、财政、军事、地理、外交、司法、警察、卫生、教育及宗教、社会事业、土木、农林牧畜、水产、工矿、商业、物价、通货（纸币）金融、交通通信（邮电）、贸易、度量衡等。统计处专设资料室，藏有充实丰富的古今中外图书。

企划处：处长神田某，不分科，设日系参事官10余名。

法制处：处长青木佐治彦，日本法学专家，该处亦不分科，设日系参事官10名，多为法界中的日本职员，伪满垮台前，设满系参事官1名，林喜泰充担。

关于伪满洲国初期的人事行政

王贤沛

我当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时期，主要是参与人事处的事

务。后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时期，人事处又在我的职务分担中，所以，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的人事行政上，和在人事的安排处理上，略知一二。

一、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初期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为了避免国际舆论，想把东北装饰成为东北人民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模样。因此，向外发表声明：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对于这样一个所谓独立国家的伪满洲国，要谁来执掌呢？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意见，既然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成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就要由满洲人来掌握。至于伪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可以利用在满洲的旧官吏和亲日的满洲人当官吏。至于日本人，可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到伪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当参谋，人数也不要太多。这样，在国际上，可以说明日本是站在帮助指导的立场上。不过，在伪国家的财政经济方面，可以多用日本人，也可以用一种会社的形式，全部由日本人经营。

当时，日本关东军提出了另一种意见，要是根据满洲当地的情况，最好是日本人参加到政府的组织机关里，同满人一样的当官吏，日本人变成伪满洲国籍的日本人。仍就是独立国家的形式。并且认为，如果日本人以顾问的身份参加，那是一个闲职，没有实权，这个国家的施政，就将不可能在日本掌握下，实行日本所要实行的政策，日本的大陆政策，也难于顺利地实现，日本关东军的流血牺牲，就将毫无代价地付出。所以说日本人当这个新国家的官吏，是十分需要的和必须的。

同时，日本关东军还说明了它极力主张日本人当这新国家

的官吏的理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它用中国海关的事实情况，向日本政府作证明。它说：中国海关在世界上很有信用，但中国政府内部，贪污腐化，十分混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在中国海关里，有英国人官吏参加，把握实权，打破了中国社会官场中种种恶习的原因。如果想要搞好这个新国家，必须象中国海关那样，日本人参加当官吏，也要象中国海关那样，由日本人官吏把握人事、会计、财政经济等实权，作为领导的榜样，新国家才能兴隆起来，才能达到日本所期望的目的。

最后，日本政府采纳了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决定在所成立的伪满洲国内，在人事安排上，采用日满两系官吏并用的方针。日本政府还重复地说，日本人官吏不要太多。

日本关东军根据决定，计划出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决定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方针。在伪政府的中央机关里，多采用日系官吏，在伪政府的地方机关里，少采用日系官吏。同时，把遴选伪政府的人事问题，交给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少佐、日本关东军经济顾问驹井德三等，负专责办理。

这不用说，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就屈膝投降的于冲汉、袁金铠、臧式毅、丁鉴修、赵欣伯、冯涵清、熙洽、张燕卿、谢介石、金璧东、张景惠、马占山、张海鹏、溥仪、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宝熙等人，都在日本帝国主义预定利用之中。其余的民族败类，有的通过以上各汉奸之手，有的通过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的推荐、保举，积极而努力地争夺一个汉奸地位。

如阮振铎通过伪奉天省公署顾问金井章次；王庆璋、鲍观澄通过奉天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金荣桂、李绍庚、

吕荣寰通过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小松原××；张海鹏通过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洮南满铁公所长河野××；阎传绂通过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河本××等等。

还有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为日军作走狗，诱降马占山的韩云阶、赵仲仁，拉拢蒙古王公投降日寇的邹麟，率日本军队进哈尔滨市的于琛澂……等等，都登上了傀儡舞台。

有些直接高攀不上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败类，则投奔巴结这些大汉奸的门路，借梯爬上去。当时出现了各个派别的活动，大汉奸们都想抓一部分人，作为自己的实力。

驹井德三，他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多年。“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经济顾问。所以，在他组织下的伪政府日系官吏，除了从日本国内派出一部分日本政府现任官吏，当了伪政府官吏外，其余的日系伪官吏，多数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员，就近当了伪政府官吏。因此，以南满铁老社员资格的驹井德三为首，结成了满铁派。这一派，直到伪满垮台前，在伪政府里，还有相当的势力，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部门，更为显著。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利用旧东北时代的官吏，当伪政府的官吏。其目的有二，因为伪政权初成立，除了伪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是新组织成的，其余的各伪机关，日本殖民者仍然暂时利用旧时的组织机构，凡是旧东北时代的官吏职员，只要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继续留用，先把伪政府产生出来，解决当时的混乱时局。所以，各伪政府机关的首脑人事，一定要用满人充当，在外表上看，这个伪国家，是东北人自己组织的国家，日本人作幕后操纵者，这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和驹井德三等人，所采取的人事方策。

二、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

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的组织机关里，采用了以汉奸作招牌的人事安排。在伪政权的中央机关里，多采用日本人官吏，在伪政权的地方机关里，少采用日本人官吏。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控制伪政权。伪中央政府，以伪国务院为最高决策统辖机关，其下有各伪部、局的设置，再其下有各伪省、市、县、旗的地方统辖机关。一切施政，由伪中央发号施令，各伪部、局和各伪省、市、县、旗，执行贯彻。这样，日寇还不放心，恐怕控制不了，又用集权制，以控制各伪机关的事务处理，以限制满系官吏的滥用职权，或是不服从伪中央的命令指挥。

从事实上看，在伪满最高决策统辖机关，伪国务院里，设有总务厅，为最高决策统辖机关的事务机构。伪国务总理是满人（中国人），伪总务厅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伪国务总理，处理一切事务。其下有七个伪部，各伪部总长是满人，在各伪部内设有几个司，无论在哪一个伪部内，都有总务司，并规定总务司为首席司，司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各伪部总长，处理一切事务。再其下有四个伪省，伪省长是满人，在各个伪省公署内，都有总务厅，并规定总务厅为首席厅，厅长是日人，他有权代理各伪省长，处理一切事务。各伪市市长是满人，在各伪市公署内设有几个处，无论在哪一个伪市里，都有总务处的设置，处长是日人，规定为首席处，总务处长有权代理伪市长，处理一切事务。各伪县县长是满人，在各个伪县公署里，有参事官的设置，参事官是日人，他有权代理伪县长，处理一切事务。

伪满洲国在初期的人事行政上，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各个伪机关里，都布署了日系官吏，并规定了总务首席，作为控制满系和事务执行的代理者。但在各个伪地方机关里，日系官吏

参加的少。如在伪县公署里，只安排了三四名日本参事官。大批的日系官吏，都集中在伪中央机关里，如伪国务院总务厅七个处，处长全是日系。这些人事上的安排，就是所谓的中央集权政治和日本殖民统治集权的安排。

当时日本侵略者们自豪地说：新国家，由日、满两系人来当官吏，这是世界上的榜样，我们是在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基础上，进行新国家的建设，我们要终生献身在这个新国家里。如第三代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冈隆一郎，曾在伪首都新京，买一块墓地，他决心要埋骨在满洲，并预定以“日满亲善的东洋和平之基础”，作为他墓前的碑文。

关于伪满各机关的首脑人事，在伪满初期决定时，在汉奸们中间，互相有所争夺。这个人想干这个，那个人想干那个，都认为自己帮凶有功，都想一把抓个大的。但日寇的政策，是以安定地方秩序为首要任务，无论你们如何争夺吵嚷，我有一定之规。日本关东军不点头认可，那是白闹一回。如郑孝胥随溥仪到东北来，所谓的保驾功臣，又代替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出卖民族利益的秘约，换来了溥仪当执政，郑孝胥自然要当伪国务总理。可是自不量力的熙洽、罗振玉等人，都想当伪国务总理。如张燕卿，以一个吉林省公署的秘书，给了一个实业部总长，还不甘心，想要当民政部总长、财政部总长等，……诸如此类的汉奸在日本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可怜相，令人痛恨。但日本关东军决定从自己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利用旧东北统治者，以缓和惊慌不安的东北人心。所以凡是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东北统治者，尽量安置他们官任原职，并兼任伪国家的各部总长。如熙洽，授予伪财政部总长兼任伪吉林省长；臧式毅，伪民政部总长兼任伪奉天省长；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兼任哈尔滨特区长官；马占山，伪军政部总长兼任

黑龙江省长等等，余下的挑选早就和日本侵略者有亲善行动的，如丁鉴修、于冲汉、赵欣伯、冯涵清、谢介石等等，暂先利用。

这就是凡是东北政权时代的官吏，只要不反抗日本的侵略，全部留用的原因。因此，在各伪机关里，还是同旧东北时那样，拉拢亲戚朋友关系，仍然存在着小集团和派别的活动。如臧式毅当了伪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长，就拉拢旧部下和亲朋关系，如有葆康、赵鹏第、黄富俊……。熙洽当了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便笼络、重用金名世、洪维国、荣孟枚、齐知政……。张景惠当了伪参议府议长兼哈尔滨特别区长官，重用的是金荣桂、宋文郁、于镜涛……。马占山当了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也是这样，手下有王静修等……。郑孝胥当了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也是这样，被封官的有许汝霖、胡嗣瑗、宝熙、沈瑞麟、郑禹、郑垂……。

在日本主子面前，他们互相间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如郑孝胥、熙洽，诚心诚意地想搞清朝复辟活动，尽可能地想把爱新觉罗氏的后裔、清朝老朽人物，纳入伪满洲国政府组织中。但日本主子没有听他们这一套，所以，在伪满洲国首次举行的伪国务会议时，日本人的伪总务厅长，当着各伪总长的面，郑重地强调了“满洲国”就是“满洲国”，这是一个独立国家，要大家忠诚于“满洲国”，本着“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为建设新的王道乐土而尽力……。说者有意，听者无心，马马虎虎就算过去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当时很注意这些汉奸的行动，把他们分成郑孝胥派、臧式毅派、熙洽派、张景惠派、亲日派等等派别。并决心要逐渐消灭这些派别。但在伪满洲国初成立时期，虽然日本侵略者尽力掌握着伪满洲国的人事行政大权，因为旧的习惯势力，相沿下来，还不能马上清除掉。同时日寇也考虑到，它

所谓的亲日派（无派别），还没有力量完全掌握伪满洲国政府的重要职位。在这个过渡时期，只好监视利用，慢慢地考察甄别。

如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当了他的伪奉天省长，他用曹承宗当他的秘书长，通过曹承宗的手，出卖伪县长缺，好县份的县长缺，卖几百元至千元，不好县份的县长缺，卖几百元。至少也得化二三百元，买一个县长干干，这是当时的一个不公开的公开。卖县长缺所赚的钱，归臧、曹二人分肥，日本主子虽然也知道，但在伪国家成立时，还是利用他，作为安定东北人心的招牌。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伪满洲国政府的人事行政上，进行了如上的安排，如上所述，是为了利用汉奸，以缓和东北人的抗日心情。也想通过集权的安排，来控制一切。但实行的结果，还不理想，还没有达到所预想的那样完整无缺，日本殖民统治者还不能完全控制着伪满洲国的施政。

例如，伪政府规定伪国务院日本总务厅长，有权代理伪国务总理，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利。但在职位上，特别是对外关系上，无论如何，低于伪国务总理，限于官阶，不能同伪国务总理相平衡。各伪部的日本人的总务司长，各伪省的日本人的总务厅长，各伪市的日本人总务处长，各伪县的日本参事官，都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行这样的安排以前，没有预想到，今天感到必须及早解决，以便完全控制这个伪满洲国政权。

在伪满洲国成立当时，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于这个伪国的人事问题，曾作了充分的考虑和研究。应该利用什么样的“人才”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议论。驹井德三的意见是：“在这样一个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新国家里，应该利用什么样的人？一句话，就是利用亲日派和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满洲人，最

为合适。但是这样的人才，眼下说，很感不足，那就只好放松一点要求，用利禄来拢络他们，这是暂时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今后的长久之计，我们必须尽快地训练出我们所需要的人才。那就必须有一个新国家的人才养成机关。”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意见一致了，都认为及早成立一个人才养成机关，是必要的。结论是，以伪满洲国的年号“大同”为名，成立一个“大同学院”。因为这是一个养成机关，不属于文教部门，直接归伪国务院总务厅领导，第一任大同学院院长就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兼任。大同学院成立以后，招收的学生，凡是受过日本教育、会日语的青年，不分日满系，在职不在职的伪官吏和知识青年，都可报名报考。录取后，在入院的一年“教育”期间，主要是进行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所谓建国精神的教育。一年毕业后，在职的回原职，不在职的，由人事处分派到各伪机关去，这就是日本殖民者所谓的“中坚分子”。从此，在伪满洲国的人事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同学院派”。这个派，其中有日满两系伪官吏，他们有大同学院同学的关系，互相联串起来，站在日本主子信赖的立场上，分布在伪满洲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在人事处来说，这样受过新国家基础教养的人才，只要不犯大错误，尽量地从快提升。

三、1934年行政组织机构改革的原因

虽然日寇参加伪满洲国政权，当了伪官吏，并预想以日寇集权的安排，控制一切。但由于满系官吏既有的旧势力存在，又由于满系官吏，很多人抱着独立国家的热火盆，因此在事务执行上，又由于日本官吏的揽权，而感到不满意。日本主子们深深感到满系有不满的心情，就是处处都避免发生磨擦，终非长久之计。同时，在日系伪官吏中，很多是满铁出身的人，他们

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有些一知半解的认识，对于日本政府所要实行的殖民统治，有些不以为然，所以在执行政策上不够狠，有的根本不予执行。这样，伪满中央的号令，不能顺利地推行下去。日本殖民统治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考虑到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和伪满洲国的人事安排上，还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因此，决定要实行一次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在组织机构改革的同时，对于伪满的人事，也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换。

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预定的伪满洲国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前，日本政府曾有过这样一个官面文章表示，通过日本关东军说出这样一段话：“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接着日本政府，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在日本当过多年县知事的远藤柳作，接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这就是说，第一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是日本关东军委派的，第二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是日本政府委派的。

其实，日本政府所表示的那段谈话，完全是假话，是欺骗中国人的话。实际是，因为从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在汉奸们中间，有浓厚的清朝复辟思想，有些人不认为满洲国是殖民地，相信日本侵略者所说“满洲独立国家”的假话，对于驹井德三，在首次伪国务会议上所表示“满洲国就是满洲国”的话，没有理解。特别是郑孝胥，他曾代表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订过密约，深信满洲是独立国家，是属于满洲人的国家，满洲人有自主权，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所以，他们认为日系官吏的揽权，是他们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日本伪官吏中间，派阀之争也很剧烈，如大藏省派、内务省派、商工省派、递信省派、满铁派、帝大出身、一高出身、高师出身……等等。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伪自治指导部，派到各伪县公署的政治指导官，后改名参事官，很多是日本青年联盟、雄蜂会的会员，他们对伪满洲国的看法，和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看法，有不一致地方。最终，导致了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于1934年对伪满的行政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改革”。

一九三七年伪满机构改革的特点

邢士廉

伪满洲国由1933年到1937年是它极力欺瞒世界的一个时期。为避免刺激世界人士的注意，始终持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针与态度。但到了1937年以后，它就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实行了更加露骨的侵略政策。为实现侵略计划和政策，先把伪满国政府的中央与地方的机构加以如下的改革：

将原有的军事部改为治安部，外交部改为外务局，民政部改为民生部，司法部照旧，交通部照旧，文教部取消，归属于民生部，编为教育司，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蒙政部改为兴安局。同时设了一局“内务局”，专办原有的民政部所管的一切行政事务。

这个改革的主要点，是把担当国内治安的警察与担当国防的军队编为一个命令系统“治安部”，一旦国内起了暴动时，军队马上即可出动援助警察，国防有事时警察即可出动援助军队，

这是强化国内治安与更加巩固国防的一个方针。

外交部改为外务局，是因为国防及其它的建设业已完成，对外顾虑的时代是不存在了。所以将外交部缩改为处理事务性的一局的体制。

取消文教部，只编为一司归属于民生部，这证明了侵略者不希望中国人民受更高的教育。

取消民政部，只设一内务局办理民政事务，这是不重视中国人的民政政策，而只采取处理事务的态度。

取消蒙政部，只设一兴安局办理蒙政事务，也是不重视蒙古族人民的民政政策的表现。

新设民生部，是因为各种企业需用劳工甚急，故为整备劳务行政，“新民生部的中心以劳务司为主体”而添设的。

交通部和司法部照旧，未加变更的用意，一为开发产业更需交通的发达；一为取缔思想问题的关系，两部的内容却都加强了。

财政部改为经济部，是机构改革主要中心问题之一，把以往的财政部更加以扩大，明显的包括了商工业在内。

实业部改为产业部，是机构改革的最中心问题，以便与日本政府采取一致的计划，管理日满间的各种企业（重、轻工业）与实行统制，就是为实现日本的军备而制定大开发各种企业的计划与进行监督及指挥的机关。

同时将以往各部的独裁独行的权利取消，把这些独裁独行的权利，归集于总务厅，使总务厅为伪满国家实际的最高参谋本部，与此同时把星野由财政部总务司长一跃而拔擢为总务厅的总务长官，当了实际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

地方机构改革的主要点，除了原有的10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安东、锦州、间岛、滨江、三江、黑河等省，内蒙

古地区不在内，这些是1937年5月前设立的，后新设了通化与牡丹江两省，缘因通化附近的大栗子沟一带埋藏无限的优质的铁、煤矿藏的关系，所以以通化为中心，定为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因此也定为行政的中心地域。牡丹江是临国境地带的中心地，故划定了为军事重要基地，而行政方面也随之划定为行政中心地域。

同时对中央与地方各机关内更增加了日系官吏，例如中央各部的中国人首长下边添设了次长，省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省次长，市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副市长，县长下边添设了日系的副县长，中国人司长下边设了日系的首席科长或总务科长，掌握了实际的司长权利。这种制度表明它是丝毫不顾虑世界舆论，明目张胆地掌握了各个部门的主权了。

伪满洲国日系官吏的构成

王允卿

伪满建国以后，日本人统治阶层亦不断发生变化。起初，日本人官吏中多为满铁系出身，喜财好利。继而由国内人士跑来参加，或由国内名人推荐者，当时因满洲的前途如何尚难确定，所来者，多系昭和12年犯共产嫌疑者。及松岗宣布脱退国联后，日本政府即以全力经营满洲，此际所来者，即由帝国大学毕业之帝国主义派逐渐来满，代满铁系而执政。而满铁系大为不满，然亦无可如何而已。共产嫌疑系，对于帝国主义系，亦抱不满，主张满洲应建一世界最新式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派侵略的政策，对于中国人多表示好感。康德6年，在总务厅官吏中，企划

处长神田、法制处长青木佐治彦、主计处长古海忠之、弘报处长堀内一郎，均系帝国主义派。代主计处长饭泽义重为满铁系。而地方处长菅太郎、人事处长星子幸雄，为共产嫌疑者。自康德7年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随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来，日系次长为松木侠，后以统制经济关系又添日系次长一人，为古海忠之。

武部六藏总务长官，帝国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系日本国内务省出身，官至敕任局长、关东局长官。后回国随植田关东军司令官来特任伪满总务长官，代表植田大将控制伪满政府的政治大权，人奸滑多虚伪。

松木侠出身为满铁系，无多才。为缓和满铁不满之风，故任以总务厅次长。

古海忠之帝国主义派，人精明，多辩才，长于计算。对于财政经济方面，在当时日本人中，无有出其右者。原为总务厅主计处长，去欧留学一年，归为经济部次长。后以开发产业关系，又调为总务厅次长，专司产业开发计划，一般日本人均宣传有继代武部长官之可能性。

我所知道的武部六藏的出身及简历

古海忠之

武部六藏1932年任日本内务省会计课长，同年任秋田县知事。1934年来满洲任关东局司政部长，1935年任关东局总长。1936年至1937年回国任日本企划院次长，1938年参与创立北支那开发会社，并任设立委员。1940年7月，就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武部六藏离任关东局总长以后，入日本内阁企划院，在企划院总裁青木一男之下就任次长，负责日本重要计划的起草及日本国力判断调查。在制定日本帝国主义未来侵略计划的过程中，即与日本各财阀有了关系，尤其是1938年，受内阁的委托，主管北支那开发会社创立之事务。在日本大财阀和政府互相勾结（日本政府与财阀各出资半额）策划设立本社时，他得以认识了日本财阀的巨头池田成彬（是三井财阀的最高理事，当时的大藏大臣），并与日本金融界的巨魁结城丰太郎相识。通过联系确定出资分担额的事务，又得以与各财阀发生深厚的关系。从而他也逐渐成为日本各财阀信赖的人物，然而从他的交友及其它方面来看，其中关系最深厚者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住友财阀。该财阀当时在伪满洲国已经经营了金属工业及钢管等事业。而且于大东亚战争后期，伪满洲国拟定轻金属紧急增产计划时，他作为总务长官，亲自访问住友财阀，把安东（今丹东）轻金属会社委托给住友财阀。这样，他维护以住友、三井为首的日本各财阀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代表，一直是为财阀所信任的人物。

武部六藏在当时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尤其在军阀及官僚中，又多有知己前辈，例如：安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木户幸一、河原田稼吉、后藤文夫、大达茂雄、汤泽三千雄、贺屋兴宣、石渡庄太郎、青木一男、岸信介等。他与这些天皇制军阀、官僚巨头集团，交际关系非常广泛，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中有相当的影响，而他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有力成员之一，是日本帝国主义阵营的一流人物。因此，武部六藏被军阀、财阀、官僚选定为在伪满洲国实施侵略政策的最高负责人，经内务官僚汤泽三千雄等推荐，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立即同意，而被任命为伪满洲

国总务长官。

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充当强行侵略满洲的关东军司令官的最高政治参谋，向关东军提供侵略满洲的重要计划与方策，并与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等共同决定最高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作为侵略满洲的工具，总务长官又是伪满洲国实际的国务总理大臣，即最高实权者。他指挥和动员伪满洲国官吏，尤其日本人官吏，在伪满洲国内制定审核日本的侵略计划、政策，并通过伪满洲国的行政机构及特殊会社等，进行指挥、监督，推行彻底侵略满洲的种种重大事务。而且，关东军期待总务长官，以其在满洲日本人中所具有的最高领导者与统率者的地位，把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官吏结集于自己周围，竭力掌握实权。对日本以及其它国家和地区来说，总务长官作为伪满洲国的实权者，是被公认为处于代表者的地位的。特别在日本，其地位一贯特别受到重视，武部的前任，后来都被敕选为日本帝国议会的贵族院成员，这已成为惯例。

总之，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在伪满洲国内，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财阀利益，加强控制伪满洲国，以扩大侵略满洲为使命，拥有日本帝国主义天皇制官僚最高地位的重要责任者。而且，武部六藏在伪满洲国期间，更是处于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掠夺最关键的时期，他彻底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武部六藏的关系网， 看他所起的作用

谷次亨

一、武部六藏与东条英机之关系

1935年，东条英机在其少将时期，任日本驻满洲宪兵司令官兼任日本关东局警察部长时代，武部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关东局总长，成为东条英机的直管上司，由此与东条英机结成莫逆的关系。

二、武部六藏与梅津美治郎大将之关系

梅津美治郎曾任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第六师团长、陆军省次官、日本驻“满”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等职务。当梅津任日本陆军省次官时代，武部由上述的关东局总长转升为日本政府企划院次长（同次官一样），在日本内阁每周召集各省、院次官会议时，武部亦参加，在该会议上凡对陆军省所要求的战争军需物资的提案，武部以执掌日本全国“物资动员计划”的企划院次长的身份，表示异常赞同。因此，在这个时期不但与梅津次官结成志同道合的关系，而日本陆军好战的将官乃至中坚分子的佐官亦皆对武部发生好感。于是，直接、间接地形成了无不拥护武部的主张与意见，这就是武部六藏获得日本军阀拥护与支持的根源。

三、武部六藏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来历

日本军国主义者选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在政治上必须具备的条件：(1) 现任关东军司令官信任的人物。(2) 在日本陆军好战分子的将、佐官们之间对其有好感的人物，并本人具有积极侵略思想者方为合格。1940年初夏，在梅津美治郎大将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时代，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被调走后，日本政府根据现任司令官梅津的要求，经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还有好战的将、佐官等的支持，武部六藏被充任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

四、武部六藏与东条英机新的关系

东条英机由1940年任日本陆军大臣，1942年升任日本总理大臣仍兼陆军大臣并兼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又兼日本军需省大臣，名副其实地执掌了独裁式的战时体制的内阁。为强化侵略战争，主要的军需物资必须仰赖“满洲国”的供给，故东条对武部在“满洲国”的施政和地位，更加一层地支持和拥护，如是，武部在其本国有东条政府及好战者一派的支持，在现地有梅津司令官的信任和拥护，所以，武部直到伪满垮台实行了其为所欲为的恶毒政策。

五、武部六藏与日本财阀的关系

武部六藏，因其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成绩优秀，被日本第一流财阀三菱老板岩崎男爵聘为女婿，由该财阀的援助，遂从其38岁的年龄，充任了秋田县长（相当于省长），更经任关东局总长后而又被重用为企划院次长。这个时期的企划院总裁为青木一男，他也是与武部同样的情形，即青木一男被三菱某一老

板，聘为女婿，后由对“满”事务局次长，而被拔擢为日本企划院总裁，他们两个人既同受三菱的援助，更具有亲属的关系。

六、日本企划院的任务

根据侵略战争的进行，负责计划所需要的一切军需和民需物资，除日本本国内所有的微少资源外，主要是依赖中国东北的粮谷、铁、铁矿石、炼钢用煤、盐，中国华北的粮谷、炼钢用煤，以及中国华中的棉花、铁矿石等。一方面，按其计划数量输送日本以便供给和生产；另一方面，依各地生产的原料，按其计划数量，就地生产。这种物资的生产和配给的指定权，是由企划院和日本军需省（系商工省的改称）指定之。实际的内情，在其本国内的指定权，是由二者协议，在各现地，则几乎属于企划院与各现地主管机关之所定。被指定者，必须具有生产资料或新建生产资料的庞大资金和流动资金。这就说明了日本的军需物资的生产是操纵在财阀的手里——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独占财阀们。

日本由其大正年代，即走向“金融寡头”政治。独占资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五大财阀，暗暗地左右了日本的国策，侵略中国东北，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都是垄断资本家们直接或间接决定的侵略政策。为的是，掠夺原料的生产地，再做军火以便发横财。例如：三井财阀出身的藤原银次郎曾任过日本的商工省大臣，住友财阀出身的池田成彬曾任过日本大藏省（财政部）大臣，都是代表日本独占资本家的意志，使日本政府扩大进攻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政策决定者。

武部六藏和青木一男如上所述是三菱财阀老板们的爱婿，更在其援助下，得以执掌日本企划院总裁与次长的大权，当然

为三菱及其他有关财阀来谋利益的。

七、武部六藏任企划院次长时代安排资本主义在占领区的发展顺序

日本独占资本家为避免在中国本部和在中国东北的互相竞争，由1933年组成联合会，其内容：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的顺序，成立了协定，即利用其既有的设备与关系，经过日本政府的非正式指定各自进行发展。

例如：在武部任企划院次长时代，1938年日本占领中国华中的南京、上海后，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华北、华中区域，指定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之顺序；对于华南区域，指定按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大仓等之顺序行之；至于东北区域则因三井多年的垄断关系及其既有的组织，以三井为主体，三菱为次，更次则为住友、安田、大仓及其他资本家的顺序，从事发展。

对其国内关于增加新的军需物资生产，大多数系指定了三井、三菱、住友为主体和其他的资本家担任之。以上是根据1941年日本关东军第四课“物资动员计划”制定者小岛少佐参谋对我所说的。

八、武部六藏任总务长官后与日本财阀的关系

1940年武部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后，规定每年向日本国内输送100万吨铁矿石、60万吨炼铁用煤、约30万吨铁，1940年度输送220万吨粮谷和若干吨盐。

前述的100万吨铁矿石，主要是供给三菱系统的神戸“日立”制钢所、岩手县的“釜山”制铁所、北海道的“室兰”制钢所之外，其余则寥寥地分配给其他的制铁所。前述的炼铁用

煤也是几乎全部供给前述三菱系统的三个制钢所使用。前述30万吨铁，大部分供给了三菱系统的神户、长崎两处的“川崎造船所”及其他制造军火的使用。

由1941年起中国以东北产的鸦片拿到华北卖钱，以此购买开滦煤（炼铁用煤）每年90万吨，主要是除三井、三菱、住友投资的福冈“八幡”制铁所使用外，还供给了其他制铁所。由东北及华北购买（以鸦片的卖价在华北收购的盐）的大批盐运到日本后，主要是供给了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投资组织的“大日本化药工业株式会社”及其它的工业使用。前述的粮谷由1940年的220万吨逐年增加，到1945年为700万吨，这是经过三井机构（主要是经由海路）向日本输送，在运送过程中，三菱、三井的船舶垄断去巨额的运费，更因粮谷大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指定经三井、三菱的机构，配给人民的关系，又取得了大部的经手费。这也是根据上述小岛参谋对我私谈的。

九、在东北日本各财阀的势力与武部六藏的关系

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和企业，占日本主要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例如：由1937年开始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为此而组织的执行机构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构成该社的子会社35个中，有25个以上，系属上述财阀的投资和企业，如：“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主要为三井、三菱投资。“鞍山制钢所”大部分系经由“满铁株式会社”，而是三井、三菱、住友的投资。“本溪湖煤铁公司”完全是大仓的企业。“奉天”铁西的铜电线制造业（忘其名）是住友的企业。鸡西煤矿是三井的企业。阜新煤矿是三菱系统的企业等，这不过由伪经济部日本人次长青木实对我所说的几个代表的例子而已。

由武部六藏任“满洲国”总务长官后，对这些会社的扩大和增设其子会社，更加以特别援助。特别是，于1941年以后，经武部许可，三菱在东北创设了各种保险事业，吸收了东北中国人民的膏血，获得了特别的利润。又许可三井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收买特产（包括土产）的机构，通过其在哈尔滨、长春、奉天、营口、安东、大连等地的许多个支店向其本国及欧洲出售，获得超额的利润；更于1941年将东北生产的鸦片和粮谷，向华北暗暗输出，以换取供给在东北的日本军需物资——白面、皮革、棉花等。在这种运送、贩卖、换取、价格等等方面，都指定由三井一手包办，说明了武部六藏以伪总务长官的职权，援助了日本独占财阀，使他们获取到特别的超额利润；相反地摧毁了东北的民族企业和使人民陷入种种困苦的情况，战犯武部六藏实应负其罪责。